

· 民主译丛 ·

（德）哈特穆特·阿萨夫

Demokratie heute und morgen

# 民主化的进程

DEMOKRATISIERUNG HEUTE UND MORGEN

哈特穆特·阿萨夫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 民主化的进程

[匈] 乔治·卢卡奇  
寇鸿顺译 佟德志校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主化的进程 / (匈) 乔治·卢卡奇著; 寇鸿顺译, 佟德志校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3. 9

(民主译丛)

ISBN 978 - 7 - 218 - 08883 - 9

I. ①民… II. ①乔… ②寇… ③佟… III. ①民主—研究  
IV. ①D0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75478 号

Minzhuhua de jin Cheng

### 民主化的进程

[匈] 乔治·卢卡奇著 寇鸿顺译 佟德志校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曾莹

策 划: 肖风华

责任编辑: 钱飞遥 梁 茵

装帧设计: 亼 介

责任技编: 周 杰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 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 真: (020) 83780199

网 址: <http://www.gdpph.com>

印 刷: 广州市穗彩彩印厂

书 号: ISBN 978 - 7 - 218 - 08883 - 9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170 千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 - 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1487 83790604 邮购: (020) 83781421



# 目 录

## 导论 / 1

### 经济发展与民主化的进程 / 3

卢卡奇生平及其民主理论的发展 / 4

经济与民主的复合 / 7

经济与民主的割裂 / 11

社会主义民主化的前景 / 15

### 论《国家与革命》的超越 / 20

生产力主义范式和平均主义范式 / 32

经济平均主义 / 33

行政管理平均主义 / 33

作为对无政府主义和机会主义的一个答复 / 38

作为国家的历史编纂学 / 40

资产阶级国家的推翻 / 41

· 无产阶级国家的创立 / 42

“无产阶级国家的消亡”和共产主义的实现 / 45

政治学理论的去政治化 / 46

对布尔什维克的历史编纂学、经济主义、庸俗社会学的超越 / 59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构建原则 / 69

社会本体论：历史主义 / 69

社会本体论：实践 / 71

## 民主化的进程

- 德国人文主义和城邦理想 / 73
- 类存在和国家的相通性 / 75
- 人类学与解放 / 76
- 公众与私人的统一 / 80
- 对民主的再定义 / 83
- 对社会主义的再定义 / 83
-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价值 / 84
- 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价值 / 84
- 纲要 / 86
- 党与国家的分离 / 87
- 苏维埃的恢复 / 87
- 工会的恢复 / 87
- 新经济政策与财产的非国有化 / 88
- 列宁主义政党的保留 / 90
- 对无政府主义的超越 / 91
- 用民主替代习惯 / 93
- 社会主义民主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再政治化 / 93

### 附：

- 关于翻译的说明 / 96
- 初步的方法学评论 / 99

## **第一部分 以资产阶级民主替代社会主义改革是错误选择 / 103**

- 第一章 民主及其各种经济形态 / 105
- 第二章 资产阶级民主化的必然发展趋势 / 111
- 第三章 今天的资产阶级民主 / 114

**第二部分 唯一的抉择：斯大林主义或社会主义民主 / 125**

第四章 对一个具体问题的理论和历史假设 / 127

第五章 斯大林对对手的胜利 / 144

第六章 斯大林的方法 / 154

第七章 苏共二十大及其后果 / 179

索引 / 221

# 导论







# 经济发展与民主化的进程

——卢卡奇社会主义民主复合性理论分析

佟德志

乔治·卢卡奇 (Georg Lukács, 1885—1971), 匈牙利著名的政治家、哲学家、政治思想家和文学批评家。卢卡奇在其传奇的一生当中, 不仅在现实政治中历经波折, 而且, 其理论也经历了反复修正, 但是, 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反思确实是有目共睹的。他不仅通过自己的理论建树和教育生涯成就了布达佩斯学派, 而且被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奠基人。

在卢卡奇的政治思想当中, 民主理论占有一个篇幅不大, 但却很重要的角色。与其著作等身的文学理论和哲学理论比起来, 他对民主的论述不多, 也不太引人注意; 一直到现在, 他的这本《民主化的进程》都没有被译介过来。然而, 卢卡奇的批评者, 包括他自己都承认, 他的文艺理论与其政治理论密不可分; 而且, 在最关键的马克思主义复兴的问题上, 他毫不吝啬地把解决方案交给了民主。本书是卢卡奇集中阐释其民主理论的一本小册子。我的师弟寇鸿顺把它翻译过来, 这次又纳入到我主编的“民主译丛”当中。作为该书的校译者, 在阅读和校对的过程中, 颇有收获, 写成此文, 谨以作序。

## 卢卡奇生平及其民主理论的发展

卢卡奇出生于布达佩斯一个犹太银行家的家庭。良好的家庭环境使卢卡奇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为其后续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卢卡奇刚刚 18 岁就在《匈牙利沙龙》《未来》等杂志上发表文章。他不但先后获得法学博士和哲学博士学位，而且先后几次在德国的柏林、海德堡等地攻读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狄尔泰、席美尔等人的“生命哲学”，李凯尔特、韦伯的“新康德主义社会学”，尤其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还与布洛赫这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成为同学和朋友。这些学习的经历对他后来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自己就曾经承认，他研究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了黑格尔的影响。<sup>①</sup>

在这一时期，卢卡奇完成了他的早期作品，多数集中在美学和文学批评领域。如 1910 年的《心灵与形式》、1911 年的《现代戏剧发展史》、1913 年的《审美文化》、1916 年的《小说理论》等。《心灵与形式》和《小说理论》是卢卡奇早期的两部代表性作品。尽管卢卡奇对这一时期的作品并不满意，但是，这些著作仍然备受推崇，甚至对布洛赫、本雅明和阿多诺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正是在对这些历史小说的研究当中，卢卡奇发现了左派和大众政治既强调阶级，同时又有着强烈的自由价值和民主精神。<sup>②</sup> 卢卡奇本人也承认：“通过现实主义文学的调

---

①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华夏出版社，1989 年版，第 2 页。

② *Georg Lukács Reconsidered: Critical Essays in Politics, Philosophy and Aesthetics*, Edited by Michael J. Thompson,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11, p. 131.

和，大众的心灵变得可以接受，去理解人类历史伟大的、进步的和民主的时代。这将会为新形式的革命式的民主做好准备……”<sup>①</sup> 这都为晚期卢卡奇的民主理论埋下了伏笔。

在维也纳的十年是卢卡奇思想形成过程中最重要的十年。1918年10月，匈牙利暴发了无产阶级革命，卢卡奇加入匈牙利共产党，投身革命。革命失败后，卢卡奇流亡维也纳。1919—1929年的“维也纳时期”成为卢卡奇开创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最关键的10年。在这期间，卢卡奇主办了左派刊物《共产主义》，并出版了《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引起轰动。1928年，卢卡奇化名“勃鲁姆”（Blum）为匈牙利共产党起草一份新纲领，提出要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将其视为由资产阶级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典型形式，并提出了在国际工人运动中争取人民阵线同盟军的思想。这一纲领遭到了匈牙利党内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批评，斥责其为社会民主党的“取消主义纲领”。卢卡奇只好承认自己右倾路线，从此离开政治，积极从事理论研究。

在维也纳期间，卢卡奇将自己的八篇文章结集出版，名为《历史和阶级意识》。在该书当中，卢卡奇在“物化”“总体性”“阶级意识”“主客体的统一”等范畴表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解。这使他在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赢得广泛赞同的同时，也遭到了广泛的批评。但是，该书为他赢得的巨大声誉是毋庸置疑的，甚至被认为是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与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并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

从1930年到1945年是卢卡奇的“苏联时期”。在这段时间里，

---

<sup>①</sup> Ernst Bloch, Georg Lukács, Bertolt Brecht, Walter Benjamin, Theodor Adorno,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NLB 1977, p. 56.

他在苏联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潜心研究理论，埋头著述。在苏联期间，卢卡奇写作了一批文艺理论的作品，大多在战后陆续发表。《论现实主义的历史》《青年黑格尔和资本主义社会问题》《艺术和客观真理》《哥德及其时代》《德国文学中的进步和反动》《存在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理性的毁灭》等著作奠定了他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界的地位。同时，他还对《历史和阶级意识》中的许多观点作了修正，退回到当时在共产国际中占主导地位的正统马克思主义。

二战结束后，卢卡奇回到匈牙利，任教于布达佩斯大学，讲授哲学和美学，并当选为匈牙利科学院院士，直到1971年逝世。这一时期的卢卡奇，不仅尽心尽力地投入到教学当中，还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匈牙利社会改革运动和民主运动。他的一批学生，如A. 赫勒、G. 马尔库什、M. 瓦伊达等人在他的指导下成为青年理论家，形成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流派——布达佩斯学派。

这一时期，他的思想集中体现在1963年的《审美特性》、1968年完成的《民主化的进程》以及1971年的《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这三部著作上，这也成为他的理论臻于完善的标志。我们可以看到，晚年的卢卡奇更多地将重点集中在马克思主义的革新和社会主义民主化的问题上。

其实，卢卡奇一直对民主化的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在他1922年发表的《再论幻觉政治》一文当中，就激烈地批判党内官僚化和权力主义的滋长；他的那篇长文《人民领袖还是官僚？》更成为斯大林执政时期在俄国发表的最尖锐而透彻地批评官僚主义的文章。到《民主化的进程》发表时，他的民主理论愈加成熟。可以这样说，《民主化的进程》是卢卡奇民主理论的代表作。

本书写于1968年3月至11月期间，但全部手稿直到1985年才

在德国正式出版，1991年出版了第一个英译本。在这本书中，卢卡奇考察了民主的现在，并展望了未来，尤其是对民主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形态之间的关系阐发了自己的观点。在这本书当中，他在批判斯大林主义的基础上，指出了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性，并对马克思主义的革新等问题做出了重要论述。读者会看到，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与民主关系的问题、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关系的问题等诸多问题上，卢卡奇的论述对于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都有着重要的启发。

## 经济与民主的复合

卢卡奇终生致力于批判机械、教条地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理解为经济定论。在他看来：“人民的解放不是同经济发展机械平行地进行的，也不是同经济发展同时发生的。它预示着经济的发展，同样经济发展也预示着它。当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刚好显示出即将出现问题的趋势的时候，这种解放就有可能出现，并且现在大部分已经出现了。”<sup>①</sup>

马克思主义是卢卡奇分析民主与经济关系的出发点。他明确表示，马克思是“从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思考的第一人”。<sup>②</sup> 卢卡奇甚至认为，马克思在提及数个世纪之前的作为民主起源与典范形式的城邦民主时，经济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首要前提。他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角度出发，考察了经济与民主的关

---

①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60页。

② George Lukács,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p. 71.

系，明确指出：

这种民主的希腊形式的消失，完全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典型的人类品质文明化的结果。个体在这个历史发展阶段还没有获得一种现代的“唯一”身份。拥有配给制，属于部落的公民——上述是城邦公民存在的社会经济条件，因此也是他身份的必要特征。城邦公民私人生活的次要性是由于以下事实：人类存在和发展是与个人政治职责的实现同步的，是与其在这种民主形式中作为政治主体的功能一致的。<sup>①</sup>

正是从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出发，卢卡奇分析了雅典的民主。在卢卡奇看来，雅典的民主取决于经济。他分析到：“从这种经济系统演变而来的民主类型不仅仅以人类存在及实践的普遍形式——它适用于每个社会群体——为基础，而且与个体积极参与的社会存在具体形式相联系。要成为城邦的公民，城邦民主的积极参与者，这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上层建筑的特定范畴，而且该城邦的每位公民都与社会存在的经济基础有密不可分的联系。”<sup>②</sup> 而且，在谈到雅典城邦民主的毁灭时，卢卡奇更多地是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角度来分析的。他指出：“当城邦公民阶级通过买空赤贫者阶级的财产而瓦解配给制社区时，无论最初的企图如何，他们引发了城邦民主的毁灭。”<sup>③</sup>

不仅如此，卢卡奇还将这种关系的理论渗透到对现代民主，包括法国大革命的分析当中来。他认为，现代民主虽然在很多价值和

---

① George Lukács,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p. 72.

② *Ibid.*, p. 71.

③ *Ibid.*, p. 77.

理念方面受了古代民主的影响，但是，因为现代民主与古代民主的经济基础不同，其本质是存在着差别的，对这一差别的分析，正是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精髓：

就政治意识而论，伟大的法国大革命代表了现代资产阶级民主的经典形式，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希腊理念的影响。然而，从社会经济方面讲，它完全背道而驰。通过强调这种矛盾，马克思同时着重指出，自由与平等，作为现代民主表现的核心意识形态模式，可以有各种各样的陈述。自由平等受到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他们并非理想化的构造，“不仅交换中受到尊敬取决于交换价值，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所有平等自由的有成效的真正基础”。<sup>①</sup>

对于资本主义民主的分析，卢卡奇顺理成章地将其归因于经济的影响。卢卡奇在分析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性与国家理想性之间的矛盾时指出：“最重要的是，把这一社会形态的每个部分隶属于其自身的趋势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总动力特征。”<sup>②</sup>可能正是因为如此，资本主义的议会制完成了一个双面的过程，即一方面，“越来越成为资本主义组织内自我利益合理性证明的最合适的工具”，同时“越来越被确立为人民主权的完美机制”。议会伪装成“无限自由”和“平等”的化身，而实际上，正如卢卡奇指出来的那样，“伪装”这个术语并不完全正确，它不仅仅是已被确立的自由与平等的“伪装”，而且更确切的是其经济本质，资本主义商品交换的真实观念。<sup>③</sup>

---

① George Lukács,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p. 73.

② *Ibid.*, p. 77.

③ *Ibid.*, p. 78.



在分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时，卢卡奇将目光转向了列宁。在他看来，列宁对资产阶级民主采取了否定态度。“社会主义民主并不仅仅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延伸。恰恰相反，社会主义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的直接对立面。最重要的是，民主不应该是资产阶级社会固有的唯物主义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而是整个社会自身进步的积极成份。民主不应该再是以许多物质障碍为基础，例如，城邦中的民主，而是自我完善过程中的社会本体存在。因此，社会主义民主的目的是渗透进人类存在的整体，并实现其作为所有人的活动与参与结果的社会本质，分布范围从日常生活到社会最重要的问题。”<sup>①</sup>

接下来，在向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过程中，民主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在卢卡奇看来，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空区”<sup>②</sup>肯定是存在的。他明确指出：“在历史上，直至此时，没有一个人，甚至列宁也不能从理论上阐述这样一个非经典的社会主义建设、即共产主义的准备阶段的关键问题”。然而，他却从当下的角度，将这些问题概括为：“在这一过渡时期的形态下，被号召来克服工业不发达的单纯经济实践，与意欲创造民主的无产阶级行动及制度等理想的社会主义内容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而在这个问题上，他认为，就算是列宁也承认，“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发现的以前的社会主义思想，没有也不可能给对经济发展与民主制度的发展之间建立联系的问题提供理论上的解答”。他把这视为一个“事实”。然而，他也看到：“经济与政治之间关系的问题，具有巨大的社会本体

---

① George Lukács,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p. 102.

② 包括哈贝马斯在内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缺少政治学理论，对过渡时期缺少相应的制度设想，这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空区。

论的重要性，因为它显示出自由王国在本质上不同于经济的必然王国。它还表明自由王国只能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达到。”<sup>①</sup>

## 经济与民主的割裂

在卢卡奇看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会认为，经济与民主是复合在一起的；另一方面，那些将经济与民主割裂开来的做法将最终导致失败。不仅现代民主与古代民主之间因为经济基础的不同而存在着明显的区别，那些将资产阶级民主与社会主义形态混合起来的人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即不顾经济形式的不同，最终将导致灾难的后果。

资产阶级民主是社会主义世界的真正选择吗？对于这样一个为人们热切地讨论的问题，卢卡奇给出的答案是明确的、果断的：“不，永远不是。”<sup>②</sup>他认为，东欧的改革就是将资产阶级民主当作社会主义选择的结果。他批评道：“这些东欧改革者们，他们的支持者、同情者们，尽管有真诚的信仰，但还是遭到了可以预想的失败，并且只能够提出把腐败的资产阶级民主作为社会主义危机的选择。”<sup>③</sup>可能正是从这一点，卢卡奇甚至认为：“一项当代的经验分析已经清楚地表明，每一次用资产阶级的变体取代社会主义民主的企图都不可避免地导致对社会主义的杀戮（很有可能也是对民主本

---

① George Lukács,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p. 98.

② *Ibid.*, p. 88.

③ *Ibid.*

身的杀戮)”。<sup>①</sup>

在卢卡奇看来，列宁看到了发展民主的重要性，在他那里，民主与经济是同等重要的。但是，这种看法，却并没有为后来的继承者所遵循，他们大多过份地强调了经济，而把民主抛到一边。他明确指出：

没有人能坚持致力于列宁的强烈愿望——通过已经建立的基础的扩展和强化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尽管每个列宁的继承者对苏联的工业化过程有不同的观点，在列宁那里的社会主义民主的中心地位却被纯粹的经济问题所取代。<sup>②</sup>

卢卡奇看到了斯大林体制的成就，在“原始积累”和快速工业化的大背景下，斯大林体制取得了许多成就，这甚至比两个“重建”时期还有了进一步的增长。然而，当生产发展到一定水平，社会主义国家所面对的问题也改变了。新的问题不再是“原始积累”，而是所生产的产品以及给人民提供的服务的质量问题。“从经济上来说，斯大林主义对快速工业化时期还是适用的，然而，当苏联经济发展到更高水平时，它就失去了自己的历史作用”。<sup>③</sup> 在卢卡奇看来，斯大林主义的问题可能就在于此，即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忽略了民主。他指出：

斯大林首先在理论层面上歪曲了经济学的意义，接着，这种歪曲就变成了他对社会主义发展的残暴操控。当他把经济学歪曲为专门的实证科学，把经济学从所有的政治联系中分离出

---

① George Lukács,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p. 93.

② Ibid., p. 107.

③ Ibid., p. 147.

来时，就可以宣称，要建设社会主义，可以只集中在工业增长上面，而不用考虑社会主义民主问题。<sup>①</sup>

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出发，卢卡奇批判了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把他们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认识称之为“错觉”。在他看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经济的推动力上是截然不同的。他指出：

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缺乏自主意识和目的意识，完全由必然的经济规律支配着。伴随着一种内在的强大的自治主义，纯粹的经济规律主导着资本主义，决定它未来的情况甚至可能在其自身产生一个新的社会历史形态（甚至被社会所接受的权威性的人格类型也是经济的内部辩证的产物）。从人类的目的设计来说，社会主义与它之前所有的社会形态都是截然不同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在社会主义向更高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演变的过程中再也不能起任何作用了。<sup>②</sup>

卢卡奇还从经济与民主的复合角度批判了斯大林和赫鲁晓夫，这是具有创见的。卢卡奇认为，斯大林模式从根本上忽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性，而这，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同等重要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举足轻重。正是由这一观点出发，卢卡奇不仅批判了斯大林，而且批判了“表面上与斯大林主义相反、实质上却与斯大林的观点是同一模式的赫鲁晓夫的观点”。赫鲁晓夫曾经非常天真地以为，只要在苏联生活水平上赶上美国，社会主义就将在世界范围内获胜。而这在卢卡奇看来，是绝对错误的。他指出：

---

① George Lukács,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p. 118.

② *Ibid.*, p. 140.

尽管赫鲁晓夫时常激动地批评斯大林，他仍旧是一个经济主义者。他提出共产主义的介绍推广依赖于一定水平的经济生产成就。当俄国达到了这个生产力水平，这个水平将超过美国，那么共产主义将变成现实。赫鲁晓夫仅考虑到经济前提，共产主义也需要政治和民主前提的观念超出了他的智力范围。尽管是斯大林的批判者，赫鲁晓夫仍局限在斯大林主义内，因为他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成为经济生产力的同义词，他不允许社会主义民主理论进入争论的范围。<sup>①</sup>

卢卡奇认可了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但是，他认为，这种批判也是片面的，就在于它只是将攻击集中在了个人崇拜、对法治的破坏等一些细枝末节上，而忽视了这些关键问题的本质。那么，什么是斯大林主义问题的本质呢？他认为，斯大林主义的问题的本质在于没有发展民主。

在卢卡奇看来，经济与民主是社会主义整体事业的一体两翼，缺少了任何一个方面，都会使另一个方面孤掌难鸣，独木难支。没有经济基础的支撑，社会主义民主就算是建立起来，也必然会是脱离实践的，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更为重要的，也是更容易让人忽视的，是另一个方面，即社会主义民主对经济的反作用。这正是卢卡奇批判斯大林的地方，仅注重经济而忽视民主政治建设，其结果是人民群众不买账，政权建设没有得到巩固，经济建设的成就得不到巩固，可能会出现各种问题。

---

<sup>①</sup> George Lukács,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p. 114.

## 社会主义民主化的前景

经济发展和民主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包括东欧社会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在内的一些实践却割裂了这种联系，不仅使得民主化受阻，而且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挫折。卢卡奇看到，“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是一项长期的工程，只有当社会实践活动与纯粹的经济活动相一致时，促进它发展的前提才能建立起来。”<sup>①</sup> 尽管卢卡奇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讲述经济问题，但是，通过对列宁以后的苏联社会以及社会主义的历史进行考察，卢卡奇还是明确地指出：“对这些经济问题进行详尽论述并不是我们的真正目的。更重要的是要看到政治和经济之间的相互联系。经济改革已经提上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日程，这一事实就意味着社会主义民主问题也成了当务之急。”<sup>②</sup>

卢卡奇对现有的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社会进行了敏锐而深刻的分析，在他看来，这些社会虽然的确在客观上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关系并且使其变得不可能，但是，在这样的政治和社会条件下的发展，它的政治结构“没有能力——不是还没有——建立起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在政治上还没有授权于社会主义的人。广大劳动人民并没有寻找到把他们自己变成能动主体的方法”。<sup>③</sup>

但实际上，在卢卡奇看来，社会主义和民主本身就是复合的，社会主义是从民主中走出来的。在一次访谈中，卢卡奇曾经明确表

---

① George Lukács,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p. 159.

② Ibid., p. 149.

③ Ibid., p. 154.

示：“按我的观点——这个观点可以上溯到勃鲁姆提纲——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社会主义是从民主中产生出来的。按反对的观点，人民民主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专政，从一开始就是那种在铁托事件以后发展成的斯大林主义的形式。”<sup>①</sup> 社会主义与民主是通过意识联系在一起。他将社会主义视为一种控制，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社会主义意味着凭借人类意识和社会的自我决定来控制人类发展”。然而，意识的一个特性就是其可教育性，因为这个教育，是“真正的类存在的自我教育”，而这个教育，有一个中介，这个中介就是社会主义民主。<sup>②</sup>

社会主义民主的推进不仅会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运动进一步发展，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复兴的重要问题。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复兴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在这里，社会主义民主的苏醒会给这项运动提供“精神推动力”。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民主的实际发展预示着马克思主义方法的重建。这并不仅仅是抽象的哲学陈述。相反，马克思主义重建是关系到共产主义运动生存的重大问题。”<sup>③</sup>

但是，对当时的社会主义者来讲，社会主义民主却是一个“完全新的、没有探索过”的领域。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都已经逝世，没有更多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论可循；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民主在当前形势下又不可能自发产生，“广大劳动人民极度的、普遍的冷漠，只有通过外在力量给其提供目标，才能把自己发

---

① 卢卡奇：《卢卡奇自传》，杜章智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167页。

② George Lukács,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p. 97.

③ *Ibid.*, p. 161.

展成为这种社会主义民主活动。”<sup>①</sup>

那么，民主的复苏有没有可能呢？卢卡奇还是乐观地做出了肯定的回答。他从正反两个方面指出了这种可能的前提。从消极的角度来看，就是不能有对民主化的压制力量；从积极的角度，他将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在一次访谈当中，他曾经表示，人民民主是能够依靠自己内部的力量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的，<sup>②</sup>但是，这里的前提是：“但是当然，只有在苏联没有斯大林主义的情况下。用斯大林主义的方法，任何这种发展都是不可想象的，因为甚至稍微偏离官方的路线都不可能。”<sup>③</sup>另一方面，卢卡奇还从积极的角度肯定了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他明确指出：“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应该对这些极少的，却是基本的事实非常清楚，建立这种目标取向的天生领袖和推动力必须是共产党。”<sup>④</sup>

卢卡奇不仅在宏观上指出了民主化的过程，同时还在具体的操作层面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他认为，老办法是行不通的：

用旧的方法推行民主化进程是行不通的。它也不可能通过自发的革命性巨变取得成功。试图通过复兴苏维埃运动来取得成功也是不可能的，在革命时代，苏维埃运动被看作是延伸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直接民主。回到过去所需要的主观和客观条件都不存在，任何梦想着过去那种自发的苏维埃运动得到复

---

① George Lukács,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p. 162.

② 这似乎与他提出来的人民民主不能从内部产生出来有些矛盾。但鉴于一个是著作，一个是访谈，可能会略有出入，也说明，卢卡奇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是特别肯定。

③ 卢卡奇：《卢卡奇自传》，杜章智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168页

④ George Lukács,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p. 162.



苏的人都是自找没趣，都是空想。<sup>①</sup>

在民主化的过程中，卢卡奇特别重视民主化过程中政治参与的力量。在他看来，人民群众的冷漠才是最可怕的，这可能说明，社会制度失去了合法性；人民群众的参与，反而说明了他们还是想维护自身利益，还是对现存的社会制度抱有希望。他指出：“当社会制度失去了合法性并且变得退化的时候，广大群众就会对其毫无兴趣。当社会政治结构不再合法，也不符合民主利益的时候，广大人民群众就会对其冷漠无情。今天，人民参加各种会议、讨论和选举，是因为这能满足他们眼前的自身利益，而不是为了作为反对派出现在那些官方机构面前。”<sup>②</sup>但是，他也指出了当时政治参与的问题，即，那些参与“仍然过于被动或者他们的参与把自身限制在官方提议的程序化批准之中。参与者深刻地明白了，他们的参与对那些问题本身来说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时常还会给参与者个人带来危害。一般说来，尽管官方描绘的事实是另一幅蓝图，并且成为公务记录的一部分，但上述事实还是广为人知的。政治参与被降低为纯粹的机械主义”。<sup>③</sup>

卢卡奇强调了公众舆论的作用，将其视为“民主化进程的第一步”。他指出了一种“无声的地下公众舆论”，也就是说，尽管充满活力而且自由的公众舆论依然存在，但却采取了地下和隐蔽的形式。这种隐蔽的“公众舆论”不会以公开和正式的方式表达出来。在东欧社会范围内而且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公众舆论其实就是一种私人密谈，即时地和自发地发生在两个人之间进行的讨论。

---

① George Lukács,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p. 150.

② Ibid., pp. 149 - 150.

③ Ibid.

卢卡奇认为，这是“现存的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的开口楔子”，他把它视为一种“社会力量”，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的第一步”。<sup>①</sup>

---

① George Lukács,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p. 150.

## 论《国家与革命》的超越<sup>①</sup>

诺曼·莱文

[第3页] 乔治·卢卡奇的著作《民主化的进程》<sup>②</sup>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该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在当代复兴的序曲。斯大林死后，卢卡奇投身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复兴，而《民主化的进程》展示了他在政治学理论领域对马克思主义

- 
- ① 导论《论〈国家与革命〉的超越》最初写于1988年，即在1989至1990年间曾横扫东欧及前苏联的革命性变革前约18个月的时候。导论的主题探讨了卢卡奇对以《国家与革命》为例证的经典列宁主义政治理论的变革。很显然，东欧及苏联政治生活的整个情况都被1989至1990年的那场地震所重新构造，但是为了理解卢卡奇与所有这些事件的关联，首先有必要解答关于国家理论方面他与列宁主义的关系问题。卢卡奇的《民主化的进程》的主要目标就是提出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原理，并且通过重新认定所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历史主义基础来将一种形式——内容分析应用于民主和国家的概念而达到此目的。尽管卢卡奇是列宁的崇拜者，他终结了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主宰。因为这些都是《论〈国家与革命〉的超越》主要提出的问题，我将之书面出版因为这些都是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然后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方面才能得到任何进一步的进展。关于卢卡奇对待戈尔巴乔夫的态度，他针对1989至1990年东欧革命的可能的立场方面的思考的其它问题，则应属于另外的研究课题。
- ② 卢卡奇用德语写的这本书，在布达佩斯卢卡奇档案馆保存的文本的实际标题是 *Demokratisierung Heute und Morgen*，意译为《民主化的今天与明天》。由弗兰克·本塞勒（Frank Benseler）所编的西德版本标题为 *Sozialismus und Demokratisierung* 即《社会主义与民主化》。我使用《民主化的进程》为标题，因为它更接近文本最主要主题之一的民主的历史主义本质。卢卡奇不关注作为一种预定形式的民主或者社会主义，而是关注作为一个过程的民主和社会主义。

原理的重新构建。然而，卢卡奇在其生平的最后二十年中要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重生的愿望，引导他首先走向美学与社会现象学的王国。

在1963年成稿的《审美特性》<sup>①</sup>一书中，卢卡奇提出了对马丁·海德格尔和尼古拉·哈特曼<sup>②</sup>本体论观点的马克思主义的回应。他指出艺术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反映，不断变化的社会基础仍是艺术和人类劳动的对象化出现的根据，并用此一社会现象学反对他们的唯心主义现象学。艺术使日常思维无神化，这点很要紧，因为它向旁观者揭示出在日常现实的貌似确定性背后运作的真正动力。卢卡奇试图超越1930年代马克思主义美学中“艺术作为反映”的争论，并将196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建立在社会本体论的基础之上。

卢卡奇在其《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sup>③</sup>中继续着对人类对象化活动的社会起源的思考。该著作真正开始于1964年，整部手稿打印于1968年，但没有进行改写完善，所以带有不完整的痕迹。该书是对人类实践的建构性质的拓展性阐释。该书属于理论社会学——试图提出一种关于在社会进化中人类劳动怎样成为原动力的现象学解释。

在卢卡奇的《民主化的进程》中，这些现象学调查已拓展到了

① 乔治·卢卡奇：《审美特性》（柏林：鲁赫特汉德，1963）

Lukács, Georg, *Die Eigenart des Ästhetischen* (Berlin: Luchterhand, 1963) .

② 就卢卡奇与哈特曼和海德格尔关系的精彩讨论，参看尼古拉斯·特土连（Nicolas Tertulian）的文章《卢卡奇的本体论》，载自汤姆·洛克摩尔（Tom Rockmore）主编的《今日卢卡奇》（*Lukács Today*），第273-274页。特土连的表述与卢卡奇对艾格尼斯·赫勒（Agnes Heller）和费伦克·弗赫尔（Ferenc Fehér）的解释相左。还有一部著作探讨了卢卡奇与海德格尔的相似与差异，参见卢辛·戈德曼著的《卢卡奇与海德格尔》（伦敦：卢特洛基与克甘普，1982），威廉·O·柏忽尔（William O. Boehower）译。

③ 乔治·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柏林：鲁赫特汉德，1972）

Lukács, *Zur Ontologie des gesellschaftlichen Seins* (Berlin: Luchterhand, 1972) .

政治领域。在他对社会本体论的探索中，美学、社会存在和政治学必须被看作是提供人类社会存在的统一观点的宏伟事业中的三种表述。[第4页]在《民主化的进程》中，卢卡奇试图用市民社会、类存在和人类目的性行为概念建立一种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前提。在一个更为政治化的层面上，此书体现了其最终主张——斯大林主义的布尔什维克主义<sup>①</sup>是马克思主义的畸形。《民主化的进程》是一种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理论从斯大林主义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区分出来的努力。它是一部标新立异的著作，一种“列宁主义反对派”的表达，一种马克思主义不能被降低为斯大林主义，而且是对斯大林主义的驳斥的论述。

在本书中，卢卡奇超越了对政治学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定义，提出了对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提出的恩格斯-列宁国家理念的批判。如果《国家与革命》代表着1917年革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乌托邦式期望，那么卢卡奇的《民主化的进程》使得《国家与革命》变得过时，为开始于斯大林去世之后的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构建做出了例证。《民主化的进程》必须作为实质上的反《国家与革命》文本而被阅读。列宁曾寻求把政治学包含在行政管理中，而卢卡奇则把政治学从行政管理和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形式中解放出来。此书开启了马克思政治学理论的再政治化过程。

---

<sup>①</sup> 参看我的《辩证法内部的对话》（伦敦，艾伦和安文，1984）一书，尤其着重第5章“黑格尔式的列宁主义”和第6章“辩证法与延安道路”。在上述篇章中，我用术语“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来区分由列宁和斯大林代表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形式。按照时间顺序来看，“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指的是直到1924年为止苏联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形式，而“斯大林主义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则暗指以从斯大林兴起直至戈尔巴乔夫时期（赫鲁晓夫的间隔除外）的苏联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类型。

《民主化的进程》是一部不完整的著作，并且应该被看作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一种预辩法。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根本原理的一些草图。它是在极为匆忙中并承受着极大压力写成的。紧随在1968年8月的苏联对亚历山大·杜布切克的捷克斯洛伐克改革运动的镇压之后，卢卡奇在1968年9月至12月间写出该文本。<sup>①</sup>但他对该稿并不满意，认为该文稿作为真正的科学著作来说过于概括化，而作为一部好的概要来说又过于科学化了。他曾计划将手稿扩展成为他筹划中的《伦理学》中的一章。<sup>②</sup>该书的完整手稿由拉兹罗·斯齐克莱（László Sziklai）博士，布达佩斯卢卡奇档案馆的馆长于1985年在德国出版。此版是该书的第一部英文译本。

鉴于其政治背景，《民主化的进程》必须被看作为支持杜布切克的捷克马克思主义改革的阐述。卢卡奇在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并担任着伊姆雷·纳吉政府的文化部长。卢卡奇在逃离南斯拉夫大使馆时被镇压匈牙利革命的苏联所逮捕，并被流放到罗马尼亚大约六个月。他是东欧改革运动的支持者，而匈牙利1956年以及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的观念贯穿全书。《民主化的进程》是对从布达佩斯持续到布拉格的改革运动的热情拥抱。这是对反斯大林主义极权的不同政见的哲学性辩护。尽管苏联人扼杀了1956年和1968年的进步性的社会主义改革，但是它于1981年在波

---

① 卢卡奇：《社会主义和民主化》（弗兰坎特：森德弗格，1985），弗兰克·本色勒编，第131—136页。在德文版中，本色勒写了一篇社论性评论，其中描述了卢卡奇在《民主化的今天和明天》的写作期间与他的通信。其它就该文本演进方面的有趣评述将会在卢卡奇的《一生札记》以及艾格尼斯·赫勒主编的《论卢卡奇本体论：卢卡奇再评价》（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3）中找到。

② 同上。

兰再次爆发，[第5页]1987—1988年在匈牙利并且在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莫斯科再次出现。当卢卡奇在1968年写《民主化的进程》时，他审视了杜布切克的被夭折的马克思主义复兴，写出了一个人虔诚信徒对失败的评价。但是在今天，这本书被视为波兰、匈牙利和当代莫斯科事件的预言。思想的一贯性支撑了从裴多菲集团到莫斯科的改革运动。今天，《民主化的进程》描绘了判断戈尔巴乔夫的各项政策的一个预见性蓝图。

法伦克·费赫尔和艾格尼斯·赫勒在他们的《回眸匈牙利1956》<sup>①</sup>一书中对流进匈牙利大革命的各种潮流提出了一种洞察性的分析。费赫尔和赫勒写到了他们的老师乔治·卢卡奇：“‘反对派’改革马克思主义，其最伟大的人物不容置疑就是乔治·卢卡奇，用一种甚至更加无情的诊断提出了这个构思。又是卢卡奇（或许并非偶然，在裴多菲集团之内准备了1956年匈牙利大革命的论坛）规划了这个项目：马克思主义的复兴。”<sup>②</sup>但是，这场改革运动具有许多分枝，为了了解卢卡奇在这场改革运动中的地位，有必要更准确地对他进行定位。当费赫尔和赫勒写到匈牙利大革命的各种阵营时，他们再次给我们提供了帮助。“其次是卢卡奇，一位不一致的布尔什维克，那位对做‘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怀有真诚信仰的人；恰恰因为其不一致性，能够成为1956年革命的捍卫者……一个在严格的布尔什维克前提下站不住脚的事业。”<sup>③</sup>在我的理解中，卢卡奇是反

---

① 费赫尔、赫勒：《回眸匈牙利1956》（伦敦：艾伦和安文，1983）

Fehér and Heller, *Hungary 1956 Revisited*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83) .

② 费赫尔、赫勒：《专制战胜需要》（牛津：巴什尔·布莱克威尔，1983），第290页。

Fehér and Heller, *Dictatorship over Need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3), p. 290.

③ 费赫尔、赫勒：《回眸匈牙利1956》（伦敦：艾伦和安文，1983），第118页。

Fehér and Heller, *Hungary 1956 Revisited*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83), p. 118.

对斯大林主义的“列宁主义反对派”的一份子，他们在1956年匈牙利革命中持温和观点。在“列宁主义反对派”这个术语中，我是指并不想要政治多元化，或者一种市场经济，或者使匈牙利从华沙条约中退出的政治改革运动；而是把列宁主义传统本身看作是作为斯大林主义改革提供各种可能性，并且尤其把“1921年苏联的新经济政策”看作这样一场共产主义改革的基础。在卢卡奇的左边是更为激进的匈牙利革命的民主派，他们倡导政治多元化、市场经济和退出华沙条约来应对匈牙利的“芬兰化”，他们的代表人物是伊姆雷·纳吉。持温和观点的“列宁主义反对派”与激进的民主左派（自由党）之间的核心理论差异是，卢卡奇从不寻求跳出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圈外，确实希望复活它，而纳吉“已超越了布尔什维克主义”。<sup>①</sup>虽然卢卡奇超越了《国家与革命》，但是他从不超越列宁本人，并且艾格尼斯·赫勒认为他对列宁的忠诚是致命的瑕疵。<sup>②</sup>在他的自传性文稿中<sup>③</sup>，卢卡奇自觉地与纳吉的激进民主保持距离，声明他加入政府是“为了有所帮助”<sup>④</sup>，而并非出于对其政策的完全支持。卢卡奇并不想让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他在政府任职时就投票反对这项措施<sup>⑤</sup>，[第6页]并且反对完全引入市场经济，因为“认为此种市场因素会导致社会主义沿着正确的民主道路前进，这只是假象”<sup>⑥</sup>。

---

① 弗赫尔、赫勒：《回眸匈牙利1956》（伦敦：艾伦和安文，1983），第118页。  
Fehér and Heller, *Hungary 1956 Revisited*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83), p. 118.

② 与艾格尼斯的一次私人谈话中对我说的话。

③ 卢卡奇：《一生札记》。  
Lukács, *Record of a life*.

④ 同上，第168页。

⑤ 同上，第129页。

⑥ 同上，第168页。



不考虑列宁主义反对派与激进民主派之间的其它差异，各方一致同意恢复苏维埃、劳工运动和工人自主管理（南斯拉夫模式），这三项需求形成了巨大的潮流并驱动了东欧以及苏联改革运动的前进。根据共产党是劳动阶级专政的统治工具这一理念，米洛万·吉拉斯在《新阶级》中首次提出这样的理念：所有的改革阵营都同意劳动阶级必须在政治方面被赋予权力，党派式国家对社会生活的控制必须被粉碎。

在探讨卢卡奇文本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重大意义时，我使用政治学理论这个术语而不是国家理论，因为政治学理论是一个包容性更强的术语。<sup>①</sup> 我使用政治学理论作为政治理论的同义词，其含义是对统治的起源、要素、机构及其本质的研究。国家理论是政治学理论的重要分支，因为它本质上与统治机构相关。政治学理论是国家问题的前提，因为它奠定了那些国家存在的条件。政治学理论不能被归结为国家问题，因为要制造政治学等于国家的智力公式，这就损害了政治学的定义，它把政治学仅仅定义为机构并忽略了关于社会将要做出决策的方式的全部问题。国家问题后于社会必需的决策过程的协议问题。

政治学理论是 19 和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黑洞。这不是探讨卡尔·马克思思想自身，或者泛泛的第二国际时期的政治学理

---

① 在我的文章《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再认识》（载自《国际实践》，1988 年 7 月）中，我对“政治学”这个词的各种意义提出了更加充分的探讨。“政治学”这个词有若干意义，只有通过逐步理解马克思的“政治学”术语的不同意义，才有可能理解马克思的政治思想。这些意义中，只有一种与国家有关。假定就马克思而言，国家的终结意味着所有政治学的终结，这就不可能抓住政治学概念的其它意义。对马克思而言，国家终结后，多数政治功能继续。只有抓住马克思政治学的各种意义，然后我们才能清晰地推测出国家消除后仍将继续的其他确切的政治功能。

论史的地方。当马克思在 1850 年搬到英国时，他开始着迷于经济学问题，而且直到他逝世这一直是他的兴趣中心。马克思开始时沉浸于古典经济学，然后是经济人类学，这使得他没有时间去完成他 1844 年时所表达的写一本关于国家哲学的书的愿望。<sup>①</sup> 马克思政治理论的核心，有别于革命策略理论，主要体现在七本书中：《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阶级斗争》《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与《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但是这些并未提供他对政治学或国家或共产主义社会真实思想的详细描述。[第 7 页] 马克思留给后继者一种关于这些政治哲学和政治学理论以及国家理论基本问题方面的决定性空白。这种政治学理论的空缺是一种致命的损失，因为这导致在俄国 1917 年革命后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没有既成的权威性指导方针来帮助建设共产主义国家，革命策略很容易地取代了政治学理论。这种政治理论的空白是 19 和 20 世纪中社会主义思想进展中的黑洞。

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遭受了一种语言学上的崩溃，因为缺乏政治学理论，它就把国家和政治学观念合而为一。一般所说的第二国际，尤其是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等同于三个术语：国家、无政府主义和政治学。从第二国际时期直到 1917 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逻辑呈现出如下形式：马克思称之为“国家的消亡”，而这就意味着共产主义是无政府主义的同义词。共产主义是一种不存在国家的

---

①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纽约：麦克格罗·希尔，1964），汤姆·鲍特姆尔编，第 63—65 页。

Marx, Karl, *Economic -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ed. Tom Bottomore (New York: McGraw - Hill, 1964), pp. 63 - 65.

社会，政治学也不需要存在。国家和政治学之间的术语性混淆，<sup>①</sup>把政治学与国家视为同一创造了一种语言逻辑，其中“无国家性”被直接翻译成无政治学性。<sup>②</sup>

我把列宁主义和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同义词。当然，我知道在列宁和第二国际之间的重大差异，这些差异最终导致第二国际的瓦解，并促使列宁创建了第三国际。我不关注将列宁和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分隔开来的分歧，而是关注他们共享的理念，其中一个理念涉及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当我假定列宁和第二国际的统一性时，我是在有限制性的基础上做出的，即仅仅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问题上。然而，当我提到马克思本人时，我假定他的政治理论是反对列宁和第二国际的。我把马克思主义和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作为相互对立的术语。在从马克思到第二国际的过渡中，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丢失了。列宁所汲取的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种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歪曲版本。

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坚持一种国家的阶级财产简化主义观点。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流露出一种无政府主义倾向，第二国际理论把国家仅仅定义为一种阶级压迫的工具。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国家作为统治工具理论的经典表述，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的话语中为此提供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最清晰的分析。[第8页]我相信在更为广泛问题上的重大分歧把马

---

① 我曾经写过关于《国家与革命》的乌托邦成分的文章，文中我着重指出了该文本中的无政府主义假说。参见我的文章：《列宁的乌托邦主义》，《苏联思想研究》（1985年7月）。在该文中，我试图指出列宁对政治学概念并没有适当的定义，我把这个问题称为“语言学上的崩溃”。他为什么设定共产主义是所有统治的缺失的同义词，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② 这个新词是我的创造。

克思和恩格斯区分开来，并且恩格斯的国家理论在重要方面区别于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当列宁作出结论，恩格斯的著作表达了马克思关于国家的思想，他是错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恩格斯的经典之作，但是列宁没有用历史的观点理解恩格斯与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的差异。在第二国际时期，国家被定义为统治阶级手里的武器，这给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把其政治理论与无政府主义理论区分开来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都同意最终国家将会消亡，自由的获得取决于国家的瓦解。因为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都同意政治理论的终结，一种无国家的社会，如果它们被看作是不一致的话，它们只是手段上的一致。对列宁而言，差异是一种手段，是国家消亡的时机问题。巴枯宁认为国家在革命的时刻刻立即瓦解，而列宁则看到资产阶级国家被无产阶级革命直接废除，但却被另一个国家所取代，无产阶级国家，并且这第二个国家随后将会“消亡”。<sup>①</sup>

根据第二国际的理论，因为国家仅仅是阶级统治的暴力机器，阶级的消灭将与国家的消亡同步。第二国际的逻辑语法从阶级简化主义扩展至财产简化主义。<sup>②</sup> 阶级仅仅是可以简化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经济范畴，因为如果阶级的消灭将消除国家存在的原因的话，那么私有财产的废除将会消除阶级存在的原因。共产主义社会没有

- 
- ①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纽约：国际出版社，1967）第二卷。  
Lenin, Nicolai, "State and Revolution", in *Lenin: Selected Wor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7), Vol. II.
- ② 鲁西奥·克莱提：《伯恩斯坦与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载自《从卢梭到列宁》（伦敦：新左派丛书1972），第45—108页，约翰·麦灵顿、朱迪斯·怀特译。  
Colletti Lucio, "Bernstein and the Marxism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in *From Rousseau to Lenin*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2), pp. 45 - 108, trans. John Merrington and Judith White.

私有财产，因此，它就没有阶级，没有国家，没有政治学。

理解马克思在个人财产和生产资料两种意义上定义财产是重要的。所谓个人财产，马克思是指人们私人拥有的物品，它们并不生产社会财富，诸如衣服、家具或者化妆品。所谓生产资料，马克思是指人们私人拥有的确实生产社会财富的物品，诸如油井、煤矿或者钢厂。马克思解答私有财产问题方法的关键方面与财产对整个社会价值做出的贡献有关。从这个参考框架出发，当马克思号召废除财产时，他并没有号召废除像衣服或者化妆品之类的私有财产；而是要废除诸如私人拥有的钢厂和煤矿之类的生产资料。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说，一场无产阶级革命将会推翻资产阶级国家并在革命过程中被称为社会主义的阶段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最终无产阶级国家将会消亡而进入更高阶段的共产主义，那时是无财产、无阶级、无国家并且没有政治学的。[第9页] 共产主义的胜利仍然会留下这个新社会如何管理或统治的问题，两种模式被提出用于共产主义社会的适当管理：生产力主义和平等主义。在这两种模式中政治学都被包括进经济学和行政管理学中。马克思政治学理论将以悲剧式结局而收场：其成功即是其失败，因为共产主义的胜利意味着经济生产和平等主义取代政治学，或者民主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

除了国家的涵义之外，政治学这个术语也带有制订社会决策的规则——一种确定社会资源或权力分配的程序的涵义。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学是一个从社会、个人或群体利益中演变出来的程序，这个程序致力于这些利益的裁决。“政治的”这个术语的此一涵义是19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语言学上的崩溃的牺牲品。当政治学的涵义被限定为国家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被从把政治学思想

看作一种公认的对个人或群体利益进行裁决的模式中排除出去。由于这种语义上的限定，当共产主义被定义为没有政治学时，它就意味着没有必要确立用以裁定利益冲突的规则。

因为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没有冲突的社会，现有的作为规则的政治学也会被废除。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卡尔·考茨基和弗拉基米尔·列宁的马克思主义都依据于假定一切社会冲突都根源于私有财产以及以私有财产为根据的阶级斗争。把阶级的定义简化为财产，这意味着财产的消除成为消灭了一切社会对立的根本原因。共产主义就是开启一个社会和谐的新时代，并且作为规则的政治学将不再需要。因为共产主义见证了自我利益的毁灭，它也超越了政治学。

在共产主义社会管理的生产力主义模式中，利益萎缩成了需要。生产力主义模式以作为经济需要的人的视角为根据，是灵感中的资本主义者，因为它把人看作为了满足需要而消费。消费—需要公式的另一个方面是私利或不满观念产生于未被满足的需要。19世纪的共产主义理念建立在一种满足感公式之上，充分的满足意味着没有私利，而不完全的满足导致利己主义和冲突的出现。

这些假定是资本主义化的，因为它们把人描绘成基本上是被满足消费需要的欲望驱动的。19世纪第二国际的共产主义理想建立在对人的资本主义解释的基础之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19世纪的社会主义宣称资本化的人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被满足，[第10页] 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使命的实现者。把消费—需要公式作为共产主义的基础，有两种主要途径来满足需要并克服自利：生产力

主义范式<sup>①</sup>和平均主义范式。平均主义范式被进一步细分为经济平均主义和行政管理平均主义。

## 生产力主义范式和平均主义范式

匮乏是自利之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 19 世纪经济发展所达到的阶段的成果，当时不可能生产足够的产品来满足大部分基本需求。面对经济匮乏的状况，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把共产主义定义为平均商品分配或需求满足的模式。20 世纪后半叶，在西方国家超越社会主义思想的变化由于对匮乏的技术方面的胜利而产生了。工业生产力足以满足多数基本需求，因此匮乏的问题至少在理论上得以解决，人们的关注然后转移到其他方面。

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有必要克服匮乏问题。克服匮乏惟有通过生产力主义模式：共产主义须作为释放社会中未曾应用的生产力潜能并创造经济的富足加以展望。需要的满足唯有伴随经济的富足而出现，因为有了足够的商品来平均分配。生产力主义范式，取决于将技术奇迹的科学虚构偶像化以及把未来经济的充足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前提条件。

生产力主义主题也会导致共产主义的资本化。共产主义表现出优于资本主义是因为它将证明具有更大的生产力。资本主义显示出生产力低下，因为资本阶级的利益最大化的欲望会导致限制生产，

---

<sup>①</sup> 查尔斯·伯特希姆写过一本书，对在整个第二国际期间社会主义的经济主义控制模式做了深刻分析。参见他的著作《1917—1923 年苏联的阶级斗争》（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6），莱恩·皮埃尔斯译。

*Class Struggles in the USSR: 1917—1923*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6), trans. Brian Pearce.

而共产主义将展示经济上正在解放出来的力量，因为它将现代技术解放成为无限的生产力。

## 经济平均主义

平均主义模式建立在冲突产生于两个根源的假设之上：a. 未被满足的需要滋生自利；b. 私有制的不平等导致分配的不平等，这激发了自利的两种形式：嫉妒与羡慕。为了克服这两种社会冲突的根源，经济平均主义模式提出了两种矫正方法：分配的平均化与消费的平均化。

分配平均化理论依赖于需要的可通约理论：如果需要被平均化，就不会有羡慕与嫉妒。需要是侵略之母，在良好的行为主义方式中，经济模式认为需要是可以量化的。〔第 11 页〕此一经济模式在理论上是机械的，因为如果需要可以量化，那么就有可能计算出需要的分配数额来满足需要。未满足的需要的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消费平均化来满足，因为人们如果收入平均就取得了平均的消费，或者平等获得社会生产的产品。克服社会冲突的主要原因，即自利就可以通过需要的满足而达到。经济平均主义是社会和谐产生的条件，因为消除经济需要是克服社会不和谐的条件。

## 行政管理平均主义

不同于生产力主义模式强调物质需要问题，行政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要解决人的才能问题。生产力主义模式面对的是人的物质需要的问题，而行政管理模式面对的是技能与能力的问题。

没有发明必要的词汇，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将社会冲突的根源



定位于纯粹经济之外。在为共产主义社会化管理提出一种行政模式时，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敏锐地认识到财产的悬殊并非阶级或社会冲突的唯一来源。这一新来源便是人类才能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被马克思包含在其《哥达纲领批判》的名言“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之中。因为才能是分层次的，社会控制的需要不仅仅是经济的，因为更有能力的人们会意识到自己控制着更多的部门权力。虽然有可能设想出一种需要的平均主义，但是不可能设想出一种能力的平均主义。行政管理模式的设计是为了解决那些精英人士占据权位的问题，因为资产阶级社会需要他们的才能并且资产阶级愿意承受他们的权力统治时而产生的社会冲突。行政管理模式解决职业霸权的问题。

需要和才能不同，因为有可能使需要平均化，但不可能使才能平均化。经济平均主义满足需要，但不可能有才能平均主义存在。解决方法不在于才能的平均化，而在于职位的平均化。才能不平等的人可以做平等的工作，这样，建立在机构或职业权威基础上的统治将会被消除。[第12页] 尽管人们在技能方面是分层次的，他们所做的工作是平均化的，这样，就没有必要为了更多的部门权力而争取有别于他人的职位。依据功能本身的特性，才能方面平均主义的缺乏并不意味着在功能方面不可以有平均主义。才能的分层不会必然导致部门或行政权力的分层。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为才能的分层提出一个解决办法，他把这种办法称为“计算与控制”。他的公式是：才能的分层是不可克服的，但是我们必须使大多数工作所需要的功能平均化，以便于无论任何才能层次的人都能够胜任。“计算与控制”这个短语是功能平均化的同义词，并且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指出怎样才能达到

这种平均化。因为受到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影响，列宁认为有可能把工作分解成最简单的功能层次，以便于无论任何才能层次的绝大多数人都能够胜任。在将复杂之工作分解成简单的功能层次时，列宁采用了一种数学—行为方法。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应用一个邮局的范例来描述共产主义经济的管理，正是在这个范例中，“计算与控制”这个术语深入人心，尤其是在文秘与基础会计技能方面。管理模式假定才能分层，但是根据功能平均主义进行决策。经济模式是以经济平均主义为根据，而管理模式是以功能平均主义为依据。在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中，平均主义是社会和谐的途径，而且只有差别不存在时社会和谐才能够被预见。

在工作职责被降低为计算和适应技能时，职业将被民主化。基于才能分层的职业精英不复存在，随着工作的民主化，由于官僚权威主义而产生的社会冲突将终结。当职业精英的工作垄断被打破时，行政上的权力垄断也将失去。劳动领域不再被职业独裁主义者所控制，而是功能的平均主义。当劳动领域属于独裁主义者时，社会冲突就存在。但当劳动领域改变为功能性平均主义时，冲突就终结了。恰如经济平均主义一样，功能平均主义产生和谐。

行政管理模式不是指向消费的，而是指向社会功能和教育能力领域的。行政管理模式并非致力于经济领域，而是官僚机构领域。甚至在官僚机构领域中，冲突和斗争的终结就意味着政治学的终结。[第 13 页] 机构官僚控制中冲突的终结通过功能性平均主义的中介，宣告了政治学的末日。

行政管理模式也优于政治学。在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中，政治学理论被非政治化了。共产主义社会不再被看作一个政治的社会，而是一个经济富足和社会平均主义的社会。冲突的缺席消除了对政

治学的需要，并且共产主义理论处于没有政治理论的状态。

马克思本人不主张平均主义经济学和行政管理对于政治学的优先权。第二国际的所有罪行不能直接归结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黑洞是一种政治学理论的缺失。马克思留下只言片语的建议，但从这些揭示中可以得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轮廓，这个重建的提纲表明他并不分享平均主义经济学和行政管理这种简单化的梦想。然而，马克思的确留下一个理论性空白，第二国际的各种错误解释涌现在这个知识真空中。马克思留下一个术语性空白，第二国际用自己的各种错误概念填充了这个空白。

尽管没能完成国家理论，马克思还是揭示了诸多观念，它们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是不可或缺的：市民社会、类存在以及国家间的差异。马克思首先在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探讨了市民社会的观念。这种观念稍作修改后再次出现在成熟的马克思身上，尤其体现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他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关于人类学的著作中。但是在这些著作中的矛盾不是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矛盾，而是经济基础与国家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把社会与资产阶级国家看作是不相容的，因为国家没有独立的存在，而总是对一个社会的社会结构的异化反映。

通过市民社会这个术语，马克思是指人类活动的集合，可概括为社会的、经济的、家庭的、教育的、宗教的活动。马克思指出一组活动，这组活动独立于社会权力的活动，他称这种活动的统一体为市民社会。人类的社会状态是天然民主的，因为这是一种条件，在此条件下，所有人的日常活动在社会决策过程都能发现自己的表达方式。在资本主义中，社会被剥夺了所有的政治权力，在资产阶级统治下，社会是被去政治化的。

“市民社会”这个术语与人类的社会生活相关，而“类存在”这个术语与人类的人类学本质相关。两个术语不同，一个是关于社会再生产的习俗与制度，[第14页]第二个是关于人类物种心理性的遗传特性。马克思对亚当·斯密和亚当·佛格森著作中市民社会的观念非常熟悉，两人都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主要成员，并且他还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著作中了解了类存在的概念。呈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类形象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市民社会观点和费尔巴哈的源自于类存在观念的人本主义的、自然主义的结合物。无论这些术语间有何差异，马克思使用它们似乎它们有共同的意义，它们都与国家极端相反。在本文的剩余部分中，我将使用这些词的共同意义作为国家的对立面，而同时意识到市民社会的社会学内容与类存在的人类学内容之间的差异。

国家是权力的主宰，国家反映一个社会的社会结构，并且拥有它们折射的社会的独立存在。社会是国家的前提条件，而国家仅仅是社会的结果。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垄断政治权力。因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执行委员会，所以它是所有政治当权者的宝库。

第二国际把国家与所有政治当权者合而为一。因为它把政治学的意义消解至国家的条目中，所以终结国家的号召必然导致政治学的终结。马克思本人并没成为这种语言学的崩溃的牺牲品。当马克思号召推翻国家时，他其实是指使国家去政治化，使社会重新政治化。尤其是在一个发达的工业化社会中，马克思意识到要达到社会决策，一个达成共识的过程是不可或缺的。马克思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他相信在裁定社会争端的过程中，管理的重要性是自明的。马克思不主张政治学的终结，但要改变政治学的定位。马克思为自己设定的方案是设计一种使社会政治化的方法，赋予社会机构以政

治权力。对马克思而言，民主意味着真实的社会实践与理想的社会规范之间的一致性。马克思的雄心是对民主术语的重新定义，一种基础结构的重新定位，基于此，政治权力将从依赖有产阶级转向依赖社会。用这种方法，人类的日常活动与政治权力所设定的行为规则之间就没有区别了。

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写于1917年7月，是一种第二国际的错误与马克思重建政治理论的企图混合物。《国家与革命》是第二国际的经济和管理平均主义与马克思重新定义民主的本质和社会起源的方案的混合物。因为卢卡奇的《民主化的进程》超越了《国家与革命》，[第15页]对列宁著作的讨论，将会提供一种背景来评价卢卡奇这本唯一的拓展性的政治专著。我大致在三个主题下探讨《国家与革命》：①作为对无政府主义与机会主义的一个答复；②资产阶级作为阶级的国家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无阶级的国家的历史编纂学；③政治学理论的去政治化。

### 作为对无政府主义和机会主义的一个答复

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与无政府主义总有一种矛盾关系。在共产主义阶段，马克思主义赞同国家将消亡的无政府主义理念。如果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共享了关于最终目标的理念，那么必须肯定并解释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间的差异。由于目的相同，差异只存在于手段上。无政府主义认为国家停止于革命成功之时，而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革命首先消灭资产阶级国家，然后代之以无产阶级国家。国家的终结与无产阶级国家的消亡同时发生。

更重要的是，无政府主义信仰“人民”的天然一致和有机和谐。无政府主义假定人类的自然状态是一种合作状态。权力机构——国

家是其典范例证——破坏人类的自然合作。铲除权力机构将意味着合作性社会的再生。因为无政府主义的主要敌人是权力机构，所以它并不主张一种权力机构（资产阶级）应被另一种（无产阶级）来取代。权力机构是万恶之源，所以它就应该被一次性彻底根除。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是划分为阶级的，并根据阶级斗争提出了对社会的冲突解释，而并非人们之间的有机和谐。马克思主义不是反对权力机构本身，而是反财产、反阶级。根除权力机构本身并不能消除社会冲突，但是根除阶级就能消除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的首要目标不是国家，而是财产与阶级，因为国家仅仅是财产与阶级的功能。无政府主义的首要目标是国家，它是权力机构的最高例证。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为了镇压资产阶级反革命，无产阶级统治必须首先取代资产阶级统治。唯有当无产阶级把作为阶级的资产阶级消灭掉，无产阶级成为普遍的阶级时，一般而言的阶级才能被超越。

诚如《国家与革命》抨击那些马克思主义左派，它也驳斥那些右派，批驳被称为机会主义的各个方面。对列宁而言，机会主义是一个术语，用来概括任何对废除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理想的放弃，[第16页]因此就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国家与革命》是对卡尔·考茨基一连串开火中的一发，但是这种攻击持续着，并且在小册子《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sup>①</sup>中更加猛烈。

机会主义仍然忠于议会制。考茨基在其写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1918年12月解散选举议会到1919年初的《论无产阶级专政》<sup>②</sup>中，

①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见《列宁选集》第三卷。

Lenin,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and the Renegade Kautsky," in *Lenin: Selected Works*, Vol. III.

② 卡尔·考茨基：《论无产阶级专政》（柏林：迪茨·林格出版社，1919）

Kautsky, Karl, *Die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 (Berlin: Dietz Verlag, 1919).

表达了对议会制——一种间接代表的体制——的追随。对考茨基而言，共产主义并不意味着追求另一种无产阶级的政权形式。考茨基保持了忠诚于被资产阶级完善的了的政权形式——议会主义——并且把共产主义定义为议会制度，由于选举制度的民主化，工人将处于统治地位。当考茨基描述共产主义时，他并不应用无国家或无政府的社会的术语，相反，他看到一个社会中普遍选举权是一种现实的实践，并且此一选举权，因为大多数人口都是无产者，无产阶级将在议会中拥有发言权，而议会中的多数成员将是产业劳动阶级者。

对列宁而言，任何保留资产阶级制度的企图都相当于摈弃了无产阶级革命。列宁在马克思政治学理论领域中的探求是为了发现资产阶级思想和制度的替代物。列宁主义的计划可以归结为寻求一种国家和民主的替代形式。列宁在这个计划上的失败并不意味着计划本身不必要或不重要。列宁前进的基础是无产阶级政治理论必须从无产阶级原则出发。他的计划号召发现区别于先前的资产阶级的、贵族的或僧侣的政治学理论的无产阶级原则。社会革命不仅需要革命战略，而且需要无产阶级政治学理论的原则上的革命。

### 作为国家的历史编纂学

根据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共产主义革命的模式将经过以下三个阶段：①资产阶级国家的推翻；②无产阶级国家的创立；③无产阶级国家的“消亡”和共产主义的实现。《国家与革命》再次确认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的三阶段发展过程。它重新表述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国家的历史编纂学。

## 资产阶级国家的推翻

列宁认为，资产阶级国家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手里的镇压工具。[第17页] 他的国家定义最重要的来源之一就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并且列宁使阶级特性简化论的观点永久化了。议会制主义仅仅是资产阶级统治的伪装，它将政治权力交给资产阶级掌握。资产阶级国家，像贵族或教权主义的国家一样，把有产阶级的统治奉若神明。

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延续了成为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特征的语言学上的崩溃。列宁使国家与政治学这些词崩溃，把它们作为同义词去理解。当列宁号召终止国家时，因为政治学的词义被完全包含在国家之中，他同时也号召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

《国家与革命》也没有提及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区别。列宁书中未提及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在此文中提出了国家与社会的分离。1917年11月列宁思想中《论犹太人问题》的缺失很有趣，因为他了解马克思的这篇文章并在他1890年代的著作中提到过它。<sup>①</sup> 早期的列宁，1890年代年轻的革命者，关注的是俄国资本主义的到来，伴随着根除农业社会以及用工业主义取代它，这一点表

---

① 列宁年轻时就熟知大量的马恩著作。列宁的马恩书目精确范围从未被探讨过，但应该探讨，因为这将揭示出大量列宁在其形成期间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在我的文章《列宁的德国化》（见《苏联思想研究》1988年7月，第88—101页）中，我做了初步的尝试来揭示列宁在马恩著作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知识方面的程度。该文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德国社会民主党整体对列宁的影响的深度。该文的主题是列宁受德国理论的影响远远超出以前所认识到的，并且此前对列宁的知识发展的诠释过于强调俄国方面的影响，而忽视了德国思想思潮对他的影响。



述在他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99）一书中，因此国家与社会分离的问题对于当时的列宁来说更为明显。成熟的列宁，成年的革命者，筹划着1917年的起义运动，更加卷入到了权力与强制问题之中。所以在1917年，他不关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对立，而是沉浸于战术问题之中。《国家与革命》没有提及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对立。这意味着列宁不能选择政治化社会这一合乎逻辑的选项。对1917年的列宁来说，作为独立实体的社会并不存在，因此它不能被政治化。国家成为政治的唯一核心，所以其废除也是去除政治化的起点。

## 无产阶级国家的创立

在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国家将被废除并被无产阶级国家所取代，列宁感到已经掌握了马克思的意图，所以他就把巴黎公社看成为无产阶级国家的典范。列宁从资产阶级历史的外部 and 革命历史的内部寻求一种典范，并以此为基础建立无产阶级国家。〔第18页〕公社政权等于社会主义阶段，公社政权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中点。

对列宁而言，巴黎公社代表了无产阶级民主，因为公社里面以阶级（财产）为基础的政治制度被废除了。无产阶级民主意味着超越资产阶级阶段的民主的进展。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民主间的差异就是代议制民主与直接民主的差异。

资产阶级共和国拥有职业军队以及职业警察。官方军队和警察是由通常从有产阶级里抽出来的军官团体统领，并且在资产阶级共和国内统治国家的同一阶级也占据着军队和警察中的领导位置。列

宁想要废除职业军队与警察，并用建立在武装公民群体基础上的民兵和法律执行机构来取代他们。对列宁而言，军事防御和法律实施的社会功能应该由人民本身来直接实施。<sup>①</sup>

列宁为公社政权——无产阶级国家——倡导的民主化进程，不仅废除了职业军队与警察，还把直接民主应用于政府的每个部门。列宁写道：“由此可见，公社用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似乎‘仅仅’是更完全的民主：废除常备军，对一切公职人员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和撤换制。”<sup>②</sup>这就意味着，例如，司法机构不再是被任命的而是根据全体投票实行选举。基于在沙皇时期的经历，列宁怀疑行政系统，当时的行政系统只不过是罗曼诺夫王朝进行压迫的工具。<sup>③</sup>为了确保行政系统将对人民负责，他想要确实把直接民主、选举和召回的原则延伸到政府的各行政部门。列宁式民主平均主义的另一幻想是要求政府人员拿与工人同样的薪水。工资平均主义仅仅是收入平均主义的另一种形式。关于官僚与产业劳动者关系的问题，列宁论述了脑力与体力劳动之间、职业分层中的技能性与非技能性劳动之间的差异，并且他想要通过工资平均主义制度克服职业分层过程中的任何支配成份。

在无产阶级国家中，议会制度就会被废除。在公社政府期间，

---

① 列宁：《国家与革命》，第424—427页。

Lenin, Nicolai, *State and Revolution*, pp. 424 - 427.

② 同上，第424页。

③ 早期列宁对行政系统极其不满，因为他把这看作是沙皇控制的工具。当行政系统为罗曼诺夫王朝所利用时，它只不过是执行罗曼诺夫王朝的压迫政策的工具。关于列宁早期对行政系统的谴责，参见下列文章：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What the Friends of the People Are and How They Fight the Social - Democrats?”），《列宁选集》（莫斯科，外语出版社，1972）第1卷，第129—332页；《我们拒绝什么遗产？》（“The Heritage We Renounce”），《列宁全集》第2卷，第491—534页。

无产阶级专政，代表权将保留存在，但资产阶级代表权的模式——议会制度——将被改变。代表权的无产阶级国家形式表现出两个特征：①公社政府代表权将不分离立法与司法功能。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分离了这些功能，列宁想要超越这种资产阶级式的分离，通过“把代表机构由清谈馆变为工作机构。[第 19 页] 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工作的机构，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机构”。②无产阶级国家将由苏维埃领导。在无产阶级国家，列宁仍然保留代表制的观念，但是代表机构改变了，因为它不再是通过议会来代表，而是通过苏维埃来代表。

资产阶级思想家替资本主义进行自私的辩护……是因为他们一味争论和空谈遥远的未来，而不谈目前政治上的迫切问题：剥夺资本家，把全体公民变为一个巨大的“辛迪加”即整个国家的工作人员和职员，并使整个辛迪加的全部工作完全服从真正民主的国家，即工农代表苏维埃的国家。③

列宁为国家和民主寻求的替代物，引导他超越了其资产阶级形式。列宁创立了一种无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民主形式，“无产阶级专政”将是“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直接民主的委员会——

---

① 列宁：《国家与革命》，第 428 页。

Lenin, Nicolai, *State and Revolution*, p. 428.

② 同上，第 475 页。

的统治。<sup>①</sup>

## “无产阶级国家的消亡”和共产主义的实现

列宁对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三段论观点的重新确认完善了自己对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描述。议会制度在第二阶段，即无产阶级国家时期消亡，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代议制和民主都将消亡。《国家与革命》终结于无政府主义，并且一种政治学的列宁主义理论不复存在。

“国家的消亡”这个术语是指：就所有人来说，慢慢养成习惯意识，以实现“无阶级”“无国家”和“无政治学”。“无产阶级专政”<sup>②</sup>要消亡，因为人民需要学会在没有政治下生活。共产主义并非是革命性的废除，而是行为演进的缓慢过程的结果。

《国家与革命》不是极权主义统治的蓝图，因为不仅仅国家和苏维埃消亡，而且党派也消亡。它与《国家与革命》的民主内容吻合，其中列宁描述了更高阶段的共产主义，他描绘了一个没有共产党的

① 海尔·特雷普尔是当今最敏锐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著作的研究者之一。关于对列宁而言“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的的问题，参见他的《从马克思到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87）[“*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from *Marx to Leni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7)] 特雷普尔是与尼尔·哈丁类似的学者之一。尼尔·哈丁强调列宁思想中的民主倾向。他的著作驳斥了理查德·帕伊普斯和亚当·乌尔姆的著作，他们把列宁看作是独裁者。

② 特雷普尔还有一本书论述专政，其中追溯了从雅各宾到布朗基这个概念的演变。参见其《卡尔·马克思的革命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86）。特雷普尔对书目材料的把握总是一语中的，他眼光独特，善于捕捉其他学者忽略的短语和句子。我完全同意他对马列的评价，并把他的著作看作受欢迎且姗姗来迟的对帕伊普斯和乌尔姆的所提出的对列宁的彼得特卡乔夫式诠释的矫正。

社会。<sup>①</sup> [第 20 页]

## 政治学理论的去政治化

《国家与革命》既是灾难又是福音。它是灾难因为它终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指出了在共产主义下政治理论没必要存在。《国家与革命》使马克思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传统合法化，它防止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投机，因为共产主义社会将没有国家。《国家与革命》并非是一种政治理论，它把马克思主义束缚在革命战术层次上。从政治思想观点上看，马克思主义变得固定在革命战术和国家毁灭的层次上，而不是谋划国家或政治的建设。

《国家与革命》是福音，因为它的基本主题之一是民主的历史。《国家与革命》是未完成的福音，因为它不仅陈述了民主史，而且还给出了一个时间段，到那时民主的需要将会终结。列宁的书不是反民主或极权主义的。民主以及各种各样形式的政治学，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会终结，不是因为列宁对民主缺乏赞赏，而是因为列宁假定产生对政治上层建筑需要的社会基础将会终结。<sup>②</sup>

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方法，列宁假定每一种政治形式都证明了一种根本性的社会结构：政治学是社会基础的上层建筑。阶级是社会基础优先于无产阶级国家的消亡的决定因素。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民主通过阶级冲突变成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协商的政治形式。冲突可还原为阶级这一等式其自身产生了一个代替等式，

---

① 列宁：《国家与革命》，第 461 页。

Lenin, Nicolai, *State and Revolution*, p. 461.

② 同上，第 473 页。

即阶级的消灭，同时也是冲突的消亡，政治学的终结。<sup>①</sup>

在民主进程中的无产阶级阶段，阶级斗争仍然存在。它是一场大多数人试图消灭少数人的阶级斗争，少数人会反抗。它是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然而，有阶级斗争的地方，就有国家和民主的需求。无产阶级革命创立了无产阶级国家，它是大多数人手里的阶级专政的工具。社会冲突的持续也要求无产阶级民主，为大多数人利益的民主。无产阶级民主的上层建筑是公社式国家或者苏维埃。政治学依然存在于无产阶级国家，因为大多数人战胜少数人的冲突还在持续。

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是无阶级社会。列宁在此问题上追随着恩格斯，预言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是社会大同的一种形式，它是一切社会分层和社会差异形式的终结。如果社会冲突演变为阶级和社会分裂，[第21页]那么克服社会冲突就意味着超越阶级和全社会大同的社会的创立。这就意味着所有形式的社会功能的平等化。

在一个没有任何形式的社会分层的社会中，社会冲突将停止。社会冲突的终结意味着国家的终结以及民主的废除。由于民主是解决社会冲突的方法，所以社会冲突的终结也是民主需求的终结。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将见证阶级、国家和民主或者任何统治机构的终结。

为了确立他的民主废除理论的圣经般的正义性，列宁没有引用马克思，而是引用恩格斯的话：

人们通常在谈论国家问题的时候，老是犯恩格斯在这里所警告的而我们在前面也顺便提到的错误。这就是：老是忘记国家的消灭也就是民主的消灭，国家的消亡也就是民主的消亡。

---

<sup>①</sup> A. J. 波兰：《列宁和政治学的终结》（伦敦：梅休因，1985）  
Polan, A. J., *Lenin and the End of Politics* (London: Methuen, 1985) .

但是，我们在向往社会主义的同时，深信社会主义将发展为共产主义，而到那个时候就没有任何必要对人们使用暴力，没有任何必要使一个人服从另一个人，使一部分居民服从另一部分居民，因为人们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起码条件，而不需要暴力和服从。

为了强调这个习惯的因素，恩格斯就说到了新一代，“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国家制度这一整堆垃圾完全抛掉”，……任何一种国家制度，其中也包括民主共和的国家制度。<sup>①</sup>

克服对从属关系的需要的途径就是把每个人降低到同样水平，克服对权威的需要的途径就是消除任何社会分层。当列宁假定社会大同是克服达成社会决策的任何协议的需要的方法时，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去政治化做出了贡献。列宁被引入一个不可调和的两难之中：人只有超越民主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他再次重申民主与共产主义是两种不同的制度。

恰如对民主的需求只有通过应用社会平均主义模式来克服一样，共产主义社会的提出只有通过应用经济平均主义模式。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把共产主义定义为经济平均主义的形式，而《国家与革命》就是这种传统的反映。

《国家与革命》第5章标题为“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sup>②</sup>，[第22页]在该章中列宁提出了对“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经济预测。<sup>③</sup>

---

① A. J. 波兰：《列宁和政治学的终结》（伦敦：梅休因，1985），第473—474页。  
Polan, A. J., *Lenin and the End of Politics* (London: Methuen, 1985), pp. 473 - 474.

② 同上，第474页。

③ 同上，第478页。

列宁采纳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主义模式。对他以及一般来说的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而言，没有经济的富足，共产主义便不可能。并且唯有现代制造业的潜能得以释放，共产主义生产超越资本主义，经济富足才成为可能。列宁在下面的表述中体现了他对生产力主义模式的忠诚：“这种剥夺会使生产力有蓬勃发展的可能。既然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现在已经怎样难以想象地阻碍着这种发展，而在已经达到的现代技术基础上又可以大大推进生产力，我们就可以有十二分把握地说：剥夺资本家一定会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蓬勃发展。”<sup>①</sup>

列宁向经济主义屈服了，因为他设想技术发展是社会结构中的主要因素。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工业生产力释放的首要结果是社会大同。列宁这样来描述消除社会分层的后果：“但是，生产力将怎样迅速向前发展，将怎样迅速发展打破分工、消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把劳动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我们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sup>②</sup> 列宁说，虽然不可能准确预测发达的技术将最终消除社会阶级，因为社会阶级最初源于“劳动分工”。技术将导致社会平均主义，消除所有由于不平等的能力，或不同的劳动形式而产生的社会差别。社会平均主义意味着把社会水平降低到每个人都能达到的相同标准上。

社会平均主义构成经济平均主义的基础。当列宁把共产主义定义为一种经济平均主义时，他依然停留在第二国际的主流中。他写道：“当社会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时，也就是说，在人们已经十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他们的劳动生产

---

① A. J. 波兰：《列宁和政治学的终结》（伦敦：梅休因，1985），第479页  
Polan, A. J., *Lenin and the End of Politics* (London: Methuen, 1985), p. 479.

② 同上，第480页。



率已经大大提高，因此他们能够自愿地尽其所能来工作的时候，国家才会完全消亡。那时，社会就不必在分配产品的时候规定每人应当领取的产品数量，每人将‘按需’自由地取用。”<sup>①</sup>

列宁还把行政平均主义模式应用于他的共产主义社会思想中，《国家与革命》这样写道：

统计和监督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调整好，使它能准确地进行工作所必需的主要条件。[第23页]在这里，全体公民都成了国家（武装工人）的雇员。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全部问题在于要他们在正确遵守工作标准的条件下同等地工作，并同等地领取报酬。对这些事情的统计和监督已被资本主义简化到了极点，并成为一种非常简单，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能胜任的监督和登记的手续，只是算算加减乘除和发发有关字据的手续。<sup>②</sup>

在上一段中，列宁提出了他的社会管理的“邮局”解释。行政平均主义是一种克服人们之间由于才能分层产生的差异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尝试。他想通过确保有才干的人不会垄断官僚权力职位来防止官僚统治。认识到才能分层是不可消除的，防止官僚制或者党派统治的方法就是把所有工作都降低至极其简单的运作，以便每个人都能做到。行政平均主义在部分上是列宁对党派独裁主义或者斯大林主义的危险的应对之策。列宁明白：防止行政工具，即一个政党获取霸权的方法就是把那个行政工具对民众管理开放。

列宁依据 B. F. 斯金纳和《沃尔登第二》的观点，把共产主义

---

① A. J. 波兰：《列宁和政治学的终结》（伦敦：梅休因，1985），第482页。  
Polan, A. J., *Lenin and the End of Politics* (London: Methuen, 1985), p. 482.

② 同上，第490页。

社会看作是行为主义的天堂。列宁坚信，没有政治的束缚，人们能够学会管理社会。他写道：“因为当所有的人都学会了管理，实际上都自己来管理社会生产，自己来进行统计并对寄生虫、老爷、骗子手等等‘资本主义传统的保护者’实行监督的时候，企图逃避这种全民的统计和监督就必然很难达到目的，必然只会是极罕见的例外，并且还可能受到极迅速极严厉的惩罚……于是，人们对于人类一切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就会很快从必须遵守变成习惯于遵守了。”<sup>①</sup>

列宁所说的“习惯”是指约定俗成的行为，意味着在邮局、大型国有托拉斯的工作能教会人们一致的行为方式。列宁把泰勒的流水线模式从工厂层面转移到管理等级制度，因为他相信工厂和管理两者的机械性重复工作都将培训人们统一行为。[第24页]通过“习惯”这个词，列宁描述了意图和意志的平均主义，通过重复以养成习惯教会人们摆脱政治以行使他们的社会功能，由此产生的统一行为是通过自愿而不是强制。

布尔什维克主义没能够发展出一套共产主义社会的政治学理论，这不是列宁一个人的错误，而是整个第二国际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是第二国际的黑洞，而列宁的著作是这个空白的反映。这个第二国际内部的理论空白根源于三大术语的混淆：①第二国际假定冲突是政治学的唯一背景；②第二国际认为克服冲突的媒介，即政治学，就是平均主义；③第二国际对语言学上的崩溃负有罪责，对于如下句法意义上的等式：政治学 = 国家 = 阶级权力负有罪责。当第二国际接受了从语言学上把国家降格为政治学时，它就遇到一种句法学上的公式，该公式只允许人们从国家逃亡出来，而出口则

---

① A. J. 波兰：《列宁和政治学的终结》（伦敦：梅休因，1985），第492页。  
Polan, A. J., *Lenin and the End of Politics* (London: Methuen, 1985), p. 492.

是只能通向无政府主义，或者“无政治学说”。准确地说，列宁的失败从广义上讲必须归因于第二国际的失败。马克思国家理论的分裂流行于整个一代欧洲左派，列宁是这种分裂的一个范例，而不是它的原因。

列宁的最终失败并没有减损他追求的真诚与创造力。他的抱负是发现一种截然不同于资产阶级政治学理论的替代形式。尽管列宁在这个计划上并不成功，他的确开辟了民主概念的新视野。他使把民主扩展至经济领域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永恒化，并通过把民主的应用拓展到行政管理、官僚和职业领域而超越了马克思一步。

卢卡奇的《民主化的进程》超越了《国家与革命》，也推翻了布尔什维克的政治意识形态。它是马克思政治学理论基本原理的建立。

《民主化的进程》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新政治化。《国家与革命》得出结论，用经济和行政管理的平均主义来取代民主与政治学。《民主化的进程》开始于以下立场，对于裁决社会争端和拥有社会决策协议的需求是毋庸置疑的，而民主是确保这些裁决和政府制定规则的功能让群众易于得到。社会对控制与政治总有需要，民主是一种来确保这些裁决与协议功能由多数人来控制的手段。

《国家与革命》把民主思想应用于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中，而《民主化的进程》把民主原理应用于人类活动的人类学思想之中。根据第二国际和列宁的意见，[第25页]马克思明确规定一切劳动是平等的，唯一的差异在于花费在劳动上的时间量不同。这种对劳动质的差别数量化的企图意味着劳动民主是以时间平均主义的术语来设想的。民主被视为付出等量劳动获得等量报酬的保障。卢卡奇推翻了民主与价值理论的联系，从高度重视人类活动的需求来开始他

的设想。卢卡奇的计划认为能够用民主来引导人类提高潜能的过程。他并不是从劳动的数学化开始，他的核心概念是类活动。以此人类学核心为基础，卢卡奇把民主看作最有益于人类生产力潜能评价的决策程序。卢卡奇通过不是在劳动理论的基础上，而是在个人实践的基础上开始他政治学的理论活动，构思人类能力的最大范围，以这种方式，卢卡奇保持了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传统的忠诚。对列宁而言，问题在于商品劳动的公平回报；而在卢卡奇看来，问题在于人类才能的扩展。

卢卡奇是重新设计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主要贡献者。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的革命性改变是在卢卡奇 1924 年的《列宁：关于其思想统一性的研究》一书与其 1968 年《民主化的进程》一书的差异中。1924 年的书致力于革命主体，那个拥有权力的社会阶级能够制造社会革命。<sup>①</sup> 该文本为伟大战略家列宁而欢呼，但正是无产阶级表现为能够独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阶级。当卢卡奇在 1924 年写出他的《列宁：关于其思想统一性的研究》一书时，1917 年布尔什维克发动的革命浪潮已经耗尽了其力量，但是在中欧、德国、匈牙利、奥地利、意大利，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爆发仍然在进行。关于马克思的政治理论，卢卡奇 1924 年的书完全与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相一致。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开始三年以后，卢卡奇的书证明了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统治能够通过苏维埃加以实施，

---

① 卢卡奇：《列宁：关于其思想统一性的研究》（伦敦：新左派丛书，1970）  
Lukács, *Lenin: A Study of the Unity of His Thought*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0).  
诺伯托·鲍比欧 (Norberto Bobbio) 曾写过第二国际政治理论失败的犀利洞察性文章。虽然我得出独立于鲍比欧的结论，但是他的多数文章却与我的信念相呼应，并且为自己的结论找到支持总是令人愉快的。鲍比欧的著作值得我研究，因为他也探索了社会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当代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参见他的书《哪一个社会主义？》（明尼波利斯大学，明尼苏达出版社，1987）

并且在1924年卢卡奇仍然坚持议会运动作为行使无产阶级民主的最好形式。1924年，随着列宁的逝世，俄国面临着快速工业化和列宁继承人上的政治斗争问题，卢卡奇停止再提“国家的消亡”。俄国面临太多的问题，卢卡奇认为构想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是无用的，所以他以证明无产阶级专政的合理性来终结他的政治思想。

卢卡奇1968年的书《民主化的进程》，从策略走向社会本体论。《列宁：关于其思想统一性的研究》一书的哲学前提是黑格尔主义思想的公式：[第26页]革命的无产阶级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历史。在1968年，卢卡奇不再把产业劳动阶级看作是革命的主体，而是相反聚焦于社会劳动的观念。在《列宁》一书中，卢卡奇的对象是政治剧变的策略；而在《民主化的进程》中，他的对象是社会劳动。不仅1924年和1968年书的对象与主体有变，而且哲学统一性的来源也改变了。在《列宁》一书中，哲学统一性取决于阶级活动，但在《民主化的进程》中，这种统一性的背景不再是阶级主体性，而是社会劳动。<sup>①</sup>

卢卡奇从列宁主义的战略层面转移到对民主社会主义者统治原理的探索，并非是对列宁主义的排斥。《民主化的进程》是反斯大林主义的，而不是反列宁主义的。卢卡奇在列宁和斯大林之间划清了界限。卢卡奇谴责斯大林主义，认为那是官僚极权主义的一种形式。他认为列宁的遗产是抵制官僚极权主义。在1924年，卢卡奇认为列宁是一个夺取政权的政治战略家，而在1968年，他谈到《国家和革命》中的这些部分，讨论了列宁的“习惯”或“养成习惯”一词，从这些用语中看到卢卡奇对社会民主化的列宁主义的承诺。对卢卡

---

<sup>①</sup> 赫勒：《卢卡奇的晚年哲学》，第177—190页。  
Heller, *Lukács' Later Philosophy*, pp. 177 - 190.

奇来说，忠于列宁主义就是对斯大林主义的最好反击。

本文所包含的观点就是试图反驳那种认为卢卡奇是斯大林主义代言人的说法。卢卡奇是斯大林学派代言人的最主要拥护者是莱斯泽克·柯拉柯夫斯基，在柯拉柯夫斯基极具代表性的作品《马克思主义的主流》<sup>①</sup>的第三章《卢卡奇或服务于教条的理性》中可以看出他的这种观点。卢卡奇是斯大林主义者的观点也在乔治·李克斯姆的《卢卡奇》<sup>②</sup>和维克特·齐达的《乔治·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sup>③</sup>这两部更早的评论中有相应的表达。卢卡奇和斯大林主义的关系过于复杂，以至于在这里不能详细讨论。可我认为，他确实拥护斯大林主义的某些方面，比如《俄德 1939 年条约》。但是，1956 年之后卢卡奇反对斯大林主义却是无可辩驳的（参见《致艾伯特·卡罗西的信》）<sup>④</sup>。我认为，他的反斯大林主义在其 1930 年代作品中已经很明显，至少在文化研究领域是如此。在他反抗希特勒主义的斗争中，当他深思这种反理性的种族主义是如何威胁德国启蒙运动人文主义传统时，卢卡奇把自己与 18 世纪德国文化中的民主主义和理性主义方面联系在一起。尽管他意识到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已经包含了 18 世纪的人文主义，他确认歌德是资产阶级启蒙的典型表现。像

① 莱斯泽克·柯拉柯夫斯基：《卢卡奇或服务于教条的理性》，见《马克思主义的主流》（牛津大学出版社，1982），第 3 卷。

Kolakowski, Leszek, "Lukács or Reason in the Service of Dogma" in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Vol. III.

② 李克斯姆：《乔治·卢卡奇》，（伦敦：威金出版社，1970）。

Lichtheim, *George Lukács* (London: Viking Press, 1970) .

③ 维克特·齐达：《乔治·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海牙：马提诺思·尼基霍夫，1964）  
Zitta, Victor, *George Lukács' Marxism*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64) .

④ 乔治·卢卡奇：《艾伯特·卡罗西简介》，见《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主义》（慕尼黑：R. 派珀，1970）。

Lukács, George, "Brief in Alberto Carocci" in *Marxismus und Stalinismus* (München: R. Piper, 1970) .

恩格斯一样，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文化既源于又超越了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

卢卡奇这种对民主的转变也延伸到了他在 1930 年代对俄国文化的研究。在他的随笔“俄国民主文学批判的世界意义”一文中<sup>①</sup>，[第 27 页] 卢卡奇把托尔斯泰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作为 19 世纪平民民主的激进潮流的代表，这最终引发了 1917 年俄国革命。在 1945—1947 年间，卢卡奇被看作匈牙利“新民主”——一个基于《1928 年勃鲁姆纲领》和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农民与工人阶级政治经济联盟——的倡导者，和保留农民个人财产的拥护者。卢卡奇对列宁工农民主专政观点的信奉（基于 1905 年的苏俄模式），对于德国启蒙运动中理性人文主义和民主原则的坚持，对于斯大林主义的无产阶级艺术美学的反对，以及对于自己批判现实主义形式的支持，这些都可以清楚地说明他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思想倾向。所以，卢卡奇并非斯大林主义的捍卫者，而是从一开始就是其批判者。

卢卡奇认为，斯大林主义是畸形的马克思主义。斯大林主义的缺陷是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正如卢卡奇在列宁和斯大林之间做了区分一样，他反对所有把斯大林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然后又通过斯大林批判社会主义的企图。卢卡奇走了一条与鲁道夫·巴霍《东欧的抉择》<sup>②</sup>不同的道路，在这本著作里，鲁道夫·巴霍混淆了斯大林主义和社会主义，并且最终抛弃了社会主义。鲁道夫·巴霍把反斯大林主义等同

---

① 乔治·卢卡奇：《俄国民主文学批判的世界意义》，见《欧洲现实主义》（纽约：克洛塞特与克罗夫，1964）。

Lukács, George, "The International Significance of Russian Democratic Literary Criticism" in *Studies in European Realism* (New York: Grosset and Dunlop, 1964) .

② 鲁道夫·巴霍：《东欧的抉择》（伦敦：新左派丛书，1977）

Bahro, Rudolf, *The Alternative in Eastern Europe*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7) .

于反社会主义，而卢卡奇一直都是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为了挽救社会主义，卢卡奇发现摆脱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是必要的。

在《民主化的进程》中，卢卡奇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新定义。他打破了第二国际的生产力主义和经济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解模式，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理解模式也影响了列宁和斯大林。经济匮乏是19世纪最重要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社会主义被定义为通过富足来克服贫困。卢卡奇打破了这种经济优先模式，并把社会主义的定义从经济分配问题转到政治上来。对于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社会主义不是强调物质富足的优先性，而是民主。

卢卡奇把社会主义界定为保障社会更大民主的唯一途径。财产国有是扩大民主的唯一途径。一个人是社会主义者是因为他拥护更深度的民主，因为社会主义是唯一一个超越资本主义议会制的民主形式。

卢卡奇的后期作品《审美特性》《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和《民主化的进程》构成了相互补充的三部曲，它们的共同目的就是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复兴。[第28页]他的方案是把马克思主义从斯大林主义中剥离出来，以显示苏联官方意识形态之外的马克思主义的创造力。他不仅以反对斯大林主义而且以反对西方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来重申马克思主义的活力。卢卡奇不是列夫·托洛茨基，一个从东方跑到西方的逃亡者，并且成为了谴责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卢卡奇一直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正如卢卡奇希望把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主义区分开来一样，他也希望能通过捍卫重新确立的马克思主义来反对他的西方的批评者。

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最重要的理论要素是卢卡奇重新认识到的市民社会或类存在和国家的区别。对于马克思和卢卡奇来说，



政治问题就是政治权力的基础。问题是权力应该授予起源于人类日常生活之外的国家，还是应该授予作为人的类生活的直接表达的公民社会？马克思和卢卡奇都支持把权力授予市民社会。

对于卢卡奇来说，政治是制定社会决策的规则和争执的仲裁。政治向来都是社会的必需品。卢卡奇抛弃了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提到的一个没有冲突的社会是可能的观点，放弃了社会同质化可以消除社会冲突的普遍原因的列宁主义观点。因为政治自古以来都是社会所必须的，所以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国家或市民社会，哪一个能成为权力执行和决策制定的政治基础。卢卡奇和马克思都信任市民社会的政治化，因为市民社会是人类日常生活更直接更迅速的表达。苏维埃代表会议是这种市民社会政治化的适合机构。政治进程不是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提到的那样是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的结果，而是一个民主成长的场所。

卢卡奇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提供了方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理论的议程需要政治进程和机构的革新以扩展民主的领域。民主不是一个有终点的状态，而是一个依据其底层社会结构而必须被经常地重新定义的状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负有发现能够朝着民主的普遍化迈进的政治责任。

《国家与革命》和《民主化的进程》之间的不同之处就是列宁把政治定义为阶级简化论的模式，而卢卡奇把政治定义为社会进程。以简化的阶级观点为起点，列宁认为阶级的消灭就意味着政治学的终结。从过程的观点出发，卢卡奇认为没有程序的一致性，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卢卡奇从政治学的阶级定义转到了程序定义。

卢卡奇以市民社会代替阶级，这种市民社会对阶级的替代是至关重要的，[第29页]因为它把注意力集中于没有规则就没有公民

社会这一事实，以及政治是所有公民生活的必要功能的事实。市民社会对阶级的替代是马克思政治学理论的社会学基础。在卢卡奇的政治思想中，市民社会替代阶级成为马克思国家理论的基本要素是一个重要的范式转换。

我上文中所提出的观点为卢卡奇复兴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企图提供了基本原则。《民主化的进程》也是一本很具体的书，为了使这部书的复杂含义更为清晰，阐明其一些细节是必要的。只有当《民主化的进程》的细节很清晰的时候，卢卡奇复兴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所有方面才会是清晰的。为了清晰起见，我把要讨论的问题分为两部分：1) 对布尔什维克的历史编纂学、经济主义、庸俗社会学的超越；2)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建构原则。下面的大部分讨论都是针对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因为我希望证明的观点之一就是卢卡奇对这部作品和整体上说的布尔什维克政治理论的取代。

## 对布尔什维克的历史编纂学、经济主义、庸俗社会学的超越

《民主化的进程》必须被置于它的历史时代，这里有四个条件可以帮助澄清这部作品：1) 它写于1917年俄国革命之后；2) 它写于二战之后；3) 它写于斯大林死后和第二十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之后；4) 它写于捷克斯洛伐克的亚历山大·杜布切克改革运动之后。

《国家与革命》成书于1917年7月，四个月之后布尔什维克取

得政权，该书的着重点在于夺取政权。这是一本革命战略指南。<sup>①</sup>《国家与革命》用起义策略代替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统治艺术，是布尔什维克毁坏政治学理论的首要原因。

卢卡奇的《1928年勃鲁姆纲领》是寻求联盟政策以阻止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出现。像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一样，卢卡奇的《1928年勃鲁姆纲领》也要求工农联盟，但是卢卡奇把这种联盟政策看做阻止极权主义发展的方法。在1930年代后期，卢卡奇是人民阵线的倡导者。

法西斯主义时期卢卡奇只有两种选择，极权主义或民主主义，而卢卡奇选择了后者。〔第30页〕民主有多种形式，他在1968年所拥护的民主形式不同于他在反法西斯主义期间所拥护的形式，但其不变的主题是对与一些资产阶级民主传统保持联系的无产阶级力量的需要。

在广义的社会学范围内，卢卡奇是一战时期不反对文化与政治融合的中欧知识分子的一个例证。在狭义的政治架构内，卢卡奇一直都是共产主义者。自从1918年12月加入匈牙利共产党以后，他一直把自己的角色定位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战士。于是，他的政治作品必须被当做是对当时具体情况的反应。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功能之一就是为证明共产主义战略提供智力支持。这并不意味着卢卡奇是不诚恳的或狡猾的，而是意味着他试图通过联系不同的历史环境来维护共产主义的传统。

---

① 当代对社会主义与民主间关系的讨论是1970年代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硕果。诺伯特·鲍比欧在此问题上的著作必须被看作欧洲共产主义运动成功地利用出自于过时的布尔什维克政治思想意识的社会主义思想的表达。鲍比欧尤其深邃地看到列宁1917年的革命战略最终成为布尔什维克国家理论的基础。见其文章《社会主义民主？》和《有马克思主义国家教旨吗？》，均见其《哪个社会主义？》。

人们普遍认为在《布鲁姆提纲》带来的狂热之后，卢卡奇放弃了政治生活。<sup>①</sup> 根据这种观点，卢卡奇被开除出匈牙利共产党，结束了其主动的政治参与，此后转而致力于文学和哲学研究。这种解释违背了卢卡奇作为一个有政治自觉意识的知识分子的自我界定，因为卢卡奇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政治参与，唯一的问题是政治参与的形式。<sup>②</sup> 1918年至1928年的10年是勾画卢卡奇从参加到退出匈牙利共产党的10年，也是在这10年政治行动主义时期，他参加了贝

① 参见费伦克·弗赫尔的文章《卢卡奇在魏玛》以及艾格尼斯·赫勒的文章《卢卡奇晚期哲学》，两篇都出现在《重新评价卢卡奇》中。赫勒和费赫尔都认为晚期的卢卡奇从政治学退却向伦理学与美学中。虽然正确地确定1930时期是卢卡奇事业的转折点，他们两人都认为他的晚期著作《审美特性》形成了他1945年以后思想的轴心。本绪论表达的观点与赫勒和费赫尔的评价相矛盾。赫勒把卢卡奇看作写了一部“历史哲学”，费赫尔把他描述为拥护魏玛式的“古典主义”。而两人都认为他从政治事业中渐行渐远，放弃了积极的“游击队员”角色去寻求伦理学和思辨美学。弗赫尔的文章《卢卡奇在魏玛》坚持《审美特性》认为主客体的统一只能在审美经验中实现。而我拒绝接受这一观点，因为这似乎忽视了卢卡奇不懈地参与政治以及他1968年的作品。试图把晚期卢卡奇描述为退却向魏玛式的“古典主义”，似乎违背了卢卡奇对实践哲学的一贯追求，以及他的认识，人类存在的本体论总是以社会存在为基础。与赫勒—费赫尔的解释相反，我坚持卢卡奇依旧是知识分子的游击队员、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成员。除非把卢卡奇的作品看作他所面对的政治形势的反应，否则就不能理解他的作品。甚至在《布鲁姆提纲》后，甚至在被从匈牙利共产党开除以后，卢卡奇1930年代以后的作品也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政治事件。把卢卡奇看作退却向魏玛式的“古典主义”就是歪曲他的政治承诺的坚韧。赫勒和费赫尔提出了一个对卢卡奇的唯心主义解释，因为他们寻求把他与他自己的“社会存在本体论”分离开来，并把他作为一个康德主义者、一个寻求一种“伦理民主”，或者一个在思辨美学的王国中逃避20世纪政治的残酷性的人。

② 斯齐克莱·李斯乐：《乔治·卢卡奇与热亚特》（韦恩：欧巴克·林格，1986）。斯齐克莱是布达佩斯卢卡奇档案馆的馆长。在此书中，他采取了反对赫勒和费赫尔的立场，认为卢卡奇始终是游击队员。我在绪论中对此非常赞成。专注于1930年代后期，斯齐克莱展示了在那以后卢卡奇的思想奋斗是怎样由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而形成。在他与希特勒的斗争中，卢卡奇用德国启蒙运动中的民主传统武装自己。在与斯大林主义的斗争中，卢卡奇用德国启蒙运动中的人文主义传统武装自己。根据斯齐克莱的意见，卢卡奇的写作绝不可以与直接的政治危机分离开来，而应该看作一种力量，政治事业的力量。

拉昆共产主义政府。在他被匈牙利共产党开除和法西斯兴起之后，卢卡奇政治参与的形式发生了改变，但是思想主旨没变。卢卡奇的政治行动主义直到他在 1956 年 10 月进入纳吉的匈牙利革命政府之后才停止，但是他的政治参与在其著作中得以继续，它们很少不带有政治含义。在与欧洲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卢卡奇作品带有明显的政治性。在他的小说研究中，无论俄罗斯还是西方，他都发现了欧洲文化生活在法西斯主义和民主制之间的两极分化。卢卡奇拥护民主制，这也成为他在 1953 年斯大林死后要求对共产主义社会进行民主改革的根源。卢卡奇对民主理论问题的探讨并非是政治上无关痛痒的，而是现实政治改革得以被制定和追求的思想基础。卢卡奇是东欧不服从和革命的一个主要源泉。

《民主化的进程》的历史背景是 1968 年东欧的社会主义。他的问题不是生产资料的国有化、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或根除资产阶级统治，因为这些都已经完成了。[第 31 页]《民主化的进程》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方向转变到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管理而强调规则的必要性。

《民主化的进程》是作为对 1968 年苏联对杜布切克改革的摧毁的回应而写的。这是一个支持反对斯大林主义的东欧改革主义运动的声明。正如卢卡奇是 1956 年匈牙利革命的参与者，《民主化的进程》是他对 1968 年“布拉格之春”的基于社会本体论的哲学证明。

在这样的历史限定下，卢卡奇通过终止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再到共产主义的三阶段论而超越了布尔什维克的历史编纂学。卢卡奇通过两种方式放弃了正统的布尔什维克历史编纂学：他不再谈论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演进；他用社会主义民主观念取代了共产主义观念。

卢卡奇在《民主化的进程》中提到了共产主义思想，为了解

这一思想，有必要区分“内在式共产主义”和“启发式共产主义”。我用“内在式共产主义”这个术语表示作为历史阶段必然的共产主义处于可以预测的范围内。“内在式共产主义”出现在《国家与革命》中，因为列宁认为共产主义必然会紧随着社会主义而来。它是历史发展的目的，因为它存在于他试图界定其一些特征的未来。通过“启发式共产主义”，我想表示一种作为未来的可能性的共产主义。“启发式共产主义”是未来的导向，它指的是民主完善的持续过程。“启发式共产主义”不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最终阶段，而是历史应该朝其演进的一种价值。

当卢卡奇在《民主化的进程》中使用共产主义一词时，他指的是“启发式共产主义”。他指的是引导人类走向未来的一种可能性，而不是指内在的历史过程的必经阶段。列宁、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使用的“共产主义”是指“内在式共产主义”，卢卡奇用“启发式共产主义”改变了这个词的含义。共产主义的必然实现不再是卢卡奇的论题，因而“内在式共产主义”一词也淡出了他的政治术语。作为正统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机器的一部分——也就是使共产主义成为历史进程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证明的一部分，已经消亡。对于卢卡奇来说，作为千年王国的共产主义不再存在。

卢卡奇抛弃的另一部分正统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是认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等同于无阶级社会的观念。[第32页]《民主化的进程》是一个绪论，因而在其中这个再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一些特征卢卡奇无法深入讨论，社会阶层问题就是这些领域之一。然而，在卢卡奇的文章中既没有提及社会主义，也没有提及“启发式共产主义”是无阶级差别的。在社会阶层问题上，很明显，卢卡奇区分了阶级和其他社会群体形式或社会阶层。阶级适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而群体是指由于其它各种纽带而非所有制相互联系在一起

的社会阶层。在这个定义下，社会主义社会消灭阶级是可能的，但不是其他的社会群体，如教授、工程师、社会劳动者和产业工人。卢卡奇放弃了把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等同于社会同质化的思想。在上面提到的定义中，社会主义是这样一个社会：在其中社会阶层、群体依然存在，因为群体、非财产性的联盟的存在不是对民主的破坏。在放弃无阶级差别的思想后，卢卡奇推翻了正统布尔什维克经济和管理平等主义的思想。民主的进一步深化不在于社会的同质化，而在于对所有社会阶层的政治授权，以使所有的社会群体都不被排除在政治主权之外。

正统布尔什维克主义把共产主义作为历史的最终阶段。在历史唯物主义和布尔什维克政治理论之间存在一个矛盾。作为一种模式，历史唯物主义是基于历史进程是持续不断的假设的一种社会分析形式。然而，在政治理论中，布尔什维克却坚持共产主义是历史进程的终点的思想。共产主义被披上了千年期待的外衣，从这种观点来看，它被认为是一个无法超越的完美社会。

卢卡奇确实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理论之间的分裂。共产主义不能被设想为非历史的阶段，所以政治理论必须被历史化。卢卡奇拒绝了共产主义的末世论解释，而是认识到政治理论本身必须具有历史真实性。在卢卡奇的书中，他没有使用“民主”一词，因为这暗示着一种歧义，一个特定的政治形式的固定模式。相反，他使用“民主化”一词，指的是民主进程：民主制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扩大市民参与管理的探寻之路。

卢卡奇不再使用末世论意义上的共产主义，作为一个新的耶路撒冷，其历史性的实现正在迫近。共产主义暗示着非历史性，而卢卡奇则试图建立一个以历史事实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第33页] 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目的不是描述共产主义社会，而是去

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如何才能民主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卢卡奇用更深层次的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化思想代替了共产主义思想。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化进程的一次胜利，因为它把生产资料置于党的手中。社会主义革命要求的是民主化进程超越经济而进入到政治领域：把生产手段的党所有制转变为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

卢卡奇是正统布尔什维克历史编纂学的终结，这种历史编纂学试图把历史划分为三个必然的阶段。卢卡奇不但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范式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他也取代了正统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机器的其他方面。诸如“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国家”“国家消亡”“消灭资产阶级”“公社国家”等概念，都没有在他晚期政治作品中出现。所有这些概念作为革命战略对于布尔什维克主义是至关重要的，它们不再与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复兴发生任何联系的事实，说明了一个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时期的结束。正统的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已经过时，这些理论概念的废弃也意味着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机器的死亡。正如卢卡奇从1918年直到1924年的早期政治作品《列宁》为布尔什维克主义提供了最优秀的理性辩护一样，他1968年的《民主化的进程》宣告了正统布尔什维克政治理论的死亡。

为了看到卢卡奇在拥护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同时取代正统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如何可能的，就有必要在这两种布尔什维克主义形式之间做出区分。在谈到正统布尔什维克主义时，我指的是从列宁到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思想的共同体，尽管在列宁和斯大林之间有分歧，二者之间也有连续性。正统布尔什维克主义就是指这种思想具有连续性的领域，比如第二国际政治理论的不朽。正统的斯大林式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列宁式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分离起源于列宁和斯大林之间的不同。因此，对卢卡奇来说，在拥护列宁



式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同时攻击斯大林式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就有可能了。斯大林式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官僚极权主义的同义词，而列宁式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把苏维埃视为统治的核心。“列宁主义反对派”就是反斯大林主义的。目前在东欧和苏联进行的改革运动中，卢卡奇作为其哲学先驱，成功地摧毁了斯大林式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同时也成功地证实了列宁式的布尔什维克主义。

卢卡奇保留的一部分列宁式的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是苏维埃思想，[第34页]这是列宁主义反对派的特征。卢卡奇把它们看做有助于把党从国家分离出来的制度，因为苏维埃可以接管国家的功能从而把党从国家中分离出来。《民主化的进程》充分信赖苏维埃的观念，因为这是直接民主的制度。卢卡奇轻易地忽略了一个事实：列宁在喀朗施塔得叛乱中使其遭受近乎致命的伤害。

卢卡奇抛弃的正统布尔什维克主义意识形态机器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国家和政治消亡的思想。在《民主化的进程》中，卢卡奇要求的是党和国家分离，这使其国家和政治是所有统治形式的必然特征的观点广为人知。另外，当卢卡奇把社会主义社会描述为一个由苏维埃掌权的社会或作为一个日常生活是由政治授权的领域时，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如果没有国家，这些活动就无法进行。社会主义就是民主化冒险行程的舞台，没有国家，作为一种程序和协议的民主是无法存在的。卢卡奇确保了无国家和无政治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术语中被去除，这也是对正统布尔什维克主义意识形态的更进一步的净化。

就哲学基础而言，卢卡奇槟除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功利主义和行为主义偏见。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以及第二国际的整个政治理论的哲学假设，都有功利主义和行为主义倾向。第二国际时期，心理学取代了政治思辨。第二国际的基本假设是人可以通过心理以

实现协作，因此改造的艺术代替了政治家的技能。卢卡奇超越了这种把政治学还原为心理学的观念，重新把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置于希腊语“城邦”（polis）的理念之上。卢卡奇寻求的是重建公众和个人的统一，而不是通过心理训练来消灭个人利益。

边沁是第二国际政治理论的哲学教父，他的人类观——发源于17和18世纪的观点——是：人是欲望的产物。人类有需要，没有满足的需要导致自利，而自利是社会冲突的根源。相反，如果需要被满足，人类就是和平的，就没有社会冲突。和平是目的，满足是解决社会冲突的手段。功利主义心理学的深层假设就是行为主义：通过对快乐和痛苦的适当调整以及对人类需求的满足就可以导致合作式的和谐。

对于人类心理采取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途径，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实现没有冲突的人类社会是可能的。[第35页] 如果需要的满足是克服冲突的最有效方法，那么政治就能被取代，如果没有任何冲突和个人利益需要裁定的话，那么任何政治秩序都没有必要。

卢卡奇超越了第二国际政治理论的哲学基础，他反对对于人类行为的心理主义途径并且致力于协调公众和个人的理想。他接受了一个个人和自利的世界，并且认识到社会协议和政治是协调利益冲突的需要。卢卡奇复活了城邦和谐的思想，他首先关注的不是无冲突情况的创造，而是人类潜能的充分实现。卢卡奇使自己致力于希腊和谐生活的理想，并且又一次把伦理和政治结合在一起。希腊和谐生活的理想预设了独立的、自我实现的、可以说不是个人的存在，并且希腊理想也使卢卡奇接受了以社会程序的方式使政治得以持续的需求。对于卢卡奇来说，政治不是统治，而是使和谐的个性得以实现的协议。

卢卡奇也超越了对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主义定义。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倾向于关注生产力。如果经济富裕是目标，那么富裕的方法就是技术的进步。注意力从生产关系转移到了生产技术，社会主义就变成了对技术官僚的宣传。获得工业现代化魔力的语言等将呈现出以下形式：技术是生产力的基础，生产力是经济富裕的条件，经济富裕是和平得以产生的前提，和平是无冲突社会的关键。在经济主义者的模式中，共产主义等同于先进技术。

随着对生产力—经济主义的社会主义解释的替代，卢卡奇也拒绝了“庸俗社会学”，或者说拒绝了用阶级和经济收入解释一切社会事件的尝试。尽管许多不同之处把列宁和斯大林分开了，列宁依然是一个“庸俗社会学家”，而这在斯大林那里发展到了极致。庸俗社会学的同盟军是基础—上层建筑模式，根据这种模式，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它的文化、政治、法律，仅仅是它的基础结构——阶级结构、生产方式的反映。这个基础—上层建筑模式也可以被称作社会现象学，一种认为法律、政治和文化都是阶级利益的附带现象的社会分析方法。

根据这种社会现象学观点，文化和政治制度不能独立存在。全部政治机构，从政治理论到政党到国家，都可以还原为阶级利益。社会现象学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阶级的消亡与政治的消亡是同步的。

卢卡奇超越了庸俗社会学的所有形式。他认为这是对客观力量的无条件投降。[第36页]作为一个黑格尔主义者，卢卡奇尤其强调人类活动在历史演进中的作用。客观力量、自然界或经济趋势，在考虑社会发展时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意识主体的行为是提供社会演进终点的中介。因为他希望捍卫人类行为的因果中介，捍卫人类创造他们自己历史的马克思主义观念，卢卡奇拒绝庸俗社会学或者社会现象学的所有形式。

##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构建原则

卢卡奇希望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改造会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复兴。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重构是促使马克思主义一般理论复兴的一种方法，这能使马克思主义与后斯大林主义的世界相关联。卢卡奇想要创建的马克思主义是存在于1921—1925年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卢卡奇一贯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辩护者，但是他寻求再次复兴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形式是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列宁式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或与事实相悖的列宁式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一个列宁还未完完全摧毁的苏维埃运动的形式。

然而，为了理解卢卡奇的政治观点，有必要把它放在他的社会本体论背景中。他继承了哲学必须构成每一个社会学的思想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只有当社会科学或政治学与哲学结合起来时，一种自由的社会科学或政治理论——无论是作为方法论还是价值论——才能实现。要在这个论文里讨论卢卡奇的社会本体论的全部内容是不可能的。然而，我可以通过把他的政治理论与他的社会本体论在三个领域联系起来开始对卢卡奇国家理论的讨论：1) 社会本体论：历史主义；2) 社会本体论：实践；3) 德国人文主义和城邦理想。

### 社会本体论：历史主义

《民主化的进程》第一部分的标题是“资产阶级民主是社会主义改革的错误选择”，并且为民主制提供了一个历史主义的解释。卢卡奇抨击了民主制总是以一种永恒的形式存在的庸俗观点。[第37

页] 卢卡奇建议，民主制应该像其它任何社会结构一样，不断地改变其形式。也就是说，民主制必须以历史主义的观点来解释。

在卢卡奇的社会本体论哲学里，“过程”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观念。人类活动是社会经济领域的一个常数。虽然卢卡奇使用了“本体论”一词，他把本体论作为过程的同义词。假定了过程的重要性，卢卡奇断言所有的历史事实都来自于社会变化。卢卡奇从黑格尔的永恒运动的观点开始，并把马克思置于等式之中：社会变革是其他变革的基础。卢卡奇不想把过程变成海德格尔式的超验范畴。运动不能成为既存的非时间性的实在范畴。卢卡奇的社会本体论是对海德格尔的驳斥，是对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一种回应。它试图展示过程不是超验范畴而是一个社会生产范畴。

社会进程总是主客体力量的结果。主体的力量、自主的人类活动都是目的导向的；而客体力量，自然和经济的发展通过其自身的机械化过程而运动。主客体力量的联合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每个社会都是个别的社会组织的唯一统一体。虽然卢卡奇不把政治完全还原为经济，他也认为社会结构会影响政治信仰。随着社会结构的改变，那个社会的政治也改变。正如社会进程是历史存在的固有特性一样，民主也必须随着统治形式的改变而改进。在第一章《资产阶级民主是社会主义改革的错误选择》中，卢卡奇在分析社会主义民主之前，讨论了两种较早的民主形式：希腊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对待民主的历史主义方法不是说出一种民主形式，而是更精确地说出民主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呈现出的多种形态。

在这种人类历史主义的视角下，社会主义是人类变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卢卡奇于1930年在莫斯科读了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并深受影响，特别是马克思的社会现象学，在其中，马克思表明历史是人类的自然生成。这一生成的观点仍然是卢卡奇

思想的一个主题。他把社会主义作为人类通向自由的一个阶段。效仿黑格尔，卢卡奇把历史看成是人类自我教化的过程，社会主义是这个过程中的一部分，在这里民主制可以延伸到以前从未达到过的人类实践领域。

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自由得以扩大的必然前提。为了将自由扩大到人类活动的领域，[第 38 页] 生产资料国有化是必须的。这种力量必须被放在一般社会控制之下，以使社会了解如何才能最好的利用它们。国有化和社会化之间也有区别。国有化指的是所有权从个人所有向公有转化，而社会化指的是统治进程。国有化是走向社会化的第一步，因为在生产资料的民主化形成之前，所有权必须首先得以确立。人只有先体会到他控制了一个社会的社会劳动和社会生产工具，他才能被教育向往自由。自我意识是自决权的一部分，只有在抽象意义上认识到人类的能力，才能帮助一个人决定如何具体行动。

## 社会本体论：实践

由于深受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陈述的人类活动主题的影响，卢卡奇提出了一种社会生产行为哲学。人类实践是一种促进社会进步的力量，因为这是一个能不断完善周围世界的一种自我生成的力量。卢卡奇认为社会演进是两条发展线索的产物：人类劳动，这是主体；自然或社会环境，这是客体。人类劳动是有目的指向的，因为有意识的人设立目的。社会进步来自于人类实践和社会自然的相互联系，来自于人类意识试图利用社会自然实现他自己的目的。以此为基础，卢卡奇反对每一种认为历史改变是机械地起源于经济和技术的社会哲学。客

观主义只不过是另一形式的机械唯物主义，因为它主张变化只有依据物质力量才是可解释的。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哲学变成了客观主义，卢卡奇反对克里姆林宫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因为它剔除了主体介入的任何作用。

卢卡奇的实践批判行动哲学是建立在主体和客体相统一的观点之上的。人类活动是主客体的中介。人类介入是目的论的，它预设目的，这个目的利用社会自然作为工具。

卢卡奇的中介辩证思想维护了马克思主义的主旨：历史是人类的自我生成。人类的实践批判工作改善了社会自然环境，新生的社会自然环境又改善了主体，然后被改善的新主体又改善了客观条件。历史是人类的自我生成，因为改变主体的条件也是主体创造的，因此人类的改变是自我改变。行动的辩证法意味着人是一个建设性中介，[第 39 页] 他使其客观社会与自然环境人化以与其自身的客观本质相一致。

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是卢卡奇坚信人类与社会之间统一的逻辑基础。劳动也再一次成为人类和社会的连接纽带，因为社会是提供在其中主体能够工作的劳动条件的客体。人类和社会的结合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如果缺少任何一方，另外一方都是没有生产能力的。社会为人类行为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而人则是能改造社会的具有生产能力的力量。卢卡奇的实践批判行动哲学用生产能力代替了公民身份，成为希腊城邦理想复兴的基础。希腊人认为公民身份在城邦范围内提供了人类联合的基础，而卢卡奇认为劳动的辩证法提供了人类和社会的互惠纽带。

## 德国人文主义和城邦理想

《民主化的进程》是把民主的城邦理想重新应用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种尝试。它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置于古典的基础上，因为它使城邦理想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核心。卢卡奇的前驱罗伯斯庇尔和卢梭就试图在 18 世纪的法国复兴城邦理想。

卢卡奇试图带给社会主义的民主制是反资产阶级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把政治人和私人分开。资产阶级民主基于自然权利学说，把经济分离于政治人，把个人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精神分裂的产物，个人经济生活完全和政治生活分离。资产阶级民主不是把人性的各个部分整合到一起，而是分离它们。

卢卡奇认为社会主义为城邦民主制的复兴提供了合适的条件。卢卡奇没有从传统的自然权利开始他的政治思考。他最初关注的不是个人权利，而是公民和经济人之间的统一。他的主要目的是重建个人与公众的联合，而不是建立一个个人自由的制度上的保障。他是反资产阶级者，因为他的思想不是基于自然法或个人自由，而是劳动过程的互惠带来的社会联合。

在回归城邦民主传统的过程中，卢卡奇仍然保留了对于德国古典人文主义的真诚。[第 40 页] 处在 18 世纪资本主义世界的初期，席勒、歌德和黑格尔都意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分裂。席勒和歌德的喜剧和小说经常讲述有天才的个人被那个包围着他们的社会的庸俗价值所毁灭。当德国的人文主义哲学家认识到社会规矩和个人才能之间的悲剧性冲突斗争时，他们把希腊城邦的联合生活作为一种逃避这种典型的资产阶级困境的方法。

在其《理性的毁灭》一书中，卢卡奇看到了德国文化的两个极



端，反理性主义导致法西斯主义，人文主义作为民主制的基础起作用。就此而言，卢卡奇与斯大林主义是不一致的，因为当 1930 年代法西斯主义出现时，斯大林谴责西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民主是右倾极权主义的两种不同形式。卢卡奇寻求的是另一种路径，把民主看做是抵御法西斯主义的一种方法。斯大林主义导致俄国与西方社会主义和民主的隔离，卢卡奇与资产阶级人文主义启蒙的接近，使得他拥护“人民阵线”的策略，该阵线是所有反希特勒主义的民主力量的联盟。卢卡奇看到了把资产阶级民主模式提升为社会主义民主模式的必要性，他从古典德国人文主义传统中汲取了城邦崇拜。《民主化的进程》必须被看做是存在于德国古典哲学的城邦传统的继续。

卢卡奇试图展示的这种人文主义传统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中最能体现出来。卢卡奇的企图可以与恩格斯的文化斗争相提并论。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试图说明无产阶级是德国人文主义传统的合法继承人。卢卡奇的《民主化的进程》是以恩格斯的语言对文化合法性的一种尝试，一种试图展示古典传统在社会主义里已经找到其继承者的尝试。为了证实这一点，卢卡奇展示了城邦民主是如何与社会主义完美结合的。在为他非常重视的民主特征排序时，卢卡奇非常看重个人和公众和谐的理念，或者个人和社会联合的理念，这是德国古典哲学家的理想，卢卡奇认为该理想在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实现。

以上所讨论的卢卡奇的政治理论和社会本体论的关系展示了其社会哲学中国家理论的根基。现在更加具体地讨论他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建立的原则就具有了可能性。我分六个部分来讨论他的贡献：1) 类存在与国家的相通性；2) 人类学与解放；3) 私人与公众的统一；4) 民主的再界定；5) 社会主义的再界定；6) 纲要。

[第 41 页]

## 类存在和国家的相通性

卢卡奇的政治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区别。然而，卢卡奇使这种区别人类学化了。在《民主化的进程》中，他没有讲述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区分，而是讲述了类存在和国家的区别。“类存在”是费尔巴哈的概念，马克思把这个概念纳入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用来指人类的普遍本质。费尔巴哈之所以选择“存在”这个术语，是因为它提供了他所持有的人类社会学观点的本体论地位，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拒绝“存在”的这种本体论定义，而代之以社会演变的观点。卢卡奇继承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的观点，只要“存在”不被认为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会随着人类活动不断产生新的内涵，他愿意接受“类存在”这个术语。

因为假设当社会主义革命使生产资料国有化时也将终止阶级斗争，卢卡奇不再将市民社会视为阶级斗争的衍生物。预先假定了生产资料的集体化伴随着冲突迹象的消除，卢卡奇记述的是关于人类和国家之间的相通性。他设定主体和客体的一致，并且主张人类所需的工作条件是通过社会或者国家的提供而可以获得的，并且人类通过活动改进这些已有的条件，进一步造成社会和国家的改变。这种人类与社会之间的新陈代谢关系是基于需要与满足之间的互惠。人类需要工作以维持生计，与此同时社会给人类提供便利的活动条件。当卢卡奇写到人类与国家之间的兼容性时，他提供了一个整合公众与个人的基础。

此一新陈代谢的主张也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再政治化提供了逻辑前提。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目的是市民社会的授权。马克

思主义不是政治学或国家的终结，但在政治权力被人类社会公共机构所掌控的时候，它将准确地反映人类的利益。市民社会的授权的概念意味着政治权力的普及，也意味着将政治权力下放到最接近人类利益的社会机构，目的是使这些政治权力能够准确地反映出这些需要。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预设了市民社会、类存在与国家的差异。对于马克思来说，政治的概念涉及到权力的运用：[第 42 页] 政治是权力在市民社会组织中的艺术运用，以使其成为人类利益的最好的表达。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不仅关注权力的运用，也关注政治权力的委托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直接授予市民社会对于政治权力的优先地位。

## 人类学与解放

对于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理论来说，《民主化的进程》只能是一种导言，而且卢卡奇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是建立在一种政治的人类学基础上的。政治推论的起点是人类学，当卢卡奇在这种语境中构建一种国家理论时，他超越了资产阶级政治思想。

像托马斯·霍布斯所提出的那样，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认为，人类最初是自私自利的而且处在一种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中。鉴于人类的自私本性，自然权利就被设定为一种保护型边界。权利就是对个人财产的法律保护，或者如洛克所强调的“财产权”。卢卡奇政治理论是从完全不同的人类学假设开始的。卢卡奇不想把人类看作天生自私的，他更倾向认为人类是团结合作地进入群体生活的。资产阶级人类学用原子性的术语来表述思想，卢卡奇的人类学却是用普遍性的术语表达，这种需要的普遍性是人类的所有成员都共享

的。卢卡奇不是从合法的禁令开始其推论，而是从人性的视角出发，这种人性就是人类的社会活动性，而首要的人类活动就是工作。卢卡奇不是把人类的首要需求看作权利或自我保护，而是实践，或者说目的是性的活动。卢卡奇从实践的人类学开始自己的政治理论。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人类活动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发展必然起源于人类实践。当卢卡奇在人类活动的基础上构建其政治理论的时候，他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实践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必须是一种政治的实践理论，这就意味着，政治必须被视为是能提高人类整体潜能的制度。

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对卢卡奇有很大影响。马克思反对费尔巴哈的人类学实在论，提出社会现象学的两个原则：人类通过其活动改变世界；人类的“存在”是每一代的人类活动不断创造的历史结果。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1条成为1930年之后卢卡奇所有工作的轴心，因为它包含了一种成为卢卡奇的社会本体论的中心的观念，这就是人类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卢卡奇也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1条中认识到，历史环境只能通过人类活动才会被改变：人类活动是历史演变的原动力。[第43页]

正如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将法律与政治联系在一起一样，卢卡奇的政治思想将经济与政治联系起来。人类实践水平的提高是与技术水平的发展导致的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相伴随的。在《资本论》第一章，马克思分析了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区别：必要劳动指的是维持工人与社会的生存所需要的劳动，而剩余劳动指的是超出必要劳动范围的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剩余劳动被资本家所占有。随着人类的劳动能力与条件的不断改善，像马克思一样，卢卡奇认为降低必要劳动、减少那些用来维持工人与整个社会的生活所需要的

必要劳动的工作时间是可能的。在社会主义社会，剩余劳动可能会消失，因为生产资料被国有化了。虽然剩余劳动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再存在，而必要劳动会继续存在，但耗费在必要劳动上的时间却会被缩短。必要劳动的削减意味着每一个个体会有更多的时间去发展自身。

卢卡奇论述了必要劳动的降低以及相应的个体自我发展时间的增加，这种自我发展就像他们在自由王国所期望的那样。马克思是第一个在《资本论》第一卷用“自由王国”这个短语的人，马克思的这个短语指的是一种社会，在其中，日常生活的最大量时间是受个体支配的。自由王国就是一种财产，这种“财产”仅仅是属于个体的，他可以随其所愿地自由决定其应用。自由意味着对必然性的超越。解放包含了时间上的置换：曾经必须被花在必要劳动上的时间现在可以被花在个体身上。自由王国与解放是自决的双重表达：它标志了自由使用时间的可能，这种生命时间被从必要劳动中解放出来，并可以按照个体的自觉目的而使用。

对个体性的这种强调也标志了与以前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分野，后者是高度集体主义的。正统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不论是列宁主义的还是斯大林主义的，都强调了人的社会性对其个体性的拒斥。这种对人的社会性的强调被视为克服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一种方式。卢卡奇破除了这种社会主义教条的传统，并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自我发展的理念。卢卡奇认为真正的个体性只有在社会主义中才能被发展。列宁和斯大林认为个体性是对社会主义的一种阻碍，而卢卡奇却把个体性视为社会主义的最高要求。在打破布尔什维克的集体主义传统时，卢卡奇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增加了两个主题：（1）古希腊理想与社会主义的结合；（2）把个体性作为社会主义伦理学的组成部分。

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必须从人类学视角出发汲取灵感，〔第44页〕此一人类学视角规定了其社会环境。对于卢卡奇来说，政治就是能够提高人类生产潜能的社会管理。政治必须处于人类图像之内，其目的是使世界更加充满人性。如果政治因而变成了人类学实践的一部分，那么这个意义上的政治概念应该是：政治就是生产实践，它关注人类生活，并能够带来人类生活的便利。

在两极极富挑战性的著作中，费伦克·弗赫尔把共产主义的极权主义的起源确定为这样的历史时刻：政治被视为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的一种方式。在他的著作中，《冰冻的革命：论雅各宾主义》<sup>①</sup>以及《专制战胜需要》<sup>②</sup>中的重要一章“为什么对需要进行专制不是社会主义”中，弗赫尔指出左派极权主义产生于1793年，当时雅各宾党人用政治手段满足了无裤党人的统一价格的要求：经济问题被从属于政治领域。

我并不认同弗赫尔的上述观点，因为我没有发现任何理由可以证明：对社会的授权就会导致专制。针对弗赫尔的观点，我提出两点反驳意见：（1）左派极权主义并不是根源于把经济从属于政治，确切地说是源于巴贝夫主义者的平等主义思想。经济不必像在第二国际时期那样，被定义为社会同质化，而是应被理解为对生产资料分配的控制，或者与狭义的“国有化”概念相对的广义的“社会化”的概念。（2）左派极权主义不是源于经济问题的政治化，而是源于政治问题的经济化，事实是政治被降低为社会平均主义。如果政治不是被降低为社会平均主义，而是被视为关于经济问题的社会

---

① 弗赫尔：《法国大革命》（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88）  
Fehér, *The Frozen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② 弗赫尔、赫勒：《专制战胜需要》  
Fehér and Heller, *The Dictatorship Over Needs*.

决策制定的一种自主方式的话，那么经济问题的政治化就不会必然导致左派极权主义。对于政策制定过程来说，遵从民主程序是可能的，因而也就能防止任何极权主义的干预。而同时，赋予政治以决策权就涉及到人类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如果政治被视为在社会授权的基础上的政策制定以及在此政治过程中的代表权的话，它仅仅意味着在政治过程中，社会是被代表的而且是独立自主的，但并不意味着政治过程不能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发生作用，因而也不意味着政治过程不能不受某一个支配性政党的任意支配。弗赫尔的观点是有缺陷的，因为他没有对政治过程中的代表权与此过程自身的程序作出区分。

## 公众与私人的统一

[第45页] 公众与私人统一的思想体现在卢卡奇的“日常生活”术语中。卢卡奇将古希腊的城邦理想视为克服西方资产阶级的“公民理想”的途径。

在梅恩哈德·普瑞尔的建设性著作《资产阶级社会的日常生活与荷尔德林著作中的虔诚派思想》中，他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日常生活细节对于卢卡奇和启蒙时期的德国人文主义一样，都是一个重要的关注点。<sup>①</sup> 对于18世纪的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来说，日常生活就是一种没有中介的日常体验。日常生活就是对我们的社会环境的直接的、不需要反思的体验。对于18世纪的诗人来说，在突如其

---

① 梅恩哈德·普瑞尔：《资产阶级社会的日常生活与荷尔德林著作中的虔诚派思想》（尼迈耶：图宾根，1983）  
Prill, Meinhard, *Bürgerliche Alltagswelt and pietistische Denken im Werk Hölderlin's*  
(Tübingen: Niemeyer, 1983) .

来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日常生活将公众与个人割裂开来，制造了一种远离自我的公民，并且强加了一种审美人格无法忍受的一致性。于是荷尔德林转向了城邦理想，并将之作为一种政治组织的形式，在其中人是一个和谐的统一体。不同于18世纪德国人文主义传统将审美体验看作一种中介，通过它人类的统一就能实现，卢卡奇用社会劳动取代了艺术。荷尔德林梦想着通过审美与沉思，一种和谐的人会得到复活。然而，卢卡奇认为和谐的人类只有通过协作的社会活动才会产生。像荷尔德林一样，卢卡奇回溯到了古希腊城邦的理想中，并且回到了一种取代疏远与异化的和谐的社会政治环境。

在导论的以下章节，我将介绍卢卡奇是怎样再次对民主的本质下定义的：他不是从托马斯·杰斐逊与美国宪法的角度，而是从城邦的观点出发对民主下定义。西方民主是在“公民”理想的基础上构建的，人类是一种政治—法律实体。卢卡奇想要扬弃公民理想，因为它是建立在人的二分基础上的，它将人分为“公民”与“经济人”。卢卡奇看到了两种民主传统在西方文明中的演进：一种是“权利”传统，它导致了“公民”理想和资产阶级民主；另一种是城邦理想，卢卡奇渴望它能在一种民主化的社会主义社会得以复活，其中，苏联要在这种民主化方面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卢卡奇对于日常生活的理解是建立在个体实践与社会基础上的。在卢卡奇看来，工作的作用是联合性的，它将个人与社会联合起来：在相互作用的需要中，工作将个人与社会联系起来。能动的人需要创造出可获得的工作条件，并且社会需要有生产能力的人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利用这些条件。



在日常生活中，“直接的日常关注”<sup>①</sup>是和“普遍的”问题相关联的<sup>②</sup>。[第46页]民主化的过程需要在社会主义社会实现，并且产生一种情况：在其中经济问题直接地与政治问题相关联。卢卡奇谈到雅典市场，在其中人们处理私人生活问题时，也可以讨论城邦问题。日常生活变成了一种惯例，大家集中在这里讨论更为普遍的社会问题。

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苏维埃体制，是一种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更畅通地连接起来的制度。这种制度是使日常生活中的普遍问题能够更为便利地得到辩论的代表大会。苏维埃是直接民主的表现形式，在日常集会中就可以讨论政治问题。卢卡奇被苏联1905和1917年革命期间的苏维埃图象所吸引，因为在这些革命过程中，苏维埃会议将日常生活与政治实践联系起来：它们是日常工作场所的委员会，它们不仅激活工人的需求，而且当工人越过界线，进入到异常关键的革命实践活动中时，它们起到了战略中心的作用。

卢卡奇的政治理论将苏维埃制度与城邦政治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是与卢卡奇对欧洲无产阶级作用的估计完全一致的，因为他认为无产阶级运动可以是古典人文主义传统的继承者。列宁式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城邦的融合是与卢卡奇赋予无产阶级的作用完全一致的：永远保持古希腊与18世纪德国的人文主义形式。

对于卢卡奇来说，政治就如革命时期的苏维埃所起的作用，必然包含着将工作场所转变成公共辩论的内容。政治意味着大众的日常工作集会在在工作场所都能实现，这使得任何影响国家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讨论。按照这种方式，日常生活就与普遍问题相连了。

---

① 卢卡奇：《民主化的进程》，第92页

Lukács, *Demokratisierung Heute und Morgen*, p. 92.

② 同上。

## 对民主的再定义

《民主化的进程》认为民主的持久发展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实现。只有消灭私有财产，作为一桩历史性事业的民主才能存活。如果一个社会增加了人类与社会、人的私人生存与公共生存的统一，这个社会就是民主的。虽然卢卡奇确实再次讨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个体性问题，但他对社会生产资料的强调证明他仍然是一个集体主义者。对于他来说，一个最民主的社会意味着能最有效地提高个体与其同类的统一。

民主也涉及到经济问题。假如一个社会能带来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这个社会就是民主的。[第47页]只有当一个人远离了匮乏，他才是自决的，因为经济奴役是自决的首要障碍。

## 对社会主义的再定义

卢卡奇打破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学模式，并且提供了对此社会形式的一种德国人文主义的定义：社会主义是人类自我教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卢卡奇采用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思维方法，后者将意识描绘为变得不断自觉并因而自决的过程。黑格尔所描绘的发展历程是一种朝向更高程度的自我反思的运动：通过对以前的自身行为的反省，意识认识并提高了自己的能力；而且一旦知道了自己的能力，意识也就因而变为自决。对卢卡奇来说，社会主义是社会教育进程的一个阶段：通过将生产资料置于社会手中，它将允许社会决定这些生产资料的用途。

卢卡奇对社会主义再定义的一个标志是他对价值的重新阐明。

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将价值界定为劳动时间，认为一个物体的价值就是制造该物体所用去的劳动时间。像他对民主的历史主义的定义一样，卢卡奇也对价值概念做出一个历史主义的定义。对价值的理解是随着所处社会的不同而变化的。一个社会就是一个整体，它会影响到的特殊部分。价值的两个定义反映了它们所处的两种不同的社会环境：（1）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价值；（2）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价值。

###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价值

劳动价值理论是资本主义的发明，体现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著作中。马克思受到了这些经济学家的影响，虽然他是对价值的历史主义的定义而独立创作的。马克思对劳动价值理论的关注反映了他所生活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环境。对劳动价值理论的兴趣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利益所在，因为在工厂工业时代，劳动看起来是价值的唯一源泉。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继续使用对价值的这种资本主义定义。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价值定义仅仅是资产阶级所发明的价值定义的庸俗形式。庸俗经济学是由斯密和李嘉图所开创的，却在斯大林那里完善起来。

### 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价值

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剥削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存在的。这种斯大林式的论点是建立在劳动是剥削的主要方式的观念的基础上：如果劳动剥削不存在了，剥削也就不存在了。[第 48 页] 按照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由于资产阶级的存在，劳动剥削是存在的。

如果资产阶级被消灭了，劳动剥削也就终止了，因为不存在一个去执行这种剥削的阶级了。社会主义是这样一个社会：因为资产阶级已被消灭，所以社会主义社会不再存在劳动剥削。

卢卡奇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剥削。他意识到政府机构和资产阶级一样具有剥削性。政府机构确实具有阶级性，并且像资产阶级一样有剥削性，这种观点最初是由德吉拉斯在《新阶级》一书中提出。

卢卡奇之所以能洞察到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剥削性，是因为他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价值下定义。价值不再被限定为人类劳动，而是被卢卡奇界定为人类的总体创造能力。虽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根除所有的剥削方式，官僚主义的剥削依然存在，但它提供了一种对价值进行再定义的新视角。由于生产方式现在掌握在国家手中，通过根除资产阶级，就可以把价值不仅仅定义为劳动，而且定义为一种更具有普遍性的含义。

作为其历史演进的一个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观意味着一种社会信念：使每个人的才能都能得到全面的发展。价值意味着人类的创造性。按照这种观点，教育与教育制度是价值，科学与科学知识是价值，技术是价值，因为它们都能提高个体的生产能力。正如在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从劳动而是从更具有普遍性的角度对价值进行定义一样，在社会主义社会对剥削的定义也是普遍主义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剥削意味着对劳动的剥夺，而在社会主义社会，剥削意味着对人类全面才能的任何方面的剥夺。

社会主义的定义也经历了一个历史演进过程。在19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社会主义被赋予了一个生产力式的经济主义定义。19世纪资本主义不能够生产足够多的物品分配给无产阶级，在这种经济稀缺的条件下，社会主义被定义为经济富裕。在卢卡奇式的定

义中，社会主义克服了其经济主义的畸形，而被定义为一种能提高总体社会价值的社会。卢卡奇提供了一种人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定义，因为它延续了古典人文主义的理想：人是人自身的目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致力于提高社会生产率，这样人类就可以从对自然的依赖中解放出来，通过这种解放，人类重新征服劳动时间并把它作为自由时间积累起来。

自由的概念也经历了一个历史演进过程。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自由意味着外部因素对私人决策的干预的免除，或者外部强制的消除。在社会主义社会，自由的概念变成了可以发挥所有的人类才能的自由。自由就是要增加社会便利，并允许发展人的内在能力。资产阶级的自由是消极的，指向外部因素；社会主义的自由是积极的，关注于内在的自我实现。[第49页]

## 纲要

虽然《民主化的进程》一书并不是纲领性的，但它的确包含了卢卡奇对自己所期望的具体政治改革的一些建议。卢卡奇所提倡的改革是“列宁主义反对派”的表达，而且也被视为在当前苏联与东欧发生的改革运动的一个标志。我从以下几个方面讨论卢卡奇所描述的纲要：党与国家的分离，苏维埃的恢复，工会的恢复，新经济政策与财产的非国有化，列宁主义政党的保留，对无政府主义的超越，用民主取代习惯，社会主义民主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再政治化。

## 党与国家的分离

卢卡奇提倡党与国家的分离，是因为他想把社会从党的控制中解放出来。他不想推翻一党制——正如我将在列宁主义政党的保留部分中所讨论的，但他的确希望把其他社会组织从直接的政党控制中解放出来。这些社会组织的解放同时也意味着这些得以恢复的组织获得政治权力。因为党允许它们参与社会政策制定过程。党与国家的分离就是想使受到压制的社会组织获得新生，并且能在社会政策制定过程中形成一些权威。

## 苏维埃的恢复

伴随着党取消它对市民社会组织的极权主义控制，苏维埃就变成了政治组织的主要形式。卢卡奇提倡共产主义社会应该再苏维埃化，社会可以通过这种政治组织再政治化。

卢卡奇把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作为东欧国家改革的样板。他没有认识到，正是列宁毁灭了苏维埃运动。他假定在整个新经济政策时期，苏维埃都是一个可行的政治组织。对列宁式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辩护或谴责都建立在如何评价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基础上。

## 工会的恢复

卢卡奇提到关于工会的那场争论，正是这场争论导致了布尔什维克党在 1920—1922 年间的分裂。在《再论工会、当前的局势以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1921 年）、[第 50 页]《新经济政策

时期工会的角色与功能》(1922年)中,列宁表明了自己对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会地位的态度。<sup>①</sup>在这场辩论中,列宁反对施略普尼科夫领导的工人反对派,也反对那些想把工会组织纳入党的控制中的人,譬如斯大林。列宁不是工会主义者,他不想使布尔什维克党放弃对工人组织的领导权。但他认识到,工会在党与社会中间扮演了重要的中介角色。列宁不是斯大林主义者,他不信奉凌驾于工会之上的权威主义政党,但他把它们视为党与群众沟通的重要渠道。卢卡奇希望回归到列宁主义关于工会的观点上去。

### 新经济政策与财产的非国有化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允许私人之间的小型商贸行为的存在,并允许小农拥有土地。因为把财产理解为生产资料——瀑布、油井、电气工厂——列宁把生产资料国有化了,但却允许那些不能增加总体社会价值的财产留在私人手中,譬如鞋店或面包店。新经济政策是列宁与农民的政治妥协,而且它给内战后的苏俄带来了社会和平。它是一种交换关系:列宁允许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作为回报,他获得了农民的政治支持。

《民主化的进程》并不明确表示要把小型商业行为与土地再私有化。但卢卡奇对新经济政策的一再赞扬以及他相信它代表了列宁式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最好形态,这些促使人们去猜测,卢卡奇赞同对

---

<sup>①</sup> 列宁:《再论工会、当前局势与托洛斯基和布哈林的错误》《新经济政策下工会的角色和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

Lenin, "Once Again on the Trade Union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he Mistakes of Trotsky and Bukharin" and "The Role and Function of the Trade Unions under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Lenin: Selected Works*, Vol. III.

不能带来总体社会价值的非生产性财产进行私有化。

在《民主化的进程》出书三年后，卢卡奇出版了《一生札记》，在这本书中，他明确表达了对私有化以及把市场运用到能发挥有效作用的领域的赞同。他写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的民主性重组（民主化与生产质量的内在联系）。在无法对整个生产进行集中控制的领域，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有效的。但是我们不能相信这些市场要素会使社会主义生产沿着正确的民主化道路前进。”<sup>①</sup>

《一生札记》也记录了卢卡奇对于农民土地所有制的支持，卢卡奇曾在其《列宁》与《布鲁姆提纲》肯定过它们。卢卡奇对于农民所有制的坚持一直延续到他1945—1948年在匈牙利期间，也就是所谓的“新型民主”期间，此间他提倡小农所有物的私有化思想。对于卢卡奇来说，农民与无产阶级的联盟为新型民主提供了经济基础，因为他在这种联盟中看到了穷人能在选举中赢得多数，而这种多数能提供一种社会主义的民主选举权。卢卡奇写到：“事实上，后来的历史进程证明《布鲁姆提纲》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匈牙利在1945—1948年，是工人与农民民主专政的具体实现时期，这一点我在1929年已经论证过。[第51页]当然，1948年之后，斯大林主义创造了完全不同的格局……但这是另一回事儿了。”<sup>②</sup>

“列宁主义反对派”这个术语必须扩展，以使其能包含所有赞同列宁在小农所有制的基础上的工农联盟政策的人们，而且这些人把这种联盟视为穷人的民主的经济基础。在不发达国家，工人与农民的联盟将会产生多数，而且这种阶级基础上的民主同时也意味着反对资本主义与拥护社会主义。“列宁主义反对派”这个术语必须被理

---

① 卢卡奇：《一生札记》，第168页。

Lukács, *Record of a Life*, p. 168.

② 同上，第178页。



解为那些追求实现穷人联盟的人们，这种联盟假定无权的人们的多数制将会是社会主义的。这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大众支持的一条道路。在支持列宁主义的观点“工农民主专政”的同时，卢卡奇再一次表明了自己的反斯大林立场，因为当斯大林开始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它要求土地国有化以及对农民的剥夺，卢卡奇就发出呼吁，希望能保障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

### 列宁主义政党的保留

卢卡奇确实不希望匈牙利实现多党制。他不希望将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搬到东欧。他想保留一党制，并把共产党作为行使教导性权威的政党。像列宁一样，卢卡奇也认为更高层次的自觉意识必须从无产阶级外部被灌输到工人阶级中去。而共产党就是将这种更高层次的自觉意识灌输到普通大众的来源。

卢卡奇赞同单一政党制度内部的民主化。他不希望一种在共产党之外的政党多元化，而是希望在共产党内形成多种观点。在这个问题上，卢卡奇再一次回到了“民主集中制”这一列宁主义模式。在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的塔墨菲统一代表大会上，列宁提出了党的民主化重组问题。他的《党的重建》一文，表明列宁认识到在俄国1905年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俄罗斯马克思主义政党也必须结束地下党，并应该开始内部的民主化进程。列宁相信，党以前的密谋性组织扭曲了党的民主性，而且必须经过一个民主化的重构过程才能迎接俄国新的政治现实中的挑战。<sup>①</sup> 卢卡奇是列宁主义民

---

<sup>①</sup> 列宁：《党的重建》，见《列宁选集》第10卷。

Lenin,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Party" in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X.

主集中制的拥护者，他反对斯大林对这个原则的改造。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保留了一党制，[第 52 页]但是却接受了意见或争论、竞争性选举、意识自由的党内多元化。

## 对无政府主义的超越

在仅有的与列宁存在分歧的几个方面之一中，卢卡奇批评了他的无政府主义观点。当卢卡奇反对无政府时，他不仅超越了《国家与革命》，而且超越了正统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对于共产主义性质的思考，此一正统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政治理论的核心观念，成了专制主义的同义词。

卢卡奇认为，列宁把民主问题分为两部分：平民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

列宁把平民民主视为通过苏维埃制度和共产党来确立的大多数人的制度。列宁用“穷人民主”这个词，因为俄国绝大多数的人都很贫穷，那么穷人民主自然也就意味着绝大多数人的统治。卢卡奇将平民民主当作《国家与革命》的精神，并因此将此书视为关于民主的伟大著作。无论列宁还是卢卡奇都认为平民民主是民主的实质所在。

列宁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因为他认为这是民主的腐败形式。资产阶级民主等同于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并且是阶级统治、多党制、议会制和国家的制度表现形式，列宁抨击的民主主要是指资产阶级形式的民主，因为他认为资产阶级民主违反了民主的实质。卢卡奇在这一点上也同意列宁的看法，并将《国家与革命》视为反对民主的资产阶级形式的重要历史文献。

列宁的问题在于他把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指责等同于对无政府主

义和专制主义的指责。资产阶级民主等同于阶级统治，当列宁反对资产阶级形式的民主时，他同时也犯了反对阶级和国家的错误。列宁陷入了“语言学崩溃”的误区，他将民主混淆为阶级统治，并认为反对阶级统治就必须克服民主。

当列宁将平民民主混淆为无政府主义时，《国家与革命》的观点就发生了错误的转向。当列宁不把平民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形式或者民主的内容时，他犯了语言学上的错误，但是他从来没有对平民民主的正确形式提出过质疑。

由于列宁没有对国家的形式与内容进行分析，《国家与革命》倒向了专制主义。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的确对民主的形式与内容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平民民主是内容，资产阶级民主是形式。他踌躇于对国家问题的历史主义的分析，[第53页]并且不打算区分国家的内容和形式。列宁处于一种异教徒式的思维之中，因为他认为存在于历史上的国家形式是国家的永恒的形式。列宁的理论由此变为庸俗的政治理论，因为他认为国家作为统治的工具是不变的。由于陷入异教徒式的政治思维之中，列宁只能通过呼吁取消国家来避免对国家作低俗的定义，那就是阶级统治的制度化。列宁之所以赞同无政府主义和专制主义就是基于他将资产阶级民主和对国家或者低俗或者趋于形式化的定义联系在一起。

列宁并没有对国家进行完整的历史主义分析，他从不追问国家的实质。对国家和政治仅做内容—形式的分析似乎已经表明政治作为社会契约的决议。当列宁不进行内容—形式的分析时，他没有保留国家和政治的实质，而仅仅保留了等同于阶级统治的国家政治的形式。

鉴于列宁的错误，卢卡奇将政治定义为做出决策的协议以代替无政府主义。对他而言，民主被理解为达成决策的程序，从而避免

专制。在《国家和革命》中民主要求无政府，而在《民主化的进程》一书中民主仅仅在政治秩序内才是可能的。

### 用民主替代习惯

卢卡奇也对列宁的习惯概念进行了双向分析。在《国家和革命》中，列宁用习惯这一观念来代替政治程序，并将之作为民主最后形式的同义词。列宁已经致力于无政府主义和无政治主义，那么他就必须回答下列问题：如果国家和政治都不存在，社会将按照何种规则运行？列宁的答案是习惯。因为没有国家和政治，他仅能确保人们通过社会义务的训练来养成习惯。习惯是形成惯例的社会行为，从而就没有必要制定任何规则。

当卢卡奇评价将习惯概念当作民主最后形式的时候，他对之高度称赞。《国家和革命》的一方面是它的民主化的平民主义，社会的实际进程总体上是由大多数人民来推动的。当卢卡奇评价用习惯概念来代替政治程序的做法时，他做出了否定性的评价。列宁想要展示博学的回答，即行为主义能够和社会契约完成同样的任务：行为主义能够确保人们在无政治强制的状态下仍能发挥社会功能。卢卡奇则用民主取代了行为主义，他用政治学代替了心理学，他认识到需要用契约来确保社会达成集体的决定。

### 社会主义民主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再政治化

《民主化的进程》是对民主和国家的概念所作的内容和形式的分析，[第54页]它阐释了当民主和国家的形式改变时，民主和国家的内容可以保持不变。民主和国家的内容依赖于每个社会对便于做

出社会决定的程序和制度的需要程度。民主在根本上是对程序的普遍同意，而国家和政治只是确立了便于实施程序的制度。通过透视民主和政治的内容，卢卡奇认为这个内容必须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部分。社会主义社会是民主的另一种形式，但是却是一种能够拓展民主的形式。社会主义社会不是历史演变的最后一种形式，因此它也需要政治组织的内容。《民主化的进程》指出苏维埃的政治制度为在社会主义下民主的激进化提供了便利。

《民主化的进程》超越了《国家和革命》，因为它仍然植根于历史主义方法论。<sup>①</sup>《国家和革命》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原则，因为它将共产主义作为历史发展的最后阶段，而马克思从未预见历史进程的尽头。《国家和革命》表明至少在政治和国家的问题上，共产主义社会是千年王国。《国家和革命》进行了一种弥赛亚式的预见，即阶级和国家的历史被永远地解决了。<sup>②</sup>

《民主化的进程》回到了马克思的历史主义方法。将无政府和无阶级做为社会演变的末世是不够的。无政府和无阶级肯定是偏离方

---

① 关于这一点参见 A. J. 波兰的《列宁与政治学的终结》。波兰假定《国家与革命》不包含政治理论是正确的，但他错误地假定列宁的极权主义正是政治理论缺失的原因。波兰的主要论点是《国家与革命》为官僚主义的权威性提供了理论上的合法性，并且由此可以发现斯大林主义的根源。虽然波兰明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国家与革命》中已经终结，他依然坚持不懈地拒绝认为在该文本中有任何民主成分。波兰致力于认为列宁是极权主义者，并且拒绝任何改变。《列宁与政治学的终结》追随列宁与斯大林是一条发展的直线的论点，而我拒绝这种解释。我不仅认为列宁与斯大林之间泾渭分明，而且赞成列宁的政治作品散发着民主精神的论点。

② 哈丁·亨特：《列宁的政治思想》（伦敦：圣马丁出版社，1977）第2卷。哈丁的著作直接站在 A. J. 波兰的对立面，尤其是关于《国家与革命》的章节。那是一个大胆的章节，大胆断言了《国家与革命》的民主前提。哈丁把《国家与革命》看作一篇激进民主的宣言，并且他是正确的。哈丁也认识到列宁的激进民主是天真的。列宁是可以追溯到罗伯斯庇尔的平民民主传统的一部分，不是公众安全委员会的罗伯斯庇尔，而是对巴黎公社做出回应的罗伯斯庇尔。波兰对列宁的极权主义解释完全忽视了他思想中的平民民主成分。

向的，“政治的终结”<sup>①</sup>被取代了，并且历史被看作民主化进程的继续。

一种保留了历史主义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用下列方式定义：创造一种新型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能够适应变化的历史社会环境，并且使民主的可能性彻底化。但是政治制度的这种再创造必须以表现主义的人类学视域作为其引力中心，即人是创造性的活动，任何政治制度都会限制人的能力。

---

① “政治的终结”这个短语取自于A. J. 波兰的书。我曾写过对波兰著作的详细评论，其中我的批判得以充分展开：参见我的评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辩证》（1987年9月）。在此评论中我指出导致列宁放弃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意识形态死胡同。列宁既是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已经进入的意识形态死胡同的受害者，又是使其永恒者。波兰不赞成这种意识形态的腐朽，所以错误地将其诉诸谴责列宁的专政倾向导致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死亡。

## 关于翻译的说明

[第 65 页] 卢卡奇的《民主化的进程》是在只争朝夕的心态下写出来的。这本书写于 1968 年 9 月至 12 月间，是在非常匆忙中写出来的，因此书中表现出了仓促的初稿所具有的所有特征和不完善之处。在写这篇本不完善的自传过程中，卢卡奇的创造才能和失败之处在三个方面有所表现。

此手稿是在 1968 年 8 月苏联镇压杜布切克改革运动之后的一个月后开始撰写的。那时，卢卡奇知道自己得了不能治愈的癌症并且意识到自己只剩下短暂的几年生命，他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将自己对苏联帝国主义的回答用文字记录下来。

自从卢卡奇希望对捷克马克思主义改革的被镇压做出回应时，他就被迫中止了《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的写作。他于 1963 年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修订，在他的《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他也希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修订。为了写《民主化的进程》，卢卡奇只能暂停《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的写作，而这本著作是他怀着极大的热情想要完成的。此外，卢卡奇迫切地希望完成一部伦理学的著作。正如我在引论中所提到的那样，他起初认为《民主化的进程》能够成为他的伦理学著作的一部分。为了写《民主化的进程》，卢卡奇必须打断《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的写作并且推迟撰写伦理学著作，而此后他再也没有机会开始伦理学的

写作。这些因素无疑加快了他撰写《民主化的进程》的速度。

卢卡奇的年龄也是一个因素。他出生于1885年，他在开始写这本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专著时已经83岁高龄。卢卡奇在他最后几年的时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原理的重新阐述。他急于这样做是因为他不想因为年龄或者死亡剥夺他复兴马克思主义的事业。

《民主化的进程》的原文非常难懂甚至有时不可理解，这就给译者留下了艰难的选择：要么消除原文的缺陷使之易读；要么基本上按照卢卡奇的原文将之呈现出来，尽管其中存在很多缺陷。

译者采取了后一种做法，这一做法不会影响读者理解这本著作的能力。卢卡奇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家，他已经成一家之言，对他的用语进行改动是一种冒昧的行为。[第66页]尽管他本人受工作环境的限制有很多不完善之处，但他仍独树一帜。

译者认为按照原文来呈现卢卡奇的著作会给读者提供一种直观的感受。文中的缺陷部分是让读者体会卢卡奇本人经历的最好方式，将他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原理在他有生之年付梓给他的思想带来的巨大压力。

由于以上原因，读者或许会发现文中有两处卢卡奇事实上作了重复的表述。这种情况之一是涉及他对马克思关于犹太人问题的引文，另外一处则是他对于萨德侯爵的评论。卢卡奇两次运用了马克思的引文和萨德侯爵的评论。译者保留了这些重复使读者能够体会卢卡奇当初写作的压力。

在《民主化的进程》一书中，卢卡奇在指称全人类时使用了传统的、男性至上主义的“人”或者“人类”。他深受古典德国人文主义哲学和语言的影响，而这两者本身都是存在性别歧视的。但是卢卡奇是1968年进行写作的东欧知识分子，女权运动那时处于初期阶段，不能对卢卡奇能够意识到后来被较为成熟的女权运动所揭示



的语言性别歧视现象抱有过高的期望。译者决定保留卢卡奇文中的性别歧视语言。

卢卡奇有时注明他所使用的文献，有时则不是这样。读者往往获得这样的印象：当引文对卢卡奇来说很容易获得的时候，他就引用注释中的文献；但是如果引文需要花时间寻找时，他一般不会加引文，可能他以后会加上。译文为能够反映出这一点，文中很多引文没有注释。

在手稿的末尾，很多脚注是德文的。卢卡奇本人主要运用德文文献，所以注释就以原初形式呈现。为了保持一致，德文脚注习惯也被使用。德文词汇“Ebenda”相当于英文单词“ibid”，德文中的字母“S”相当于英文代表页码的“P”。

## 初步的方法学评论

马克思主义最有意义之处就在于，它把历史的进展创造性地化约为阶级斗争的自然演进。这一点吸引了在更多情况下排斥非社会主义阵营知识分子：“自由人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sup>①</sup> 作为总结性的陈述，这种历史观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拥护者的指导性观点，他们有意无意地将这种抽象的历史观应用于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敌对者发现很难接受这种抽象的历史解释。那种试图将所有的历史现象视为绝对独一无二，从而排除历史理论中的规律的做法，已经因为充分的理由而被摒弃。历史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明显对立，必然导致理论层面的非理性主义、实践层面的完全的想象力缺失和空虚的现实政治。这不仅阻碍了社会主义者了解历史的真实，而且妨碍了新实证主义中固有的社会控制倾向的实际应用。政治原理至少在表面看来已经深受自然科学的影响，从普遍的认识论范畴来看，政治原理也已经变得习惯于将国家形式、社会力量和倾向作为社会

---

<sup>①</sup>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111—117页。

Marx, *Der achtzehnte Brumaire des Louis Bonaparte (The 18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S. 111 – 207.

现实。

如果一个人不断地认为他从享有盛誉的西方思想中发现了为之辩护的依据，这样的方法论很容易成为一种习惯。例如亚里士多德和罗素就已经阐述了我们的问题的这个方面，因为他们宣称民主至多能够被定义为一种普遍的分类。事实上，从1917年事件过程及之后关于专制和民主的讨论到现今关于极权主义和民主的讨论的方法论基础都能够在众多的分类选项和普遍与特殊的对立中找到。

我们认为任何将特殊性和确定性对立起来的做法都是没有依据的，并且也绝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在马克思的经典理论中，特殊的社会历史现象和将其总结为必然性的历史规律之间绝不是矛盾的。相反，它们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特定的社会存在首先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是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社会冲突中各种积极的社会经济力量之间发生对立的相互作用的必然表现。从理论和实践的观点来看，对于社会特殊性的特征的理解与普遍规律和社会决定论的认知是同等重要的。对于实践来说，[第68页]它只需要确认真实的社会历史情境中的具体表现，对于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的充分理解是不可缺少的前提。如果他们认为马克思能支持他们的观点，那么支持抽象的普遍性的专断论者和拜物教者必然是错误的。这在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sup>①</sup>中有充分的证据，很显然在所有的阶级和阶级发展中，政权和政府的变化是根据1848年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具体社会形势呈现的。对这些具体事例进行归纳，马克思的结论是：既然所有的经济形态同时是一个决定的必然性和

---

①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选自《马恩文集》，柏林，1956年，第4卷，第462页。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the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Marx - Engels Werke (MEW), Berlin 1956, Bd. 4, S. 462.

历史的特殊性的结合体，上层建筑——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民主——必然在它们的起源和存在上表现出相似性。因此，应该尝试历史地考虑民主（最好说“民主化”，因为分析本身主要考虑过程而不是条件），作为一种根植于当代经济结构的具体政治力量，这种经济结构已经不稳定并且趋于消亡。在这里，如同任何地方一样，去历史化滋生了否定性的拜物教者，他们不是清楚地阐明具体的社会运动（他们所说的社会法则），而是神秘化和掩饰它们。在这些问题中，尽管一幅清晰的图画只能通过使用过程的概念来呈现，却总有人频繁地将民主表述为固定的条件，并因此忘记考虑当前条件结构中的能动过程。为了强调这一点的重要性，我们更喜欢用民主化一词而不是民主。

[第 69 页]



## 第一部分

以资产阶级民主替代社会主义改革是错误选择





## 第一章 民主及其各种经济形态

[第71页] 有些人认为，自亚里士多德以来，那些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们没有能够说明民主形式多样性的问题，这将会是一种带有误导性的简单化。但是，这些政治思想家的观察以及他们的分类，尤其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价值判断，并不是从对经济基础与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民主之间关系的分析开始的，而仅仅是根据自然条件（比如国家的大小），或是法律的考虑（诸如公民的地位）来进行判断的。这种方法只能产生非常宽泛的范畴或评价；但是，他们却不会充分地理解产生于主流社会经济发展的民主的各种形式的具体存在。对于这些在政治理论方面举足轻重的思想家们而言，比民主起源问题更难掌握的是那些建立在某种特定经济形式类型上的民主兴衰的知识。关于某种特定类型的民主，这些以往的政治理论家们的所有思考依然是抽象的归纳，这种归纳进程不可能作为反映“物自身”（thing - in - itself），以及某一特定社会整体的“自我运动”（self - movement）。

马克思是从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思考的第一人。即使他提及数个世纪之前的作为民主起源与典范形式的最具有意识形态方面影响的范式的城邦民主时，经济依然是他的首要前提。公社“作为国家……一方面是由平等财产拥有者的相互关系协同抵御外敌，并且同时又是他们的保护神。该社区是由土地拥有者



的劳动人民和配给制农民组成。配给制农民的独立性起源于作为公社社员的结合，老龄公众需求之保障以及该社区之声誉。只有该社区的成员能够获得土地产生的财产，但是作为社区的成员，他是私有财产拥有者。[第72页]因此，作为私有财产主的个体地位与该社区的社会存在密切相连：个体的自我保护同时就意味着社区的自我保护。”<sup>①</sup>从这种经济系统演变而来的民主类型不仅仅以人类存在及实践的普遍形式——它适用于每个社会群体——为基础，而且与个体积极参与的社会存在具体形式相联系。要成为城邦的公民，城邦民主的积极参与者，这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上层建筑的特定范畴，而且该城邦的每位公民都与社会存在的经济基础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上述结论对处于这种类型的社会结构中人们的整个一生有着重要的影响。最重要的是，社会存在高于个体的私人生活，所有公民的真实存在，他们在民主生活中的合作都最终依赖于特定的经济结构。随着这种经济基础的瓦解——生产力必然发展的结果，城邦民主存在及发生作用的能力就被毁坏掉了。政治腐败的力量迫使这种受到高度尊重的、光辉的民主模式，尤其是雅典和罗马的古典模式，陷入了自我瓦解。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这些使民主衰败的经济力量：作为这一社会基础的奴隶制。为民主而进行的斗争在一些拥有特权的少数人那里展开，而大多数积极生产的群体原则上正如被排除在社会生活中其它所有的积极参与之外一样，也被排除在民主斗争之外。

如果这种城邦的最初经济基础被超越，个体分配的相对平等被破坏，根据西斯蒙第的分析，无产阶级在出现时依靠社会生存。然

---

<sup>①</sup> Marx, *Grün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The Foundation of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Berlin 1953, S. 379.

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依靠无产阶级存续。劳动、财产与政治社区内的成员权利、政治民主的原理之间的关系仍处于其起源时的社会组织的原始形式之中。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早期人类生活于氏族之中，部落成员资格是财产拥有的条件。随着马克思称之为“天然壁垒消退”现象的出现，氏族成员资格和财产的关联也消失了。这种民主的希腊形式的消失，完全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典型的人类品质文明化的结果。个体在这个历史发展阶段还没有获得一种现代的“唯一”身份。拥有配给制，属于部落的公民——上述是城邦公民存在的社会经济条件，因此也是他身份的必要特征。城邦公民私人生活的次要性是由于以下事实：人类存在和发展是与个人政治职责的实现同步的，是与其在这种民主形式中作为政治主体的功能一致的。[第 73 页]

就政治意识而论，伟大的法国大革命代表了现代资产阶级民主的经典形式，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希腊理念的影响。然而，从社会经济方面讲，它完全背道而驰。通过强调这种矛盾，马克思同时着重指出，自由与平等，作为现代民主表现的核心意识形态模式，可以有各种各样的陈述。自由平等受到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他们并非理想化的构造，“不仅交换中受到尊敬取决于交换价值，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所有平等自由的有成效的真正基础。”<sup>①</sup>

尽管存在这些内在矛盾，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自由民主的真实实现象征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巨大进步。真正的人类社会性，人的类存在的客观的真实基础随着自由平等的实现而出现。被认为是社会存在的天然壁垒的政治范畴被否定了。通过这场社会斗争而发生的

---

① Marx,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The Foundation of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Berlin 1953, S. 156.

革命是以反对把法国社会分为产生并存在于封建社会的不同阶层为导向的。这种被青年马克思称作“不自由的民主”的封建制度赋予社会矛盾“直接的政治性质”，其中“市民生活的要素，如财产、家庭、劳动方式……以领主权、等级、或同业公会的形式升为国家生活的要素。它们以这种形式确定了个人与国家整体的关系，即：其政治关系”。<sup>①</sup>

法国革命剧烈地摧毁了整个封建制度，并且在其发展过程中有史以来第一次以精辟的社会学术语揭示了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实际关系。马克思正确地指出：法国革命的历史使命就是在封建制度分崩离析的废墟上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政治生活，不考虑其中的任何资产阶级范畴，成为广泛公开有趣的主题。有史以来首次，在对社会存在的规划中，人类理性成了最可靠的设计师，终结了对“理性王国”恰当目的的百年争论。

然而，诚如恩格斯后来正确指出的：该理性王国本身证明是理想化的资产阶级王国。理性化不是被理解为政治的意识形态批判，而是对一个真实发展中的社会结构的客观科学的评价。在上述文章中，马克思本人在关于整个社会形态的转变的理论探讨中，也说到理想的国家的产生是通过推翻封建主义，进而在政治生活与“资产阶级社会的彻底物质化”<sup>②</sup>之间建立一个根本性结构。[第74页]他表示这种国家与资产阶级社会之间，社会生活与每个个人生活中理想性与物质性之间的对立统一是理解法国革命的宪法文本的变革性宣言的关键。

这些文本产生于相互关联的两极——资产阶级“人”（*Homme*）

---

① Marx, *Zur Judenfrage (On the Jewish Question)* in MEW Bd. 1, S. 368.

② *Ebd.*, S. 369.

与“公民”(citoyen)地位。公民地位代表公民的理想化、公民解除了与社会经济存在相连的一切物质联系,而人是资产阶级社会成员。马克思还强调说,在这种不可分离的统一中(就每位公民也是一个成员而言),革命性的宪法通过使之依赖于所谓的人权而降低了公民权利的地位。在实践中,这些宪法不容置疑地认识到物质的、生产性的、个体的人优于理想化公民的真正的社会至上性。

同时,这些文本清晰地描述了这一资产阶级民主形式在伟大的人类发展历程中,在人的类存在、人类起源学的产生中的地位。带着对由资产阶级社会造成的具体个体的社会地位的理解,马克思说:他的“个人自由不是被加强了,而是其他个体形成了他自己自由的障碍”。<sup>①</sup>那是资本主义根本的社会现实——利己主义,并且由于这个原因,仅仅是部分的人作为社会的真正实践主体而出现。同时,作为这个发展阶段的必要组成部分,和资本主义制度下产生的劳动社会化的表现,相对于早期较小的社会化结构而言,人的类特性也达到了客观上更高的社会水平。其结果是:这种类特性,人类真正的合作式生活——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在合作劳动的工厂中——“作为他的物质生活的参照”而出现。<sup>②</sup>

理所当然,在伟大的法国革命这场暴风雨般的大变动中,这一切比后来文学作品的平淡叙述表达得更加丰富、哀婉动人。自文艺复兴以来,这种反复论及的城邦民主的古代理想是这种革命性热情的典型。这并非文学或学术上的标新立异。马克思说法国革命很有必要把英雄主义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场革命中的伟大演员们需要理想,甚至“为了隐蔽他们在斗争中存在的有限的资产阶级内

---

① Marx, *Zur Judenfrage (On the Jewish Question)* in MEW Bd. 1, S. 365.

② Ebd., S. 354.

容，并把他们的激情提升至伟大的历史悲剧的高度”<sup>①</sup> 而自欺欺人。这种历史性热情常常会由于无意地无视其社会矛盾而导致对希腊和资产阶级民主化形式的历史性的错误认同。然而，这场革命赢得了胜利并开启了一个将现有的资产阶级民主范畴变成资本主义国家和文化的统治形式的真实过程。城邦的光明象征性被社会现实所战胜。甚至在这场革命胜利之后，[第 75 页] 这些古老的梦想被用作合法的工具，它们变成了有意的欺骗。希腊城邦民主中生活和行动的配给制所有者的社会经济现实永远不能被复活。它的社会存在及商品交换与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毫无共同之处。资产阶级生活的社会存在，商品交换的世界，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上层建筑中发现了其政治表现方式。

[第 76 页]

---

<sup>①</sup> Marx, *Der achtzehnte Brumaire des Louis Bonaparte (The 18<sup>th</sup>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S. 166.

## 第二章 资产阶级民主化的必然发展趋势

[第77页]到目前为止，我们仅仅展示了民主的希腊与资产阶级形式的矛盾的经济基础。与那些流行的当代理论相比，社会结构并非静止不变，并因此而与某些历史准则相反；社会结构是发展每个社会形式的内在品质和首要的动力基础。我们已经看到，在城邦民主中配给制所有者（allotment owner）的平等是怎样被生产力必然的经济发展所破坏。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资产阶级社会的动态发展趋势所揭开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性与国家理想性之间的矛盾。

最重要的是，把这一社会形态的每个部分隶属于其自身的趋势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总动力特征。与该时期所有公正准确的观察者一样，马克思把人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真正的上层建筑的影响描述如下：“资产阶级对待这种制度机构的行为恰如犹太人对待法律的方式，他尽可能地经常在每个个案中回避它们，但是他却想要其他成员都遵守它们。”<sup>①</sup>

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样一种普遍的行为模式是不值得奇怪的。在每一种社会形式中，国家都充当着消除阶级冲突的意识形态武器。当城邦公民阶级通过买空赤贫者阶级的财产而瓦解配给制社区时，无论最初的企图如何，他们引发了城邦民主的毁灭。诚如马克思和

---

<sup>①</sup> Marx, Engels, *Die Deutsche Ideologie (The German Ideology)*, in MEW Bd. 3, S. 163.

其他人所认识到的，即使这类活动破坏了政治民主，它无意中促进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同时又催生了与展开着的经济基础相一致的后来的政治上层建筑。在社会本体论的基础上，民主国家必须保持其理想特征，但是，民主国家是一种有效的工具并且越来越适应其成员的经济需要。事实上，该国家是由有影响力的群体操纵的，[第78页] 这些有影响力群体的思想被看作总的社会准则，它并不改变资本主义国家适应能力的总体原则。我们的研究将只考虑那些拥有能够引起经济基础变革的足够力量的社会运动，而且因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处于这样一个动态的决定关系，它能形成国家的形式。那些希望跟随变革中的社会运动而不是把它们偶像化的人们，决不会忘记此类群众运动只不过是一种个人与公众行为之间特定类型的综合而已。马克思对从个体行为的角度对群众运动描述有一个深度的社会本体论理由：把群众运动偶像化是建立在歪曲人的类存在（直接个体：他与同类的关系）的企图之上的。

尽管从正式的逻辑或认识论角度看来是有矛盾的，但是，上层建筑的理想性被证明是最有效的方法，因而历史的成功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唯物主义与自我主义趋势的彻底胜利。在这些条件下，抽象的法律形式主义繁荣昌盛并受到最高尊敬并非偶然。再回到我们的基本问题上来，当下政府的政治形式的最先进的理想性成为彻底战胜利己主义与资本主义个人利益的最恰当的工具也并非巧合。这个过程披着公共利益的理想化标识的外衣。资产阶级议会制度自身与社会真实生活分别开来。议会主义，这种政治理想性的关键而且典型的实现，随着它越来越成为资本主义组织内自我利益合理性证明的最合适的工具，它也越来越被确立为人民主权的完美机制。议会主义通过伪装成“无限自由”和“平等”的术语而做到这一点。或许“伪装”这个术语并不完全正确，它不仅仅是已被确立的

自由与平等的“伪装”，而且更确切的是其经济本质，资本主义商品交换的真实观念。

自从17—18世纪的大革命以来的政治生活，总是被对议会主义的纯粹形式（例如普遍而且平等的选举权）及其全权的立法与官僚控制的探求而驱动。这些斗争中有一些不需要冗长地讨论，譬如那些反对封建阶层残余的斗争都已属于过去，至少就资本主义国家而论是如此。专注于这个事实似乎更为重要，在大革命意义上，在创造民主的尝试中的决定性步骤必须被理解为为了作为民主的矫正者的“纯粹”议会制群众运动的结果。平民的激进式民主，在英国革命时期服役于克伦威尔大军中的群众，[第79页]以及巴黎地区的平民革命者们，使议会处于压力之下。他们必须解散并屠杀他们，以便于创立各种能够表达劳动人口的真正利益的机构。首先是英国的“光荣革命”，然后是路易斯·菲利浦政府，再随后的第三共和国都能够排除此类“未被授权”的干涉，以确保议会按照主要资本主义群体的利益来定义自由与平等。然而，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在危急时刻——提及德雷弗斯事件就足以说明问题——平民民主干涉的可能性在政治的视野中出现了，尽管以一种被削弱的形式。在民主平民主义和议会制自由主义之间的对比在19世纪的政治理论中证明了自己。没有必要再强调议会制自由主义几乎没有挑战性的胜利。

[第80页]



### 第三章 今天的资产阶级民主

[第81页] 具体评论议会主义与平民民主干涉的比较不是我们的任务。这里讨论的只与基本趋势有关，马克思在《伟大的法国革命》中已经为其找到了说明。这些趋势后来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取得了无限的统治。今天，人们习惯于称之为自由的东西是资本主义内部力量毫无争议的胜利。很显然，资本主义在其从开始到今天的进化过程中经历了许多质的变化，在其政治上层建筑以及资产阶级民主的自由中，修正带来了巨变。然而，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的根本结构并没有实质的改变。相反，有必要指出，在其进化过程中，其生命的内在性质，其本质的基本特征，以更加集中的方式，在其充满幻想的革命性开端中起着超出人们想象的作用。

因此，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及其对自由概念的操纵的讨论必须以明确体现当代资本主义特质的内容和形式为基础。一位具有抽象思想观念的政治家或政治理论家的确会在心中浮现出以前的或乌托邦式的自由的错觉。如果他的努力想要具有任何真正的实际意义的话，他们就必须涉及作为统治的相应形式的基础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对于那些试图用资产阶级民主取代当代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们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他们想要表明从辛辛那塔斯（Cincinnati）到卢梭，从克伦威尔到罗伯斯庇尔的一种持续性延伸。然而，现实证明，只有如尼克松或斯特劳斯所定义的资产阶级民主在目前

社会政治条件下才有可能。随后我们将会回到社会主义民主的广泛选择的必然结果上。然而，我们发现，有必要简明地指出现在有别于一种令人向往和迷恋的过去的绝对存在的优先性。[第 82 页]

作为数百年发展的顶点的当代资本主义，在建立一个霸权的帝国主义社会操纵技巧的支持下，是一种被策划并规定好的社会形态。我们非常清楚这样一个事实：根据令人尊敬的当代研究者的标准，不把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之类的术语加上引号就是完整性的一个重大缺陷。然而，所有当代社会科学都对 19 世纪普遍排斥，因为它是一个意识形态冲突的时代，当代社会科学都是高度意识形态的并且拥有共同目的，即表明现在优于且在质上不同于先前的时代。这就是术语“多元化”社会如何与术语“极权主义”相抗衡，如何努力制造并在全世界广泛宣传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起源于一个共同的精神遗产的论点。消费和服务业的日益资本化以及作为商品购买者的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化，都被用来证明无产阶级能够脱离革命性而且剩余价值理论是错误的。事实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还没有被证明不正确，而是仅仅证明相对剩余价值形式取代了绝对剩余价值形式。马克思不仅预测到在发达的资本主义技术层面上，相对剩余价值的增长超过了绝对剩余价值，而且该过程自身在资本主义范畴下仅靠生产的形式上的假定就被确定了。因此，先前时代的阶级斗争的所有痕迹在当代工业社会中都消失了，部分是由于事实上社会民主派常常完全背叛马克思主义以便于成为权势集团的成员。斯大林主义、后斯大林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以及实践在这些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将会在后面加以讨论。无论如何，今天的工会几乎普遍性地站在社会民主党派的左边。此外，偶尔的大罢工揭示出经济方面的阶级斗争从来没有被完全放弃。虽然迄今存在的殖民地的解放被解释为旧的殖民剥削与压迫的各种痕迹消失的证据，其实在美国

的每一种新政策，尽管对殖民主义公开驳斥，本质上都不过是戴上新技术手段面具的旧政策的延续而已。步沃伦·哈斯丁斯（Waren Hastings）、德国帝国主义等的基本传统之后尘，不仅仅是由经济军事手段支持的第三世界最反动阶级的主宰，而且不发达地区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每一次改革努力都被暴力镇压了。这些通过外国干涉所产生的统治形式被资本主义宣传机器打上“自由”标签的事实，不能掩盖西方帝国主义的连续性，这些从圣多明各、印尼及越南的事例中可以看出。

我们试图指出资本主义内在的社会经济趋势及其人类的、国内的和国际的后果。[第 83 页] 就此而言，我们用类存在问题以及人类社会发 展原理是在与此前社会相比较资本主义制度是如何造成的更为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获得新形式作为证据。马克思强调人类的类生活与他的自然生活处于相互矛盾之中。为了理解这个命题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极端重要性，我们必须涉及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概念结构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那些问题。在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章中，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坚持认为“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由于费尔巴哈不理解人的类本质与社会关系的真正整体之间的联系，事实上人类存在起源于社会关系的发展，因此他被迫“撇开历史的进程”，并且把一种被理想化、孤立化的人类个体视为当然。由此他把人的本性理解为“仅仅是一个‘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

费尔巴哈的类理念缺乏真正的社会—人的内容，并且作为非常纯粹的逻辑—认识论范畴，它不得不保持抽象与“无声”。马克思表述这一点是通过仅仅认识到费尔巴哈的“类”与有机自然的领域相

关，在这里它可以被看成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共同性”。<sup>①</sup> 人的社会本质的形成，他真正的类特性都发生于一个历史过程中，这就正确地克服了这种无声性。

马克思可以使自己满足于这种箴言式的比较，因为从一开始他就尽力把类存在解释为由社会学的条件塑造而成的，它不再是抽象的，因而不再是无声的。甚至我们曾作为出发点的论述——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人的类生活与其物质存在相矛盾，就预设了一个基本的并因此是社会历史性的个体与类之间的相互关系。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这种论点处于又一种高度重要的焦点位置：“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个体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sup>②</sup> 很显然，个体与类之间此种作为结果的统一性不是自然的馈赠，而是社会历史过程的产物，在自然主义的生命范畴停止存在之前，这个过程需要克服和超越许多障碍。这些自然主义的障碍阻止了这种人与类之间统一性的兴起与具体发展。[第84页] 社会必须彻底社会化其自身；阻止社会化生活的物质障碍必须被击退。为了实现人的类存在，人就必须超越作为其起源的动物生活。资本主义在经济范围里实施这个过程并通过经济达到社会的整体性。

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目的论的假定，导致社会化人类出现的历史运动是因果性的必然。虽然在资本主义中，真正社会化的人出现了（也在其自身的人的类存在的发展），它同时又是一个通过内部不可解决的矛盾才能保持发展的社会。在此一社会中，人本身由

---

<sup>①</sup> Marx, *Thesen über Feuerbach (Theses on Feuerbach)*, in MEW Bd. 3, S. 6.

<sup>②</sup> Marx, *ökonomisch – 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 aus dem Jahr 1844 (The Economic –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in MEW EBI, S. 538.

于经济需求而不能使自己上升到真正的类存在，即本质性的人类存在。我们强调上述把人的类生活从每个个体的物质生活中分离的矛盾也将其与整个社会分离了。人的类存在的进步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在其中这些社会矛盾部分被消灭了，并且整个社会经济过程被类的普遍性所取代。“社会”是指由人类所创造的人的相互依赖性以及它之前从未达到过的今天资本主义实践与技术实现的巅峰。同时，资本主义又是矛盾的，因为那些客观生产和再生产这种物质依赖性的社会经济力量，并不能够创造出人与人之间完整的关系，而是恰恰相反，创造出人与人之间的分离。个人自由作为社会的前提和产物“使每个人在他人身上找到的不是自己自由的扩大，而是自己自由的限制。自由的人权不是取决于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而是更多地取决于人与人之间的分离。正是这种分离的权利，限制的权利使自己受到了限制”。<sup>①</sup>

用“限制”这个词来概括人类活动的相互阻碍是一种温和保守的描述，霍布斯宁愿把这种状况粗野地描述为“人对人是狼”。绝非偶然的是迪·萨德（de Sade）侯爵近来总被引用作为这种向“个人权利”转变的主要理论家。对迪·萨德而言，仅从生理官能意义上讲的性是一个关键点。对于迪·萨德的理论而言，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性行为不是两个人合作的行为，也非共同生活之事。在他的作品中，男人不把女性看作人类，而是仅仅作为对象。虽然这有些夸张，其内在的真实性在康德的婚姻定义中被再次挑明。他将迪·萨德愤世嫉俗的自我主义翻译成资本主义经济学的语言，译成商品交换的语言。康德说：“婚姻是两个异性之间为了终生独享其性器官的

---

<sup>①</sup> Marx, *Zur Judenfrage (On the Jewish Question)*, S. 364.

契约。”<sup>①</sup>

[第 85 页] 财产范畴同时兼有主观性与客观性，它决定着个体与社会，包含着社会的前提与结果。在这点上，马克思说：“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拥有的时候，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因此，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sup>②</sup> 认为在经济与人类领域中非常普遍的这些资本主义范畴在 19 世纪末将会消失是荒诞可笑的。恰恰相反，这些范畴在 20 世纪的工业化社会中达到了顶峰。马克思早在 150 年前就已提出了这种异化形式的最初理论。并非偶然的是，当代经济、社会和人际关系的异化在 19 世纪时依然隐藏于经济生产力问题的后面，在我们这个时代则已成为普遍的社会与人类问题。马克思已经指出：这种异化的普遍性使剥削者与被剥削者都无法挣脱。但是只有在今天，这些资本主义的社会后果才作为普遍的人类利害关系问题而被认知。这表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决定人类生存的各种方式的发现，仍然是在广度和深度上控制着人类生活整体的本质。今天的资本主义不是一种超越，而是一种高潮、一种扩散、一种迄今为止存在本质的深化。

如何从我们关于民主化问题的观点来解释现代资本主义？表面上，它是其完美体现和普遍传播。然而，其持续巩固与传播的新的社会内容是什么？表面上，直接力量来自于对已经完全资本主义化

---

① Kant, Immanuel, *Die Metaphysik der Sitten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in *Werke in 12 Bänden*, hg. v. W. Weischedel, Bd. 8, Frankfurt/Main 1968, S. 390.

② Marx, *ökonomisch – 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 aus dem Jahr 1844 (The Economic –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S. 540.

的市场的巧妙操纵。借助于肆无忌惮的有说服力的传媒，广告已经成为政治“启蒙”的模特儿。（希特勒在看到把一个好的肥皂广告作为所有政治宣传的光辉范例时，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了。）希特勒与资本主义广告的直接联系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两者之间却存在着明显地区别。希特勒的政治宣传是公开的意识形态（几乎无必要谈及内容和论点的性质）。在冷战时代战胜希特勒以后的政治生活中，“退却”的政治已经发明了一种新的去意识形态化的意识形态，作为反对极权主义（它首先意味着社会主义）的武器。我们不需要讨论这些希特勒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政治武器的内在不稳定性和自相矛盾。我们通过把这种尝试称为去意识形态化的意识形态，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第86页]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每种意识形态都是作为解决社会经济冲突的手段，并且由于每个阶级社会都必然产生这类冲突，没有这些社会经济冲突在永久的意识形态斗争中表现自己，它就不能够起作用。甚至在其根本性的自我否定的情况下去意识形态化也有一个具体的意义：市场需要被确认为普遍模式。每个人在政治生活中都能有所作为，如在大选中投票等等。同样道理，他被迫借助于广告宣传去“自由地”购买如其所述最适合自己消费需求的商品。当提及市场时，我们给“自由”这个术语加上引号。被操纵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以及在其中消费必须发展的声誉使得“自由”这个概念充满了问题。巧妙的操纵由以下事实构成：某种商品的获得是以诱使买方相信他们的购买出于自由选择甚至是个性表达的方式暗示他们。

该操纵原理可被轻松地改写为公共生活中公民参与的理想，资本主义的动力学，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矛盾，必须把人与人的关系转变成为他们自身的社会制度。作为这一改变的结果，资产阶级唯物主义成了主导性的社会风气。与上述讨论相一致，马克

思把关于个人实践的这种资本主义关系的效果表述如下：“资产阶级对待这种制度机构的行为恰如犹太人对待法律的方式，他尽可能地经常在每个个案中回避它们，但是他却想要其他成员都遵守它们。”这种自私的行为方式，在社会中必然会普遍化，这样，公民的理想世界在实践中最终变成了资产阶级自我主义的纯粹工具。很显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并非每个利己行为都会得到公众认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带来了大规模的改变，其范围从简单禁止某种资产阶级行为方式到策略上的接受、口头上的宽容或者对个体违法具体形式的制裁。这种变异的规模反映出一整套复杂的致力于普遍化的力量。我们是否在这里探讨立法还是仅谈管理趋势、即对法律的诠释，对于基本事实本身只具有相对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是清醒地认识到资产阶级社会的利己的唯物主义渗透进入自由与平等的理想领域的普遍性。

对这种具体而且极其细腻的渗透过程提出一个详细的分析并不是我们的目的。重要的仅仅是指出自由与平等的理想形式从未被怀疑和争论过。相反，这些形式成为资产阶级的阶级导向的利己主义利益的纯粹工具（以美国各州宪法自治的名义捍卫对“有色”人种隔离的合法性等等）。[第 87 页] 在这个过程中自由与平等绝不会消失，而是其日益空洞的形式被装进越来越多的资产阶级利益和内容。自由与其最初实质的理想或幻想联系越少，对自由的空洞偶像的赞颂就越多。庞大的院外活动的利益对日常生活控制得越多，对这个作为媒介以及加冕时刻的任何宣传性陈述的偶像所付出的贡品就越多。去意识形态化作为意识形态实际的替代品以及对于已经成为空壳的自由概念的意识形态化的美化，构成一种真实的并因此而理智的矛盾。然而，去意识形态化和对自由的意识形态化的美化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实际运用的互补原则，虽然它们不仅仅是在这种抽象理



智的形式中。

对自由的盲目崇拜需要社会强有力的领导机构和贯彻落实，以便不会使其从意识形态方面有效和社会方面可信的位置沉沦为空洞的词汇买卖。中情局是一个帮助最重要的垄断集团取得目标和重大利益的实施机构。正是中情局最终代表美国充当了自由的捍卫者——从南美洲到越南。正是该组织保障了垄断者的宣传活动在国内的胜利。主要范例就是肯尼迪或马丁·路德·金遭到的暗杀，这两宗案例的真相仍然悬而未决。在第一起案例中，甚至司法询问也没能得出任何明确结论，肯尼迪谋杀事件的真实过程依然没有澄清。然而推理能力未被操纵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情况不可能按照沃伦报告所描述的那样发生。另外，在这些案例中潜在目击者的死亡率远远超过美国的平均死亡率这个事实要想保密也是不可能的。这类秘密在“自由世界”中与舆论无限的权力似乎形成鲜明的对照。在某种程度上，自由的舆论与未调查出的秘密之间的区别是以暴力手段设立的，通过尖锐的生死危险来威胁企图将赤裸裸的事实公布于民意的每一个人。大众媒介的意识形态工具劝说大众接受保守秘密是合法的。当地下组织的“伟人们”出现在畅销书中或成功的电影中时，同样的保守秘密包围着他们的生活与工作。任何探索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的人都知道被选举的公共团体的权力持续衰落——对比之下，其军事和文职官僚们是在“官方秘密”下工作的。

如果有人把法国革命时期的民主团体的关系与第三共和国时期法国军队中的事件作比较的话，[第 88 页] 他就得到一幅信息丰富的社会转型图像，其结果在此时就是中情局。这并非真正的新现象，它只不过是一个漫长的、必然的过程的激进地实现而已。

在这里需要稍微提到一个事实：在美国过去的几年中已经开始产生了系统危机的征兆。目前，在物质和意识形态两方面，反抗的

运动都还极不发达。毫不奇怪，在一个社会当内部矛盾开始产生时，一个反对派便以理论批评的方式产生了。在这个初期阶段，一个反抗运动不能够使自身自觉，去概括出一种可供选择的远景。因此，在美国由于缺乏意识形态的智慧而轻蔑地责怪持不同政见者是非理性的。甚至连路德分子们也只不过提出了暴力抗议的否定意见，但他们不愧为革命的无产阶级运动的先驱。凡是轻蔑地拒绝考虑在美国的反现行体制运动的人，应该记住路德分子们和历史上出现的其它范例。当今时代是一个操纵的时代，它已经被评定为历史的高潮与完善。然而，由于其在解决越南问题或者黑人地位问题方面的失败而无力去提出恰当的答案，这一缺乏自我意识的原因必须被揭示出来。

即便仅仅是匆匆一瞥，我们必须看到资本主义系统性的危机，因为目前整个对民主的讨论都指向一个理论问题：资产阶级民主，像那个世界中许多人所认为的，真的是社会主义世界的真正选择吗？当社会主义系统性危机也出现时这个问题就被提出来了。我们的答案是明确的、果断的：不，永远不是。这个答案更深层原因的一小部分在后面的章节里几乎没有说明，其中，斯大林时代的问题及其后果将被讨论。我们将提出一个简单的、直接的政治主张如下：如果一个已经被斯大林主义的追随者引入社会危机的国家转变为资产阶级民主，一个人不必成为先知，也可以高度的概率预测未来。不久以后，中情局将会使他的国家变成另外一个希腊。仅有真诚的意图还不够，在社会主义世界里，许多意识形态上忠诚的人们在寻求打破斯大林主义僵局的出路时必须不仅依靠诚实的信仰。没有人怀疑他们意图的纯洁性。这些东欧改革者们，他们的支持者、同情者们，尽管有真诚的信仰，但还是遭到了可以预想的失败，并且只能提出把腐败的资产阶级民主作为社会主义危机的选择。我们在这

里猜想他们内心深处在想些什么，这不会有什么客观的结果，我们仅仅需要回到历史事实上。〔第 89 页〕50 年前谁会怀疑英国的劳合·乔治（Lloyd George）和法国的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的满腔热情，甚至是左派民主主义者的良好愿望？然而，在 1919 年，他们组织干涉主义军队反对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他们还解散了社会民主政府，这是他们自己建议的（其领导人也是热情的资产阶级民主党人），并由此为霍尔蒂政权奠定了基础。仅有良好的愿望还不够，而是你必须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在 1947—1948 年的希腊内战期间并没有外来干涉的军队，但是背景深处站立着中情局和希腊政府中被其直接或间接操纵着的官员们。历史不会完全重演，也不能够预测，但是有一条社会必然性的总线索。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确定地说：在社会主义国家危机期间，把资产阶级民主看作是可能的选择暗示着希腊式的结果。

〔第 90 页〕

〔第 91 页〕

〔第 92 页〕

## 第二部分

唯一的抉择：斯大林主义或社会主义民主





## 第四章 对一个具体问题的理论和历史假设

[第93页] 如果我们已经拒绝把资产阶级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替代品，这可能首先是出于实际政治上的考虑。一项当代的经验分析已经清楚地表明，每一次用资产阶级的变体取代社会主义民主的企图都不可避免地导致对社会主义的杀戮（很有可能也是对民主本身的杀戮）。如果我们现在企图发现真正的政治替代品，我们就必须用截然相反的方法论步骤来解决问题。从这个角度讲，不可能在武断命令的意义上提出社会主义（或者与其本质相关的当代流行观点）是民主的极端对立面。相反，我们必须首先努力理解当前现有的社会主义模式，从社会历史学的角度去理解其当前的具体存在。当我们达到这种理解以后，我们将努力更准确地阐述民主化问题。

现有社会主义的实际社会存在起源于斯大林时期危机期间就已经出现的各种制度、趋势、理论、战术的综合体。该危机在第20次代表大会（1956年）被第一次赋予理论——实践的表述，并且，其各种后果也植根于这次代表大会。如果我们不从支撑这个重建的实际意图和结构开始，那么要理解始于第20次党代会的改革的理论——实践工作及其价值与方向是不可能的。

简单讨论一下斯大林时代自身的特点也是不可或缺的。第20次代表大会把这个时期的社会主义发展描述为一场“个人崇拜”。一些有洞察力的批评家马上提出反对这个描述性的短语及其社会内容所

暗示的社会主义危机的本质。首先，正是帕尔米罗·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拒绝把斯大林的个人特点看作社会主义发展中这一深刻危机的最终原因。他要求对整个斯大林时期进行深刻、彻底的经济与社会历史分析。他坚持认为：没有这种彻底的研究，就不可能〔第94页〕明确地用马列主义思想来阐述斯大林对社会主义这个阶段的积极和消极贡献。不幸的是，我们必须承认：能够满足这种需求的分析还没有被进行到底。

在读者面前的这份简短、仓促、高度概括的草稿不足以满足这些严格的要求，不能满足对斯大林时期进行权威的科学分析的合理需要。但是，陶里亚蒂的呼吁并非想要做一个详细的学术评估。他的期望更重要的是对社会主义历史中这个关键的、决定命运的时代统治原则的解释，以便于重建的正确计划能够让病人治愈残疾，回到健康生活。

如果想要满足陶里亚蒂的合理要求，人们就必须从头开始。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不是这一世界的历史性转变的一个“经典体现”。按照马克思的预测，这种革命必须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先爆发。而且，马克思设想这场无产阶级革命自身的性质将成为文明世界其余部分的典范。即使我们忽略革命的经典模式的次要特征，涉及我们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在一个经济上并由此而在社会方面不发达的国家中社会主义的发展。列宁从不怀疑俄国的革命是不正常的，是与马克思主义的预言不完全一致的。当列宁开始在他的著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The Infantile Disorder of Communism*）中谈到俄国革命的国际意义时，他正确地强调了它的重要意义。但是，他并没忘记马上补充道：“要是夸大了这个真理，说它不仅限于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那当然是很大的错误。而且，如果忽略另外一点，同样也是错误的，那就是：无产

阶级革命只要在一个先进国家里取得胜利，就很可能发生一个大的变化，那时，俄国很快就不再是模范的国家，而又会成为落后的（在“苏维埃”和社会主义的意义上来说）国家了。”<sup>①</sup>

通过这段论述，我们不难看出列宁的意思是什么。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在一个发生成功革命的国家里，资本主义的发展越高，社会主义被确立的具体基础就会越直接、越充分。相反，在一个不发达的国家，许多问题必须被列入议事日程中。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些问题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期间已经得到解决。这里的问题——并且在经济现实中两个问题构成一个相互依赖的整体——是重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关系。[第95页]一方面，在规模生产的决定性部门中存在大工业发展的定性以及定量的程度的问题。另一方面，工业或者农业劳动人口适当分布的问题。资源合理分配的意图是获得平衡的经济增长；工业与农业的相互关联与进一步发展能够支持经济各个领域的发展。1917年，没有人对俄罗斯帝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解决了工农业的关系产生疑问，俄罗斯帝国的资本主义仍然不发达并留下了许多未解决的经济问题。

如果我们接受这些结论，难道这不就证明伟大的十月革命暴力推翻资本主义王朝是一个错误吗？正如社会民主理论从一开始就一直想要表明的那样。我们认为：不。伟大的历史性决策、革命的转折点决不会如同一项学术研究一样以纯理论的方式出现。它们是选项的答案，其中，那些被鼓动的、关注日常生活以及重大政治问题的人民在催促着各党派及其领导者。在1917年，采取决策的条件首

---

<sup>①</sup> Lenin, *W. I. Der linke Radikalismus, die Kinderkrankheit im Kommunismus (Left - Wing Communism; An Infantile Disorder)*, in *LW*, Bd. 31, S. 5.



先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决定的。战争制造了社会主义的决定性时刻，各种马克思主义党派都企图用自己的方法克服这场危机。第二国际决议都声明反对战争。但很少有例外，欧洲社会主义党派中大多数的行为都巧妙地支持那场帝国主义战争。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制度，并没有改变这种基本情形。相反，继续战争成为多数俄国党派的主要目标，尤其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者。布尔什维克夺取国家权力的斗争与数百万民众要求马上结束战争的火热愿望是一致的。这个尽快结束消耗人口的战争问题，由于当时情势的紧迫而成为十月具体选择的决定性问题。为了立即结束战争，有必要推翻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希特勒掌权前的魏玛共和国的全部历史说明了把革命决策推迟到不可避免的军事崩溃之后产生的社会后果。）

同样道理，在十月，俄国国内的政治抉择也被清晰地划分开来。在1917年，贯穿19世纪俄国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达到其爆发的顶点。这场危机关系到清算盛行的封建残余，即在19世纪晚期农民被资本主义而不是封建主义剥削的现象。在1917年的过程中，尽管有亚历山大·克伦斯基（Alexander Kerensky）“民主政权”的激烈抵抗，持续增加的农民暴动和自发的土地再分配以不间断的形式向前进行。[第96页]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灭亡，农民问题的真正解决是不可能的。因此在十月，两个问题汇合起来：一个是关于帝国主义战争，另一个是关于农民问题。两者都与俄罗斯社会的维持相关，并为社会暴动提供了机会。两者都不具有直接的社会主义特征，但在当时情况下，只有通过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才能使绝大多数劳动群众满意。有鉴于此，就这个术语的最广泛意义而言，1917年10月面对严峻的革命形势：统治阶级不能够再以旧方式管理，被压迫被剥削的群众拒绝以旧的方式生活（列宁对革命形势的定义）。由于这些原因，除非把社会背景考虑进

去，否则 1917 年的决策就无法讨论。

毫无疑问，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非经典的决策在政治上是合理的。然而，这场政治革命最大的有效性也没有克服真正的经济问题。几年后，这种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巨大差异将证明其自身是俄国经济继续发展的中心问题。首先，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必须为生存抗击德国帝国主义，再后来抗击各种干涉的军队。在此过程中，苏维埃无产阶级展示了一种力量，群众的决心和一种优越的政治军事领导能力。这个苏维埃无产阶级的英雄时代提高并加深了其吸引力；这个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全世界最广大的人民树立了榜样。直到内战胜利结束后，社会主义过渡的非经典形式自身固有的经济问题才变成苏联生活的焦点。

当列宁在理论上解决这个复杂的问题时，他并没忘记强调，他们处理的是全新的问题。“马克思甚至没有考虑为此写一个字”，他在 1922 年说到。<sup>①</sup> 问题似乎都是纯经济的，并且列宁反复提到由此产生的实际后果。然而，他非常关注这一事实：无产阶级与农民群众之间的联盟被内战遗留的经济形势所破坏。他说：“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兴经济（建设得很不好，很不熟练，但毕竟是在完全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新的生产、新的分配的基础上开始建设的）同千百万农民赖以生存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sup>②</sup>

[第 97 页] 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个目标表明，列宁以一种实践直觉的方式掌握了作为一种具体社会形态的社会主义的特征，尽管他从没有用普遍理论的形式阐述这个问题。在早期社会形态中，一

---

① Lenin, *Politischer Bericht des Zentralkomitees der KPR (B)* (*Political Report to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Russian Communist Party*), 27. März 1922, in LW Bd. 33, S. 256.

② Ebd.

个经济结构的变化发生在一种内在决定主义的基础之上。但是，这并不排除社会主义转变的第一个伟大范例作为目的论导向的、有意识的（事实上经常是错误的意识）个人实践成为事实。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使其专注于对劳动阶级的控制成为社会意识必然的后果，它们将社会看作一个由经济上相互联系的部分构成的整体。由于上述原因，劳动阶级被号召从被控制者转变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计划者。具体社会结构的转变应该是无产阶级意识和社会存在的结果。意识必须成为社会的指导性终极目的，从计划其经济运行到把社会主义看作共产主义的预备阶段。列宁正确地觉察到在1917年，被破坏的城乡关系由于上述原因而被引入一个人类社会活动的新时期，它始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破坏了资本主义的或传统的半封建的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这个新时代需要给人类进步下一个新的定义。现在不再有可能使历史被盲目的决定主义力量所统治，但是有必要让客观经济力量受到人类意识的指导。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三条断言：“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

在一定程度上，社会主义意味着凭借人类意识和社会的自我决定来控制人类发展。意识的一个特性就是其可教育性。人类的这种自我教育的中介——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用世界历史性的术语表达，成为真正的类存在的自我教育——是社会主义民主。人的类存在的社会经济发展据此提出一个问题，马克思的所有继承者中唯有列宁将其描述为社会主义过渡的中心问题，并使之成为他的目的性行动的基础。事实上教育者——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阶层——自身必须受教育是一个评论：一方面，每种乌托邦主义都意味着合理的说服就像发动机，推动人类发展到绝对和谐生存的未来国家；在另一方面，它也是对机械唯物主义的一种否定，它只是把每个结果

作为生产发展的自发的、必要的产品。对马克思来说，经济世界（必然王国），永远不是人类存在的自我创造的唯一基础。马克思把人类自觉的自我创造描述为“自由王国”。[第98页]他把“自由王国”的本质内容进一步定义为“人类力量的发展，作为自身的是其自身的价值标准。”同时，他明确指出这种实践活动必须与单纯的经济有质的区别。这种人类目的论的意识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新产生的经济矛盾。人类发展，对马克思而言，是决定论和目的论之间一种辩证的相互联系。“而只有当‘必然王国’成为其基础，这种辩证的生活实践才能开花结果。”<sup>①</sup>

1917年革命的非经典特征首先取决于这个事实：社会主义从一个发展阶段开始其发展，在此阶段中，现存的生产和分配水平还不足以作为“自由王国”的具体准备的基础。因此，必须引进过渡时期，在此期间这种经济的不发达被超越。此一经济向更高水平加速发展的过渡时期，必须成为受意识指引的社会生活中令人关注的当务之急。列宁清楚地理解高水平的工业发展是社会主义成长的经济前提。正如我们所表明的，他认识到工业基础的重要性。此时他暗示，如果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经济发达国家取得胜利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将接替苏联的角色并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先锋而出现。

在历史上，直至此时，没有一个人，甚至列宁也不能从理论上阐述这样一个非经典的社会主义建设、即共产主义的准备阶段的关键问题。从我们现在的角度，这些问题的理论概括可以用以下方法来陈述：在这一过渡时期的形态下，被号召来克服工业不发达的单纯经济实践，与意欲创造民主的无产阶级行动及制度等理想的社会主义内容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对列宁来说非常清楚，他从来不忽

---

<sup>①</sup> Marx, *Das Kapital (Capital)*, Bd. III, in MEW Bd. 25, S. 828.

视事实——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发现的以前的社会主义思想，没有也不可能给对经济发展与民主制度的发展之间建立联系的问题提供理论上的解答。经济与政治之间关系的问题，具有巨大的社会本体论的重要性，因为它显示出自由王国在本质上不同于经济的必然王国。它还表明自由王国只能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达到。这个定义表达出“上层建筑”对“基础”的社会依赖以及这两个社会范畴之间质的不同。“自由王国”这个术语已经暗示出比阶级社会中的上层建筑及其功能更多的内容。这个本体论的跳跃从事实上宣称，[第99页]在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实践的基础必须由自觉目的论所指导，该目的论能够创造一个人类普遍相互依赖的社会。

社会主义（以及更高程度上的共产主义）是经济基础，其中社会整体被置于自觉目的论的指导之下，并因此日益脱离其资本主义性质。虽然社会主义受到指向最终人性目的的人类意识的指导，但它依然是一个依据因果法则运行的社会整体。毫无疑问，社会因果律的统治使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更加复杂。废除资本主义体制并非总是必要的，在一定程度上资本主义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奠定了物质基础。恩格斯在涉及合资股份公司时已经察觉到这一点，并且列宁懂得资本主义垄断是社会主义财产的过渡性结构。尽管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这些问题具有很大的合理性，但是，它们不会模糊任何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运动中内在的本质变化。在社会主义人性的成长中，本质上的改变在于经济发展从此以后将由普遍的目的论来管理。这种目的论，不是定义为因果性的客观法则，必须被理解为社会发展中的类的自我决定的人类主体意识设计。在此背景下，马克思本人事实上把这类因果性的客观法则描述为必然王国在社会本体论上是正确的。因为经济总是社会的物质再生产过程，其中个体的人类存在最终仍然是再生产过程中的对象。在此过程中，

人类智力是被指向客观可能性的最大化利用。在“必然王国”中，没有为了把人的类存在自身当作目的服务的那些活动的位置。“必然王国”的继续存在丝毫不削弱生产方式社会化的事实并具有跃升为本体论的性质。首先，对个体或群体不再有可能利用经济服务于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其次，作为这点的直接后果，将经济发展的客观选择置于人类的自觉设计和人性目标的掌控之中的可能性就会产生。在生产资料私有化的情况下，这些生产资料附属于类的更高目标充其量是一个遥远的可能性。

列宁对主客观力量之间的联系有着深刻的洞察力，并且他还是人类自我决定论的倡导者。他希望把主客观力量和创造性的知识置于即将来临的自由王国的服务中。他认识到俄国不发达的问题，把灾难性质假定为一战和内战的后果，在纯经济背景下不能够克服。[第 100 页] 他把经济问题归属于社会主义社会能够支持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试验。我们提到他觉察到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的破裂是过渡危机的主要危险，我们继续从这个确定的原则出发。按照列宁的观点，进入社会主义的本体论跳跃由一个社会的和具有社会意识的工、农业劳动人口所组成的联盟组成，该联盟为了提高他们的物质与精神生活，通过他们自己的劳动和经验达到有意义的合作的类生活。

列宁的计划是否或多大程度上在实践上可行，在今天是次要的。人们不应该忘记当新经济政策实施时他的致命性疾病会使他日益不适合执行正常的管理活动。这些年里他大部分的理论工作由改革社会主义实验的蓝图组成。关于他的主张的空想性质，列宁本人并没有幻想。在任何情况下，他都越来越不能够追求他们真正的实际具体的执行力，或者用实践力量加在一个人身上的自我批评的方法控制他们。他把这些思想仅仅看作是一种新出现的社会现实中最内在

趋势的理论设计，并且把这些概念看作生产阶级的未来社会主义存在的探索性计划。事实证明，他经济设计中的临时性特征——后来在苏联发展的集中计划制度——仍然在新经济政策时代思想中扮演着高度附属的角色。他后来常被人们引用的论述——苏维埃加上电气化等于社会主义——不应该被当作他对这种未来社会定义的陈述。然而，他想要实现其具体计划的方法展示出一种特殊的方法论，这一方法论依然具有其理论意义。列宁赞成自觉的投入到现实。通过这项试验，通过人类理性的反思特征，人类意识到他们有在理论中把握社会的能力。列宁经常引用拿破仑一世的话：“人从事活动并指导活动。”我们相信列宁的方法论对于经济计划的许多幻想仍然形成一种健全的抗衡，这些幻想由于其抽象的必然性经常是建立在错误推论的基础上的。因为它们能被轻松地操纵，这些关于集中化计划的幻想与社会主义社会的真实意义完全无关。

在一定程度上，列宁看到了混淆集中计划与社会主义的危险性。党内和国内苏维埃生活日益增长的官僚化是他整个患病期间最关注的。任何仔细研究过他1917年以前著作的人都能轻松地了解到，对他来说，[第101页]无产阶级在从日常生活到重大政治决策领域的自我活动，代表了劳动人民为实施社会主义革命做准备的重要征状。然而，列宁不仅容忍而且甚至有时还帮助了更强大的官僚主义发展。这是内战期间的情况，当时需要克服许多紧迫的困难，首先是军事上如此。但是由于实际上的成功，这种官僚组织也渗透到了民政部门。内战胜利结束以后，他的主要目标是消除这种官僚主义，向正常的社会生活回归。这种趋势十分清楚地表现在工会问题的争论中，托洛茨基提出一个工会国有化计划以便于他们的组织潜能能够被利用于提高生产利益中。对托洛茨基而言，因为他不相信无产阶级有任何警惕工人国家的需要，这一计划看起来具有不容置疑的可行性。

列宁从另一方面强调说，事实上，国家是“一个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正因如此，他将自己的观点总结如下：“我们现在的国家是这样的：全体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应当保护自己，而我们则应当利用这些工人组织来保护工人免受自己国家的侵犯，同时也利用它们来组织工人保护我们的国家。”<sup>①</sup>任何熟悉列宁生命最后几年的著作与书信的人都知道他坚决顽强地在国家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与官僚化作斗争。他甚至想要从党内排除其它方面令人尊重的同事（比如奥尔忠尼启则），因为他们通过后退到内战以前的某些程序的方法来损坏无产阶级民主原则。

在大众参与问题上，列宁早就坚持了理论上正确的立场。在《国家与革命》这本他对政治问题的重要论述中，他谈到了“国家的消亡”。当“人们既然摆脱了资本主义奴隶制，摆脱了资本主义剥削所造成的无数残暴、野蛮、荒谬和卑鄙的现象，也就会逐渐习惯于遵守数百年来人们就知道的、数千年来在一切处世格言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自动地遵守这些规则，而不需要暴力，不需要强制，不需要服从，不需要所谓国家实行这种强制的特殊机构”，国家就只能消亡。<sup>②</sup>列宁一如既往、全神贯注地对待他面前的具体任务。这意味着他没有着手于马克思的“自由王国”这一更为复杂的问题，而是专心关注于“国家的消亡”。但是，如果人们以纯粹的方法论去理解的话，他的立场涉及到国家问题的全部范围。最重要的是，即使在这里，他也把日常个人生存的整体考虑进去，[第102页]他远不是试图把某种“公民特征”强加于社会主义民主理想之上。

---

① Lenin, *über die Gewerkschaften, die gegenwärtige Lage and die Fehler Trotskis* (Concerning the Labor Unions,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the Errors of Trotsky), in LW Bd. 32, S. 7.

② Lenin, *Staat und Revolution* (State and Revolution), in LW Bd. 25, S. 476.



在《国家与革命》的前几部分，在涉及政治问题的其它方面，他对资产阶级民主采取了否定的态度。社会主义民主并不仅仅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延伸。恰恰相反，社会主义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的直接对立面。最重要的是，民主不应该是资产阶级社会固有的唯物主义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而是整个社会自身进步的积极成份。民主不应该再是以许多物质障碍为基础，例如，城邦中的民主，而是自我完善过程中的社会本体存在。因此，社会主义民主的目的是渗透进人类存在的整体，并实现其作为所有人的活动和参与结果的社会本质，分布范围从日常生活到社会最重要的问题。在剧烈的革命时代，这种活动和参与带着爆炸性的冲动，由底层到顶层再由顶层到底层周而复始地循环。我们应该回忆俄国苏维埃生活中涉及国内外事务的伟大决策性问题，激动了全世界的公众舆论。在“巩固”期间的这种剧变中，比如，秘密外交或军备秘密的必要性必须向国内舆论隐瞒。

我们将在随后不同的背景下再次谈到这个问题。在这里，我们关注的中心是社会主义民主怎样才能渗入到人类的日常生活并使之活跃起来，并具备参与的性质。列宁把习惯作为“国家消亡”最重要的原因，因为它使人民能够在没有权力、没有力量、没有屈服下把其同伴组织起来进行合作。习惯肯定是一个普通的社会学范畴，它在每一个正常运行的社会中一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习惯与行为有关，但是它对人本身已经习惯的对象完全漠视。但是列宁的寓意超越了这种抽象社会学的普遍性。通过习惯，他指的是社会目的论的过程，在其中国家与社会机构的所有行为都被用来让人民习惯于适应行为的合作模式。当然，这种目的论的因素存在于每一个社会。整个阶级社会的法律结构都是必要的，以便于全体成员自觉按照规定方式去形成习惯。然而，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我们已经叙述过阶

级社会的法权怎样尽可能限制他人行为而非自己，因为这些权利依然隶属于每个个人的“经济自我主义”。对这种行为方式的习惯必然加强普通人的自我主义以及他的同伴只不过是他自己存在与实践的障碍的观点。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我们也知道，资产阶级法律在社会主义期间仍然运行着，虽然不是没有某些修改。[第 103 页] 为了鼓励所有人们使自己习惯于一种新的改革了的社会，发动一场实际情况的突然转变是有必要的。它不可能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变革，而是从开始阶段就必须使日常物质存在与活动革命化。《共产党宣言》把资产阶级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区别开来，根据是在资产阶级社会过去统治着现在，而在共产主义社会现在统治过去。在资产阶级社会，人类实践的充分原因总是被降低到物质生活条件的客观决定论的自我运动。在共产主义社会，有可能为未来社会提出一种自觉的目的论设计，并把这种设计用于实际生活的改变。

从一开始，列宁的习惯学说的内部辩证学的本质目的之一就是促进人类控制过去的的能力。因为这个原因，他对朝着人类自我决定发展的每个社会推动力都深感兴趣并支持。他反对资产阶级趋势的激烈斗争是基于对官僚控制的低效率的高度批评的观察；还基于他的如下洞见：通过其自身内部的程序化，官僚主义的每种形式在自身内部都隐藏着一种驱动力，这种驱动力使过去优于现在的统治得到强化。作为对这个问题的反应，列宁把所谓的“共产党员礼拜六”（Communist Saturday）<sup>①</sup> 的出现看作通过社会人的自发的自我行动而超越过去的统治的愿望表达。这一类的自觉行动能够充当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自由王国”的准备，虽然其征途漫漫而且充满了矛盾

---

<sup>①</sup> 是苏俄时期的一种群众运动，就是号召共产党员在周六进行义务劳动，后来也包括了共青团员，形成了广泛的影响，并直接影响到中国苏区的“共产党礼拜六”运动。——译注

和暂时性的障碍。社会主义经济是这一类的自我决定的不可缺少的基础，以及其相应内容的必要出发点。然而，这一类的自我活动的创造不是产生于过去的经济条件的决定性的结果，而是现在统治过去的最初征服的目的论的结果。列宁将共产党员礼拜六的社会本质用下列术语进行描述：“在我们的经济制度中暂时还没有什么共产主义的东西。‘共产主义的东西’只是在出现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时候才开始产生的，这种劳动是个人为社会进行的、规模巨大的、无报酬的、没有任何当局即任何国家规定定额的劳动。”<sup>①</sup>很显然，一旦“共产党员礼拜六”和其它类似的社会表现被官僚计划所规定后，就必然立即失去其共产主义特质。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这些社会表现就成为机械的，只不过是官僚统治下生产线上的齿轮而已。

并非偶然，列宁给共产主义下的定义引起了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热情和批判。[第 104 页]然而，在这个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令人绝望的经济状况是明显的。列宁带着伟大的激情作出反应并揭示出他政治主张的人道主义基础。尽管他有针对苏维埃经济不发达等缺陷的毫不妥协的现实主义，但他从未放弃对社会主义未来的承诺与信仰，而且他把社会民主视为社会主义任何社会制度都不可或缺的核心。无论如何，即使他的民主信念并不总是被正确地理解，无论如何，列宁对民主化的承诺是很明显的，即使他的民主信念并不总是被正确地理解，但由于其人的类存在的社会人类起源论的宗旨，在俄国之外也有很大影响。请允许我呼吁读者关注我的文章《共产党的道德使命》，它阐述了列宁关于共产主义星期六的准确观点，尽管当时我对马克思主义的诠释被唯心主义偏见所感染。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总是强调他与社会民主党庸俗理

---

<sup>①</sup> Lenin, *Referat über die Subbotniks (Concerning the Subbotniks)*, in LW Bd. 30, S. 308.

论的差异。社会民主党认为随着“国家的消亡”，民主也得消亡，共产主义是一种不再与民主问题相干的社会形式。不幸的是，列宁关于过渡时期最深刻的民主社会主义信念在今天被忘记了。（当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需要去证明：斯大林主义对民主的歪曲始于列宁，列宁在这个遗忘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斯大林主义的保守的官僚原则与反对共产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冷战具有共同的目标：尽可能把斯大林的理论和实践追溯以至回到列宁）。唯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对斯大林主义原则的批评才能够说明斯大林与列宁之间真正的理论与实践上的断裂。关于围绕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及过渡期的伟大战略问题，这样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也将表明斯大林歪曲了列宁的传统。当1917年回到俄国以后，列宁批评了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因为他们误解了革命。不久之后，在工会问题上，斯大林代表了托洛茨基而非列宁的思想路线。

既然我们谈到连续性问题的讨论，确定曾影响列宁以及他所继续的社会主义传统是很有指导性的。我们引用“习惯”这一术语的时候，读者肯定十分明白列宁并没有把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人类协作与合作的激进的新规则看作是一种新理论发展的开始阶段。相反，他把它们看作是已经存在了数百年但却只能在社会主义中才能取得其社会普遍性的基本原则。这表明把列宁与马克思十分紧密地联系起来而与斯大林及其它追随者分别开来的方法论：[第105页]在伟大的革命性过渡和大变动中具体历史性趋势的连续性与其必要的激进的结构改变之间的有机联系。列宁也同意这一点，拒绝任何形式的乌托邦主义取决于历史上进化与革命之间关系的方法论原则。根据乌托邦理论，激进的新事物通过理性而在世界上产生。然而，马克思主义认为，激进的新事物是在社会历史性发展中特定的社会接合点的革命性改变的结果。在人类认识的最深处，历史上没有新的

东西存在。从发展的观点看，历史的跨越发生在特定时刻，但是这些结构性改变通过社会普遍化仅仅把已有的人类社会存在提高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列宁在对习惯以及马克思主义一般方法论的评论中描述了进化与革命的有机联系。列宁对这种方法论提出了以下解释：“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的历史性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一切有价值的东西。”<sup>①</sup>

至少纲领性地强调一下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方面并不是不合适的。列宁关于连续性与断裂性的思想帮助我们评价某些当代趋势。一方面，历史只给我们在旧与新之间、停滞与激进的新的革命的出现之间提供了选择的观点（列宁的观察反对这类理论，例如1920年代的“无产阶级文化”。这种革命性解释以安德烈·日丹诺夫（Andrei Zhdanov）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代表。从方法论角度看，这种激进断裂性的观点与艺术未来派概念相差不远）。在另一方面，斯大林及其继承者们实施一种连续的广泛的盲目崇拜。这些继承者们今天自夸地认为他们已经与过去的“个人崇拜”分道扬镳。他们相信（或至少认为）斯大林时期（我们将随后探讨这些）的现存的、具体的成就排斥了与其方法的一种激进的断裂。这种完全进化与连续的立场恰如完全革命与断裂的立场一样是深刻地非历史性、非马克思主义的。

很不幸，我们的评论是非常粗糙的；为了对此下个结论，重要的是指出列宁并没有把一个一贯正确的公式传承下去，用来系统解决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相关问题，他也没有从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继承到这样绝对可靠的公式。如果列宁健在更长一段时间，他会怎

---

<sup>①</sup> Lenin, *über proletarische Kultur (On Proletarian Culture)*, in LW Bd. 31, S. 308.

样指导这个过渡时期呢？设想这样的问题是无用的。〔第 106 页〕 对由于俄国革命的非经典本质而产生的大量问题的解决方法是否存在任何客观可能性的辩论也是无用的。然而，我们相信，我们努力证明在当时激发列宁的政治实践的最重要的原则与方法论基础将被证明是正确的。我们不能够致力于给出那整个时期详细的历史（理所当然，这将会是非常令人向往的）。今天最迫切需要的是清楚地认识到，列宁的后继者们是怎样激进地与这种方法论原则决裂以及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马克思主义自身的众多歪曲。列宁继承了马克思的思想，但对列宁和马克思的继承在苏联遗失了，即使在绝大多数最重要的政治家都深信他们在应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来分析历史形势的 1920—1930 年代的俄国期间。那个时期的政治家们创造了一种幻想，即他们使列宁意图的最深处永久化了，但是这种信念也是错误的。

## 第五章 斯大林对对手的胜利

[第 107 页] 紧接着列宁逝世之后，众多领导人围绕成为其继承者的斗争被严重地政治意识形态化了。在整个社会主义的历史中，如果以完整的历史研究的标准来看，对这个时代进行的调查研究恐怕是最少的了。很多证据都被破坏了。在大清洗（Great Purges）时期以及随后几年中，大多数的政治理论文件，特别是反斯大林的文件，都从公开发行中消失了。因此，这些文件公众都接触不到了，它们的作者也被强制消失，变成了非人的存在（non - people）。由于缺乏证据，关于从列宁到斯大林的过渡的客观历史描述和有充分证据的理论探讨变得几乎不可能了。那些已出版的支持斯大林的文件作为官方的斯大林主义版本也遭到了同样的破坏。有文件支持的大多数反斯大林主义的文章也产生于存有偏见的政治基础。即使是著名的伊萨克·多伊彻（I. Deutscher）也逃脱不了偏见和歪曲。我们下面的评论也不能声称能填补详尽、客观研究的空白。然而，笔者紧追该时代具有重大意义的争论，这样，他就在承认其具有主观特征的同时，拥有了以最普遍的术语来评论苏联思想巨变的基本方法论的自由。

所谓列宁的最后遗嘱包括其对主要布尔什维克同事的评价是众所周知的最悲观的历史文件之一。在他的“最后遗嘱”中，列宁评价了他的领导集体——六个最主要的共产主义者。列宁以巨大的怀

疑主义思考这些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未来发展的依靠者们。由于列宁没有认识到加米涅夫（Kamenev）和季诺维也夫（Zinoviev）对十月革命的错误评价是一个仅有的意外失误，而认为是他们分析能力中的一个固有缺陷，他们对他们能力的怀疑的历史解释需要得到重新确认。[第 108 页] 其他被选出的三个人，确切地说就托洛茨基和皮达可夫（Pyatakov）而言，和某种程度上非直接地就斯大林而言，他看到他们代表了俄国未来发展的严重危险。他们三个都主张用行政手段处理原则性问题（甚至愿意使用武力来解决问题，斯大林最强烈地体现了这一倾向）。布哈林是唯一的一个展示理论家能力的人，列宁表达了对于布哈林对马克思的解释的正确度的保留。由于列宁认为这六个政治人物是布尔什维克领导团队的精英，他们能够和应该确保建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能够继续，“最后遗嘱”必须被判定为一个空前绝望的表达。

这种悲观主义很快如其所是地证实了自身。列宁死后的几年，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充斥了关于未来发展过程的各种观点。但是，所有这些观点展示了一个根深蒂固的基本的理论和方法论的原则的相似性。没有人能坚持致力于列宁的强烈愿望——通过已有的基础的扩展和强化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尽管每个列宁的继承者对苏联的工业化过程有不同的观点，在列宁那里的社会主义民主的中心地位却被纯粹的经济问题所取代。这些列宁追随者的不同观点在外交事务问题上也有重要的影响。就重点目标的转移以及从民主化进程向快速经济工业化的转变策略，对那些渴望成为列宁继承者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民主党人士中，如果他肯定列宁，列宁被认为是一个精明的策略家。尽管被一种正义感所激励，这仍然是人们的一种持续的误解。策略决策对列宁来说永远都不是首要的。他的确是对主流情况和即将发生的选择的可能性具



有非同寻常的洞察力的分析家。有充分的理由证明他一贯主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也有同样充分的理由证明他经常并强有力地主张马克思的不平衡发展法则的重要性。在他看来，策略决策只是全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短暂时刻。列宁区分了人类发展的总体进程和某一特定时刻的策略需求。只有理解了人类历史的普遍发展过程，才有可能达到与人类“实践”有关联的恰当的策略决策。策略只有与总体的历史战略相一致，才可能有效。列宁把普遍的历史趋势作为战略，以具体的时刻作为策略。只有在一个历史的、科学理论的和战略的框架内，人们才有可能达到真正的策略形式。例如，具体分析导致某一个具体实践的某一个具体情况。

[第 109 页] 最重要的是，列宁的继承者放弃了历史性的战略考虑的优先权。他们都认为自己在面对需要立即决定的情况，在此情形下就不需要理论的历史观了。至于把策略决策与长期观点相联系，这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历史观。事件的运动是依靠既存的具体环境具有绝对优先权的方向发展的。全部革命发展的理论后来很快被补充到策略中，因为这些补充很容易被修改。因为理论并不会被严肃地认为是指导方针，新的策略决策有可能被临时改变，甚至是改变到它们的对立面。斯大林和他的同辈拉开了与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和列宁的距离。列宁死后，这样一个理论程序的转变意味着意识形态结构的修正，它在欧洲社会民主党中发生得较早。正如围绕伯恩斯坦的争论划分出社会主义历史的一个时代，列宁逝世后，马克思主义的僵化是社会主义历史中又一个时代的历史性划分。但是，在对欧洲社会主义与俄国社会主义进行比较时，必须提到两个重要的观点：革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从欧洲社会主义的绥靖中分离的时刻和后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和欧洲社会主义把策略的优先权僵化的时刻。欧洲社会主义民主党的绥靖是和

伯恩斯坦相联系的。在后来的党纲中，对马克思社会民主的歪曲导致了与马克思革命理论的公开决裂，导致了一种精神和实践上与现实社会的妥协，这同样被资产阶级政党所运用。与社会民主党截然相反，即使在1903年大会之前，列宁主义倾向于马克思意义上的革命实践和战略概念。另一方面，他的继承者从列宁主义的退却，即非马克思主义和非列宁主义的修正体现了一个与欧洲社会民主党相类似的趋势，策略的优先权被上升到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与马克思和列宁不同，理论不再是策略决策的精神基础，而是它的滞后的、合理设计的、经常是诡辩式的“辩护”。但是那对斯大林和他那个时代的人是必要的，他们通过表明他们体现了马克思和列宁的传统，从而建立他们的合法性。即使在事实上他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变形，这些观点试图说明斯大林和他的继承权上的对手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线性的继续、应用和扩展。

这个奇怪的马克思方法的“未来发展”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发明或创造。它直接根源于革命工人运动的真实情况，在那时革命工人运动发现自身并总是立即陷入其中。[第110页]第一个阶段的特征是工人运动的创立和组织的巩固，马克思被看作是无可争议的国际领袖，在他的人格中，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策略领导水平被有机地统一起来。马克思死后，这些功能被恩格斯所代表，但没有发生本质上的理论变化。只是在恩格斯死后，社会民主党中的问题才开始浮出水面。例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日常组织实践怎样有机结合？在很长时间里，好像考茨基和倍倍尔的合作能解决这一问题。然而，在第一次大危机中（伯恩斯坦的争论），政党领导阶层事实上被证明是屈服于策略的霸权：理论似乎仅是对已经独立转化为实践的策略的补充论证。（像梅林和卢森堡这样的理论家基本上仍未受影响。）维克多·阿德勒是一个纯粹的策略家，尽管党中有许多理论能力更

强的同志，但维克多仍然控制着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权。起初，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地位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尽管有许多差别，“欧洲路线”甚至在这里也显示了其自身。逐渐地，列宁在布尔什维克运动中赢得了地位，这很容易让人回想起马克思和恩格斯获得领导权的过程，由于1917年革命，列宁的声望达到了顶峰。

俄国共产主义领导层的斗争集中于找到列宁的继承者，该继承者能够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意义上为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一个包容性的理论上与实践上的策略。托洛茨基，革命时期的强有力的领袖，完全不适应这个角色，因为他在正确的策略行动方面完全不称职，甚至他的敬慕者和传记作者伊萨克·多伊彻也承认这一点。除了我们将在后面提及的一些具体因素，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胜利是一个聪明的、诡计多端的和高明的谋略家的胜利。把此一胜利描绘为正确的列宁学说战胜了歪曲的列宁学说，这也是斯大林的谋略的一部分。但是，在战胜对手之后，斯大林丝毫没有作为列宁的忠诚学生履行职责的打算，这就是斯大林人格的本质。逐渐地——经常用独创的策略技巧——斯大林创造了这样一种形势，他把自己作为伟大的前任的真正继承者展现在公众意识中但他更具有优异的领导技巧。在争夺马克思和列宁遗产的斗争中，斯大林作为胜利者前进，他建立了一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革命工人运动谱系。即使斯大林实际上扭曲了马克思主义，在整个斯大林历史时期，他也被认为是和列宁并列的这一传统的继承者。

但不如说斯大林是一个极其机敏、精明的策略家。（我们会发现，他的政治生涯揭示了他这一方面才能的积极和消极特征。）[第111页]即使在列宁刚刚去世的时期，他总是懂得怎样机灵地处理事情。他通常没有自己确定的立场，但他知道怎样从策略上谨慎地

把自己伪装成为最高政治原则的榜样。斯大林能审时度势地把握使对手相互残杀的特定时机。他也巧妙地对手那里窃取可能有用的信息为己所用。他善于从策略上机敏地逐步地把各种政治统治工具集中于其手中（政党，政权和宣传机构）。他的整个统治是皇权式的，但是他宣传自己和列宁主义的民主主义是一致的。与此同时，斯大林破坏了列宁主义，他因此能利用列宁主义的遗产来巩固自己的权力。

早些时候，我们试图指出，对列宁来说，核心的战略问题是保持和继续大众革命（工农联盟）。新经济政策最紧迫的问题是工业化生产的重建，对他来说，这是重建联盟的首要而不可或缺的手段，这在1905和1917革命中也构成了他的政治的轴心。他总是从政治的观点出发来看待预期的漫长而又充满矛盾的工业化基础的建立过程。众所周知，他甚至准备对外国资本家让步以使其参与进来，为俄国工业的经济复苏奠定暂时的基础。这个计划仍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这不是他的错。他死后，主要的问题是：谁将可能是经济复苏的受益人？谁将为其实际上的实现付出代价？左翼（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勃拉任斯基）要求“原始社会主义积累”政策，例如：以牺牲小农阶级为代价建设单一的、快速的大工业。右翼（布哈林）认为建设和工业的更高发展的经济中心问题是供应农村必需品的工业能力（口号：“让你自己富起来！”）。本质上，两翼把问题归纳为纯粹的经济范畴，产生了极其深远的政治结果。对于两翼来说，列宁认为极其重要的无产阶级和小农阶级的政治联盟的观点被认为是极端的和理论上被排除在外的。同样出于此原因，俄国发展过程的斗争仅仅集中于策略的选择，这在大多数情况下——又与列宁相反——与党的领导人的人格高度是一致的。斯大林没有从理论层面的争论上与对手区分开来，但他在策略上是超过对手的。 [第112

页] 斯大林从阻碍托洛茨基成为党的领导人的角度处理策略问题。他精明地游弋于左右两翼之间，允许一方打击另一方，以便两翼政治上受损，使他能够侵占“原始社会主义积累”的成果，并且用更大力量和极其残酷的手段来发展它。

有一个问题使围绕俄国发展过程的斗争复杂化了，列宁死后，这个问题显现出来。这就是在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1921年后，从不平衡发展理论出发，列宁坚信，社会主义革命不会超越俄国国界而发展并取得全球的胜利。然而，1921年前，像许多同时代人一样，他最初承认这样的观点：俄国革命仅是该波浪的开始，革命作为这场战争危机的一个解决办法，会迅速席卷其它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仅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最主要是他死后，事实证明尽管在个别国家具有客观的革命条件和零星的短时期的革命的成功，但由于一些客观因素消失，全世界范围内的革命胜利成为不可能。另外，为了克服俄国革命的非经典本质，现在增加了一个附加的问题：在没有外部帮助的情况下，俄国革命如何保存自己并正常发展，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在客观的社会历史现实面前，这些复杂的问题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由于俄国孤立的情况，战胜经济的落后成为政治考虑的焦点问题。要解决该问题，俄国苏维埃共和国现在唯一可利用的是它自己的经济资源。然而，苏维埃共和国的确受到了世界范围的道德心理上的支持。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的意识形态影响力以及他们对俄国革命的同情是更重要的态度因素。这些道德心理成份不但是精神上的影响，而且在通常情况下，特别是在危急关头，能够上升为现实物质的支持。当时，苏联接受了道德的支持，但没有接受经济援助。国际无产阶级的精神参与对俄国的核心的、内在的经济问题并没有提供任何的实际帮助。俄国面对的历史命运以如下形式呈现出来：完全依靠自己，在俄国保持社会主

义在一个国家的胜利，并独立完成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的工业基础，这是可能的吗？

这些有高度争议的问题的答案说明了在苏联为权力而斗争的各种各样的力量。它们也说明了，这些争议的力量怎样抛弃了马克思和列宁的动力方法论原则。[第 113 页] 列宁死后，这些好战的阵营被策略上的运动和反向运动所支配。更重要的是，俄国革命的非正统起源问题从党内争论中消失了。不断简化的争论的普遍理论原则是对生产资料国有化的信仰，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形式，对俄国面临的复杂问题提供了实质上的答案。长时间以来，克服经济倒退仍是苏联政府的中心问题。由于衰退问题仅仅以经济观点被处理，很明显那些相关的民主、政治问题就被排除在争论之外了。俄国共产党变得陷溺于经济主义，并且不再致力于俄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民主方面。在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取代了更重要的俄国革命的非经典本质问题。因此，苏联人争论的是一个错误的问题。甚至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又被简化为社会主义是否能够在单独一个国家发展。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优先权还是给予了纯粹的策略思考。每个人都应注意到，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的发展必然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然而，如果一个人能够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的发展只有首先通过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完成，那么策略和意识形态的结果必须满足下列两个形式：要么，世界革命必须通过各种手段加速进行；或者，由于世界革命不发展，政党（共产党）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无论牺牲多大的人力，甚至这些严酷的手段也不能保证能够建成必要的工业基础。持有国际观点的托洛茨基当然不会用这种野蛮的简单化的选择来看待这个难题。在缺乏真正的革命发展理论的情况下，在公众意见中，错误的选择扮演一个如此重要的角色，这是不可避免的。

英明的策略家斯大林通过使用抽象的宣传表达，使这些歪曲的选择变成了经济争论的中心问题。他主张，对于苏联的发展问题，唯一可能的马克思主义的答案就是在一个国家彻底建成社会主义。当然，几年之后，他被这一独有的策略宣传的解决方案所误导。由于这一原因，他似乎把一个正确的理论解决方案曲解成了一个喧嚣的废话：单独一个国家不仅能建成社会主义，而且向共产主义过渡都是可能的。由于上述原因，再加上资本主义对俄国的包围，使他认为，政权及其所有内外镇压手段必须继续存在。[第114页]在斯大林的共产主义中，正如一个当代智者所言：根据他们的需求，每个人都应被关在集中营内。在此，我们准备讽刺的评论的实际内容和斯大林主义的策略优先权，因为后面我们还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无论如何，指出直到在第20次党代会攻击“个人崇拜”时为止，策略的优先权仍然未受攻击或许是有用的。尽管赫鲁晓夫时常激动地批评斯大林，但他仍旧是一个经济主义者。他提出共产主义的介绍推广依赖于一定水平的经济生产成就。当俄国达到超越美国生产力水平的阶段，那么共产主义将变成现实。赫鲁晓夫仅考虑到经济前提，共产主义也需要政治和民主前提的观念超出了他的智力范围。尽管是斯大林的批判者，赫鲁晓夫仍局限在斯大林主义内，因为他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成为经济生产力的同义词，他不允许社会主义民主理论进入争论的范围。

让我们回到当前的主题。在布哈林集团的帮助下，斯大林在剥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派的权力之后，窃用了他们的“原始社会主义积累”规划的经济内容。他通过从不使用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派的相同术语来掩盖他的思想上的偷窃。他然后又转向反对他之前的布哈林主义的联盟，在摧毁布哈林集团时，他利用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阵营的思想作为策略

口号。尽管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是很有用的，但是我们仍然不能详尽地分析斯大林狡猾的政策。我们只能间接指出源自于斯大林的极权主义表现的那些行动原则。正如我们看到的，斯大林的方法论原则是彻底服从策略观点的绝对优先权，甚至不顾任何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总体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斯大林的胜利是被他的对手，正如他本人一样不能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建立他们的策略的事实客观上促成的。即使他的对手犯如斯大林一样的方法论错误，区别是他的更高的政治灵活性和更熟练的政权统治工具的组织。预设了1921年后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高潮，托洛茨基总是从普遍革命思想出发，这依然是华而不实的。布哈林从半实证主义思想的教条设计出发，这从不被认为是辩证的方法。由于这些方法论的错误，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低于斯大林的策略能力被额外削弱了。〔第115页〕缺乏任何理论洞察力，他们变得僵化和不灵活，这又降低了他们实质上有限的策略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的胜利不是偶然的。他的胜利并不表明他在斗争方面个人的内在天赋，因为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确比他更有天赋。他的胜利来自他的策略睿智。一些人抱有这样的幻想，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比斯大林更有能力引导俄国走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是这个幻想忽视了这个事实，没有一个斯大林的对对手具有和当时的真实情况相一致的根本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规划，实际上布哈林和托洛茨基也和马克思列宁有着巨大的理论差异。另一方面，这是对斯大林总能够把自己描绘为列宁的唯一的合法继承者的补充说明。他把自己描绘成列宁的真正继承者，这帮助了他的统治合法化。几十年来，这种观点扎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斯大林死后这种思想继续存在，它阻碍了对斯大林、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权力斗争的具体起源的准确的历史描述。

〔第116页〕



## 第六章 斯大林的方法

[第 117 页] 我们已经强调指出，斯大林方法的核心在于侧重策略而非战略，甚至侧重策略而非人类的整个发展道路，而后者正是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内容。但这种方法论的问题并非斯大林一人独有。策略优先也不是俄国人或斯大林独有的问题。纵观 19 世纪后期以及 20 世纪欧洲的社会主义，这种现象是主流趋势，并且这种霸权以多种形式体现出来。这种趋势在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中也很流行，这种方法被赋予了完全不同的阶级内容，从而产生完全不同的目标以及政治程序。在俄国共产主义内部采取策略霸权，并非独特的苏联现象，而是顺应了一种既存的、流行的时代潮流。无论是否有意，它都是资产阶级所谓“现实政治”的变种。对于建立在各种意识形态基础上的西欧各国，这种潮流已经成了占统治地位的行为模式。整体上看，列宁的继任者们并不仅仅是西方同行的模仿者而已。例如，我们已经指出，布哈林倾向于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实证性的解释。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在列宁去世很早以前，季诺维耶夫就用事实暴露了这种潮流，显示出在党内实施社会民主时具有操控性的倾向。

所有这些必须通过精确的历史研究予以具体的解释。这种决定性的概念主旨很容易察觉到：它与马克思主义者对经济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作用的认知完全不同。当时在整个工人运动中，广泛流

传着一种强调经济作用的错误观点。马克思主义退化为经济还原论。同这一点直接相关的，就是知识的专门化导致各种科学之间相互分离。工人阶级运动及其意识形态受这种错误观点的影响，吸收了劳动分工和各部门科学学科之间的相互独立性原则。[第118页] 马克思将经济定义为整个历史进程的物质基础。但到了20世纪，经济学变成了几乎有精确定义的单科学。因此，例如希法亭（Hilferding）从实证主义的角度，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能与其它任何一种世界观融洽相处。经济学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作为社会发展的唯一决定因素，已经丧失了它同人类的历史使命之间的有机联系。马克思把经济看作是发展的一个因素，并与其它社会决定因素有机地相互联系起来。因此，独立出来的学科不再同其它因素互相依赖，很容易变成纯粹的策略。在当时列宁众多的支持者和批评者中，只有列宁完全反对这一观点，即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概念歪曲为纯粹的工业生产力。

将经济转变为孤立的科学，这一过程为其可操控性奠定了方法论基础。这种发展并没有征服所有的政党或政治运动。操控经济只是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得以完全实现。在社会民主党内部，经济操控旨在调整资产阶级社会，并由此导致了修正主义，或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完全分裂。斯大林首先在理论层面上歪曲了经济学的意义，接着，这种歪曲就变成了他对社会主义发展的残暴操控。当他把经济学歪曲为专门的实证科学，把经济学从所有的政治联系中分离出来时，就可以宣称，要建设社会主义，可以只集中在工业增长上面，而不用考虑社会主义民主问题。人们不应忘记布哈林早期的看法，他用实证主义机械简化的办法下过定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生

产力就是技术。这个概念的理论错误不能从细节上处理。<sup>①</sup> 我们只指出这种解释的一种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结果。布哈林认为，古代的奴隶制是技术发展低下的一个经济结果，而马克思本人则认为，技术落后是古代奴隶制基础的结果。很明显，布哈林的技术决定论之所以必然会陷入困境，是因为它是建立在狭隘的经济学概念的基础之上。对马克思而言，经济并不仅仅是技术，也不完全是专门的独立科学，而是整个社会形态的一个决定因素。马克思把社会整体的概念放在首要位置。考虑到古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水平，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是完全可能的。实际上，在那些社会整体没有限制其进一步发展的领域，[第119页] 技术成就确实发展到了更高的水平，比如在武器领域。<sup>②</sup> 我们只提到布哈林的方法论概念，是因为在斯大林时期，他主要的概念框架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尽管发生了许多变动，这一点我们在后面会谈。这种方法论（即经济作为单独的科学，从人类社会起源及其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中脱离出来）以正宗马克思主义自居，成为一个对社会主义社会进行官僚操控的体制建构工具。

这一点在斯大林身上比在布哈林及其他领导权的竞争者身上更为明显。直到1952年，当斯大林已经完全巩固了自己作为全世界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政治领袖至高无上的地位，作为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之后所谓合法的继承人时，他才发表了一篇名为《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的长文。这篇文章主要的策略和宣传目的是为了解

---

① Already in 1925, long before it came to break between Bukharin and Stalin, I protested against this conception. Compare Georg Lukács, *Bcharin: Theorie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Bukharin: The Theor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and der Arbeiterbewegung*, Elfter Jahrgang, Leipzig, 1925, S. 20.

② Marx to Engels, 25. 9. 1857, in MEW Bd. 29, S. 192.

决“主观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方面产生的错误，并将其带回到本来的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来，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重新作为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基础。然而，斯大林时期的主观主义只能解释为对生产的官僚操控。官僚们操控经济数据，是为了把不可靠的发展（甚至是停滞）说成是进步，把采取的特别手段说成是快速发展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并且禁止一切批评的观点。人们应当记得，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一段时间内，禁止按人均计算生产数据，因为这被看作是资产阶级式的错误。禁止的目的在于不让人们知道苏联的生产发展落后于资本主义世界。考虑到苏联幅员辽阔，把当年的产量同前几年相比，会对统计数字产生极为不同的解释。再加上禁止人们对这些数据进行仔细地检查以及接触到这些真相，人们便无从得知经济发展的真实速度了。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规律（其本身是正确的）就可以限制极端的官僚主义操控（主观主义歪曲了经济现实）。

但斯大林回归马克思主义价值规律的真实意义是什么？特别是他可能并非出于失误，而是出于策略的考虑，把价值规律本身和其外在的表现形式即商品交换混为一谈。因此，他在谈到生产的价值规律的意义时这样说到：“问题在于，抵偿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的耗费所需要的消费品，在我国是作为商品来生产和销售的，而商品是受价值规律的作用的。也正是在这里可以看出价值规律对生产影响。”<sup>①</sup> [第 120 页] 在这段话的上下文中，我们对他的方法很感兴趣，当谈到价值规律的其它关键方面时，这种方法就更加清晰地体现出来。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为了解释价值规律在苏联计划经济

---

① Stalin, J. W., *ökonomische Probleme des Sozialismus in der UdSSR (The Economic Problems of Socialism in the USSR)*, Berlin 1952, S. 20.

中所起的摇摆不定的作用，同时为了确定其现实价值，他被迫把自己置于马克思的公开的对立面。斯大林的政治需求要求他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由于自己对党的霸权统治，他估计当时在俄国没有人会指出他与马克思的矛盾之处。他毫不含糊地公开提出价值规律的问题：

有人说：价值规律是一切历史发展时期都一定适用的永恒的规律；如果说价值规律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二阶段时期会丧失其交换关系调节者的效力，那么它在这个发展阶段中仍将保持其各个不同生产部门相互调节关系的调节者、各个不同生产部门劳动分配的调节者的效力。

这是绝对错误的。正如价值规律一样，价值是与商品生产的存在相关联的一种历史范畴。商品生产一消失，价值连同它的各种形式以及价值规律，也都要随之消失。<sup>①</sup>

我们之所以大篇幅地引用这段话，是为了清楚地说明斯大林的想法，并与马克思的观点形成对比。马克思讲到价值规律有各种形式的那段话并不难找，就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开头。马克思从价值规律中至少分离出三种形式：例如，鲁滨逊·克鲁索式、<sup>②</sup> 中世纪自给自足的农民家庭式以及社会主义式。劳动时间，即现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值在经济上的直接物化，有双重功能：“劳动时间按社会计划进行的分配，将会对不同种劳动职能和不同需要的适当比例进行调整。”另一方面，马克思写到，“劳动时间会同时作为

---

① Stalin, J. W., *ökonomische Probleme des Sozialismus in der UdSSR (The Economic Problems of Socialism in the USSR)*, Berlin 1952, S. 23.

② 鲁滨逊·克鲁索是《鲁滨逊漂流记》主人公，这里用来指一种原始的、离群索居的模式。——译注

一种尺度，以计量各生产者个人在总劳动中加入的部分，因此也计量各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中可得到而用在个人消费上的部分。”<sup>①</sup> 尽管马克思把劳动时间定义为价值实体，斯大林把价值定义为商品交换。斯大林直接与马克思相矛盾，他声称，价值规律不仅适用于服务于个体消费的商品，而且也同样适用于生产者在整个社会商品生产中的全部份额，这一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马克思而言，只要劳动者被剥夺了劳动时间，在社会主义也会存在劳动剥削。因为“每个生产者所拥有的生活资料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然而，在斯大林看来，社会主义不存在价值规律，因为社会主义摧毁了商品交换，而商品交换是剥削的基础。[第 121 页] 因此，马克思和斯大林对历史的社会主义阶段的分析产生了分歧。因为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剩余劳动还可以继续存在，而斯大林认为，既然社会主义消灭了商品，必然也就消灭了剩余劳动。

在马克思看来，价值规律不依赖于商品生产。而斯大林坚持认为两者互相关联，这绝不是斯大林一时的口误而已。斯大林对马克思方法论的歪曲产生了实际的结果，他由此歪曲了对社会主义的定义。以大肆宣传的方式提出这个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错误定义，似乎斯大林有意识地想用错误的解释来代替真正的马克思。为此，斯大林耍了个花招，他把古典经济学范畴描述为仅仅是资本主义的历史体现，因此在社会主义不再有操作性，尽管根据马克思的看法，这些古典经济学范畴适用于任何一种生产模式。斯大林的目的是要把他对社会主义的操控形式当作是马列主义在理论和政治上的实现。要理解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构想同他阻碍、甚至摧毁社会主义民主之间的关系，第一步就要分析他在《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

---

<sup>①</sup> Marx, *Das Kapital (Capital)*, Bd. 1, in MEW Bd. 23, S. 93.

一文中，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的错误解释。为了让他的统治在政治上合法化，斯大林必须把苏联描述为走在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上，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必须要歪曲马克思的观点。政治需求导致歪曲方法论的必要性，错误的方法论导致错误的、误导的政策。斯大林说道，“我了解‘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等诸如此类的概念。”按照斯大林的说法，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时正确运用了这些概念，但它们在生产资料实现社会化之后就会失去意义。他接着谈道：“现在来讲‘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也是令人非常奇怪的，仿佛在我国条件下，交给社会去扩大生产、发展教育和保健事业以及组织国防等等的工人劳动，对于现在掌握政权的工人阶级来说，并不是象用来满足工人及其家庭的个人需要的劳动那样必要的。”<sup>①</sup> 换句话说，在社会主义，剩余劳动不存在了，剩下的只是必要劳动。

我们这里谈一下马克思认为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不同之处，我们考虑的是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与斯大林所说的恰恰相反，必须指出工人再生产的必要劳动不同于工人在此之外所付出的劳动，剩余劳动绝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特征。从再生产过程发展的初期一直到共产主义社会，剩余劳动都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经济特征。〔第122页〕奴隶制之所以不同于原始的杀戮甚至吃掉俘获的敌人，在于其经济基础建立在奴隶能提供比其自身再生产所需的必要劳动更大数量的劳动的基础上。马克思还指出，在奴隶制度中——相对于农奴制和带薪劳动——劳动者自身再生产的必要劳动似乎减少了，就好像剩余劳动——除去必要劳动之外多出的劳动——在资本主义

---

<sup>①</sup> Stalin, *ökonomische Probleme des Sozialismus in der UdSSR* (*The Economic Problems of Socialism in the USSR*), S. 18.

的带薪劳动中增加了一样。然而，这是一个必然的假象，除了假象，一无所有。所有三种经济形式——奴隶制、农奴制、带薪劳动制——都建立在当时的统治阶级占有剩余价值的客观基础上。占有剩余价值表现出多种历史形式，通过直接使用暴力或经济上强制得以体现。然而，对更高级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假设有两种最基本的形式：个人再生产所必须的社会必要劳动不断减少的不变趋势，和对应的剩余价值不断增加。对马克思而言，剩余价值总体上会立即落入一个社会的剥削机构，这是经济发展的永恒法则。然而，依据不同社会形态的不同结构，占有剩余价值可以达到改善人的类特性的普遍社会目的。

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使得通过占有私人财产来占有剩余劳动变得不再可能。但是，它绝没有超出经济生产的基本范畴，只是建立了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态，以便使剩余劳动进步性的社会使用成为可能。马克思用以下方式勾勒了生产力增加的经济和文化本质：“个体特性的发展，因而，并不是把缩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转移到剩余劳动中去，而是实际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减到最小，这样就有可能用节省下来的、对所有人都是自由的时间对每一个劳动者进行艺术和科技教育。”<sup>①</sup> 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为了批判拉萨尔（Lasalle）的社会主义即工人获得全部的劳动价值的庸俗观点，马克思针锋相对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在批评拉萨尔时强调剩余劳动必须抵偿掉维持生产本身以及进一步改善生产所花的成本，必须偿付社会的管理费用以及一般的需求如教育、医疗。马克思正确地指出，相比以前的社会形态，这些社会服务在社会主义会更好得到资助。

---

<sup>①</sup> Marx,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Foundations of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S. 593.



这些基本的需求包括为残疾人提供的资助。根据马克思的说法，这些社会需求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个人消费、劳动人民个人的自我再生产确定了经济框架。[第 123 页] 斯大林简单地把拉萨尔的根本的错误概念颠倒过来，他能够声称剩余劳动的范畴在社会主义不存在。我们之前已经引用过他的观点。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拉萨尔被社会主义意味着工作的集体产品直接转变到个体工人的自我生产领域的幻觉所控制，而斯大林简单地把中介的经济运动等同于直接的经济运动，没有了商品交换，工人就不再生产剩余价值了。斯大林和拉萨尔都歪曲了构成社会自我再生产根本的经济成分。两者以完全对立的方式进行歪曲，但他们与马克思的矛盾都源于对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真正经济因素的无知。

为了简单起见，我们拿教育做个例子。教育当然没有直接包括在个体的自我再生产过程中。在资本主义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只是来自资产阶级社会的 technical 需求，这种教育是从上而下地强加给工人阶级的，因为不识字的工人在技术上自然不能完成特定的劳动过程。但即使社会主义以前所未有的重视程度把这个问题摆在社会议程之内，也不可能促进或是清除掉经济对教育领域的渗透和调节。但相对于资本主义，带有浓重意识形态意味的社会主义提出了一个全新性质的想法，即经济对教育领域的渗透这个问题必须按照无产阶级自身的意愿来解决。我们回想一下，在引入新经济政策期间，列宁就把消除文盲当作一项重要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任务来抓。

意识形态自然必须按照准确的马克思主义意义来理解。在《政治经济学批判》（*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的导言中，马克思把意识形态形式定义为社会媒介，人们借此自觉意识到社会矛盾，然后通过斗争来解决它。这个定义揭露了意识形态内在辩证的模糊性。一方面，社会矛盾源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客观必然的和决

定性的矛盾。另一方面，同时，每一种意识形态都是复杂的工具，人们借此工具得以自觉意识到既存的社会矛盾，并以实践的方式通过斗争来解决它。与之对应，在列宁看来，消除文盲是因为文盲客观上源自俄国落后的经济环境。解决文盲问题，是俄国自身内在的自觉实践的目标，该实践以劳动人民的意识与活动为中介来进行。因此，所有的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打破了剥削阶级的统治地位之后，无产阶级就能够通过他们的自我活动来解决日常生活的共同问题。[第 124 页] 教育——还拿这个例子来说——能以这种方式从一个被经济调节的上层建筑变为每个人扩展深化生活的力量。教育能成为人为其自身创造出来的社会力量。由于其固有的社会属性，教育可以导致人的自我形成，产生实现自我创造和自我完成，最终成为其本身的生产者的人。人类的这种权利是人通过减少必要劳动时间获得的，马克思曾经称这种必要劳动时间对于人的自我再生产来说是“多余的”，因为到那时剩余劳动时间能够被用于人类的自我生成。

当然，归根结底，社会环境是决定剩余劳动使用的关键因素。生产力发展水平，工人阶级自我再生产所需必要劳动的减少，在这种剩余劳动内容上存在的意识形态的斗争，都是源自社会以及客观决定的现象的原因。同样，这些源自社会客观原因的混合的情况，它们本身必须具有一定的社会属性。然而在这里，这种问题的复杂化跟民主化有关系，社会和个人之间有矛盾吗？是社会同化了个人，还是有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强化了社会和个人之间的两极？个人行为能否产生两种相互作用并且同时发生的结果？能否生产出会导致生产力增加的社会结果？能否发展个性，促进、丰富并且深化主体最初的个体性？我们之前提到过，马克思认为自由王国意味着人的力量得到显现，这一点在它本身作为目的时是有效的。这就意味着一种超越了经济的实践模式，并且地超越了必然王国。马克思在

《哥达纲领批判》(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 ) 中谈到这一对经济控制的超越时说到, “劳动已经不仅是谋生的手段, 而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

社会与个人互相作用的这个想法是空想主义吗? 情况似乎是这样的, 实际上也正如此, 只要我们把现在同将来分开, 只要我们在今天的实际同想要的未来之间划一道明确的界限。如果我们不把社会和个人当作对立的情况来考虑, 而是看作一个统一的社会进程中互补的两极, 并且同意列宁的看法, 即我们所谓的社会主义或者无产阶级民主不过是这种将主体与客体相互连接的具体过程而已, 那么事情就显得不同了。在那种情况下, 社会主义, 即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 似乎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 其经济结构以及人与人的合作只能通过社会和个人相互作用的手段来发展。[第 125 页] 存在于人之外完全不依赖人的社会结构是绝对客观的。这些社会结构是固有的社会过程, 它按照确定性的法则发展并且超出人的控制。人类在这些客观社会结构里面生活。这个社会客观性的法则不能被中止, 但总体的社会发展表现为客观同人类主观有意识的行为之间的相互促进过程。社会主义民主——把人当作是主动的创造物, 而这是人的类存在的真实属性, 因为他在每天的实践中被迫变得主动——将人类劳动产生的客观化的或者客观的结果转化为人有意识创造的并且满足人类目的的客体。社会主义民主作为一种政治框架, 在不违反客观固有规律的前提下, 允许客观性成为自觉主动的人有目的地设计的工具。这是意识和自我决定对盲目客观性的征服。作为自我决定的胜利, 社会主义民主改变了人们的邻居和同胞, 使其不再是人们实践的阻碍, 而是必不可少的积极的同事和帮手。

当然, 这种历史进步的目的、强度、内容以及方向由当时既存社会形态的经济水平来决定。无产阶级革命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

总体从资本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包括在这个总体中的剩余劳动数量明显是俄国工业发展水平的产物。俄国革命被领进了一个客观的困境，因为其落后的工业发展要求社会必要劳动大量的持续性支出。只要胜利和保卫革命仍是革命实践中最迫切的焦点问题，而且革命群众热情地参与到政治问题之中，那么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关系的问题就可以向人们隐瞒。在由革命创造的直接民主政治结构之内，从最琐细的到最复杂的世界问题都可以讨论。这些直接的民主政治结构，不仅允许俄国民众参与暴风雨般的全球事务，而且可以参与那些俄国遇到的并且全世界也感兴趣的事情。我们要记住布雷斯特—立托夫斯克（Brest - Litovsk）和谈所引发的国际反响。

看起来力量极大的民众的自发性通过苏维埃的组织工作得以扩张、巩固，直接指向具体的目标。苏维埃运动发源自1871年的巴黎公社，在1905年突然再次出现，在1917年及以后成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典范模式。它巨大的力量源自允许人们，尤其是在日常生活中、在工作场地、在家里，组织直接的政治活动。[第126页]苏联采取渐进或者突然的办法帮助民众在所有关键的社会问题上都上升到革命意识和实践上。在苏维埃运动形成的最后阶段（1917），日常生活同政治，快速地同德国达成和平条约的问题，被牢固地融合在一起。这里出现了日常问题同最高层次的政治问题的自发地相互转化。在苏联所表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民主化将主观和客观情况结合起来。1917年革命和1914年发生的世界大战的时代背景都促进了这些发展。

苏维埃运动自发地在各地发展，一步一步上升到更高的意识水平。斯大林时代把列宁同卢森堡之间的争论改头换面，实行了操控性、煽动性的歪曲，以便于所谓的意识行为与自发性互相排斥，以此减弱自发性的社会意义。斯大林为了把列宁塑造成为民众自发性的反对者而夸大列宁和卢森堡之间的差异。斯大林这样做的目的，

是为了加强党对民众的支配性控制。斯大林指出，列宁应该为官僚和操控态度负主要责任，而列宁对自发性是没有敌意的，把它看作“目的性行为的元素”。<sup>①</sup> 确实，这场革命寻求并且也建立了那些制度形式，这些制度构成了俄国社会真正革命的政治框架，这些形式本身创造了扩大人们活动水平的机会。自发的民众运动提高了人类自我决定的意义，显示出了客观现实如何能转变成人类目的性行为的工具。对每天都在担忧日常生活的人来说，只有在当天的特殊利益和重要的普遍问题之间的关系变得真实时，这一点才能发生。革命形势同普通的每一天不同，因为这种形式自发地呼唤行动。从理论上理解革命形势是不够的。很明显，在这种环境下的有意识并不意味着接受和理解“信息”，而是自然地把意识转化成人自身行为的指导。这种朝着实践目的的自发运动会在后面具体地谈到。现在，我们必须对一点感到满意，即1917年的革命——幸亏有列宁对共产党的领导——能够把每一天和社会国家的问题结合起来，正是因为这一点，苏联政权没有失去扎根于人民的日常生活中的根基。

激烈的内战将苏维埃运动的胜利推到了值得纪念的高度。[第127页]同时，落后的沙俄帝国所带来的经济因素，渐渐地在无形之中破坏了苏联的成就。而这些经济上的缺陷被当时的成就所掩盖了。列宁认识到了这种危险的发展道路，就突然改变了方向，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驳斥“战时共产主义”的说法，并且引入“新经济政策”。他看到了官僚化的主要危险，人民是为了革命而自发地团结起来的，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将他们从资本主义的枷锁下解放出来，而现在这个联盟正处于分裂的边缘。在列宁时代，这种革命性的工农联盟是党有意识地进行组织并予以支持的。内战结束后，俄

---

<sup>①</sup> Lenin, *Was Tun?* (*What Is To Be Done?*), in LW Bd. 5, S. 385.

国大量的经济问题浮出水面，1917年革命的自发性是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的。新问题需要新的解决办法。通过和平手段巩固并向更高阶段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需求，给工人大众提出了全新性质的问题，就连最忠诚、最坚定的革命分子都无法解决。（列宁在有关介绍新经济政策的演讲和作品中对这一点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这些困难的任务由于不发达国家社会主义的非经典起源而更加复杂化了。表面上看，这仅仅是量上差异的问题：经历了多年的帝国主义战争，随后的内战又带来了不可避免的破坏，即使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会经历一段时期的经济恢复。这段时期将处于所有社会实践的中心位置，有两个主要目标：国家的经济重建，工业增长超过战前水平。苏维埃共和国考虑的不仅仅是经济重建，还要把经济发展推进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以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提供雄厚的基础。如果抽象地谈这两个时期，一个相对短的时期是过渡期，另一个是长期的新时期。过渡期同新时期的不同仅仅是量的不同、时间多少的问题。然而，按照社会现实来说，过渡期同历史时期的区别在于绝对的质的不同，这种差异跟时间无关，只跟人类生活有关。如果我们说在过渡期内完成了重建和推进经济发展，我们就说一代人能完成这些任务（过渡期可能长达十年）。但如果我们说到用于重建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历史新时期，我们指的是几代人，他们不得不将其主要目标和决定性的努力更多集中在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前提的物质建设上面，而不是放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上。

上面所罗列的问题，[第128页]社会主义客观的未来经济基础的发展，给苏联人民制造了更多困难，因为这是命令，别无选择。对有政治意识的人来说，真正的历史替代方案在以下问题中可以得到具体体现：考虑到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求有客观的经济基础，俄国的工业发展是否并且在多大程度上跟社会主义民主相一致？对改

善工业以及随之产生的制度和社会形式的需求跟社会主义民主所必需的制度和社会形式一致吗？我们之前提到过，列宁的继任者因内部斗争而引发了经济学之争，他们在争论时都没有意识到或者提出过这种替代方案。他们只把目光集中在经济问题上，忽略了民主化的问题。因为他们无视对民主的诉求，便从上至下实施了一套中央集权的政府管理制度。如同我们已经提到过的那样，列宁本人晚年在自己理论和实践能施加影响的范围内反对这种趋势。在民主与官僚之间的选择形成了他晚年著作，可以说是最后作品的《怎么办？》的核心内容。我们还指出，从历史优先的角度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列宁的接班人们只专注于经济问题，使得他们只想到采用策略手段。在理论层面上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进行歪曲，把经济学误解为一门实证科学，导致在实践层面在俄国发展经济是绝对的首要政治任务，这些为列宁的继任者将其社会政治实践转变成更具策略性的手段提供了基础。斯大林也是犯了这些错误的人之一。按照我们讨论的这些问题来看，绝对不能将他看作是列宁方法的追随者。

斯大林比他的对手更加会使用策略，但这改变不了任何关于后来苏联发展方向的基本问题。与列宁相比，斯大林和他的对手都退了一步，他们都允许政治被策略考虑彻底控制。在这方面，斯大林在那些竞逐权力的人中间更有天赋，他以自己的精明在策略上胜过了对手。他成功地显示出自己是列宁唯一真正的和可敬的继承人。在接下来几十年的政治讨论中，被反复宣传的斯大林与列宁的完全一致性深深地嵌入共产主义者的意识中。粉碎斯大林及其组织系统性建立的历史神话，应该是我们当代过渡时期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之一，也是我们努力要做到的。尽管这个课题非常重要，[第129页]但实际上直到现在我们什么也没有做过。列宁主义是马克思精神的体现，但却被歪曲为后者的彻底的对立面。斯大林实现了对列

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歪曲，但他却创造出斯大林同马列主义完全一致的假象。极其重要的是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得到了加强，因为他们对斯大林的话信以为真，将斯大林主义和马列主义混为一谈。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者阶层中，由于接受了斯大林的方法论，马克思和列宁的形象也被歪曲了。这极大地阻碍了人们的自我意识，尤其是在斯大林时期的事实广为人知后，对斯大林主义做出历史性的修正就变得极为紧迫。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份简略的草稿，这里不必要花费精力去做这件艰巨的工作。在这份纲要中，我们只能讨论一下关于方法论的建议。如果本文能抛砖引玉，逐渐引出更为具体的研究，那么就算达到了目的。仅凭现有的材料、文件和重要的传记是不可能开展这项研究的。斯大林一步一步地建立了欺骗性的意识形态组织。他出版的作品中充满了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话，有时这些话根本上一点不错，只是被琐碎化了。斯大林用来描述其新方法的陈述，及其与马列主义相对立的观点，需要进行核对，用系统性的方法收集起来予以展示，这就会显示出策略的无限威力及其对理论的控制是如何在此基础上建立并且巩固的。发挥策略的无限威力的第一步就是把马克思和列宁的原则简化甚至庸俗化。只需看一下著名的党史第四章对辩证法的定义就可证明这一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头一年，为了准备即将到来的有关战争、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辩论，列宁在阅读黑格尔的《逻辑学》时，极大地深化并且区分了自己的辩证法概念。然而，在这篇著名的经典的党史第四章中，辩证法除了被简单化、庸俗化以在 20 世纪 30 年代作为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替代品行使职责外，我们什么也没看到。如果科学研究和独立思考被异化了的但却给人印象深刻的宣传方法所取代，那么便利的应用性策略就能永远地占据统治地位。



虽然不可能做出细致深入地分析，但为了进一步澄清民主化问题，我从斯大林关于列宁主义基础的讲话中引用他对理论的定义，他说：“理论就是以普遍形式表达的所有国家的工人运动的经验。”<sup>①</sup>为了形成斯大林和列宁的鲜明对比，我们只需回想一下之前引用过的列宁的话，他在那段话中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第130页]认为它融合了西方主要的文化经验。斯大林认为理论仅限于指无产阶级的经验，而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经验的巅峰。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即使当列宁着手处理“国家消亡”理论时，他也认为这是对整个世界史普遍趋势的发现，其结果可以为马克思主义所利用，用作人类真正的解放事业。当然，这种解放必须符合社会经济的潜力与局限性。如果将马克思主义从西方的文化遗产分开，或者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前提同其西方先驱分离，那就等于是将它从广泛的人道主义中分离出来，从而失去了更高的目标。斯大林采取的策略优先实现了这个目标，导致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普遍庸俗化。斯大林通过操纵语言隐瞒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给人的印象是他保留甚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这一点清楚地体现在日丹诺夫有关黑格尔哲学本质的著名理论中。为了完成对辩证法的彻底混淆，斯大林主义发现有必要消除黑格尔的辩证法对马克思主义的富有生命力和创造性的影响。为了证明马克思同黑格尔在理论上的分道扬镳，日丹诺夫将黑格尔哲学描述为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动回应。这以一种纯理论的方式展现出庸俗化趋势的缩影：马克思主义必须被看作是新的东西，在资产阶级世界中它没有先驱，跟先前的世界历史发展也没有任何关系。

---

① Stalin, *über die Grundlagen des Leninismus (The Foundations of Leninism)*, in *ders., Fragen des Leninismus (The Problems of Leninism)*, Berlin 1951, S. 593.

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是如此明显，甚至在苏共二十大上，批评一开始就很快揭开了斯大林主义重要的理论构想之一完全是欺骗性的。我们指的是有关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阶级斗争恶化的论文。为了把对斯大林主义的正确评论扩展成真正的系统分析，也为了将对一个观念的抨击延伸到对整个斯大林体系的否定，需要采用两种方法论的观察法。

首先，关于阶级斗争恶化的论文本身并不是斯大林主义实践最初的理论基础，只是后来进行的合理解释。大清洗时期，对任何潜在的反对斯大林的领导人实施的肉体消灭，都可以从这篇极其专断的论文中推断出来，但相反的结论正是事实真相：当斯大林出于策略考虑做出彻底消除反对者甚至持怀疑论者的决定时，阶级斗争恶化的理论就产生了，以便为宣传工作做准备，为这些政策提供合理的依据。其次，必须指出这不是孤立的事例，而是从主观和客观都证明了斯大林的特点和步骤的一般方法。[第 131 页]

这一点在辩护式的理论中生动地体现出来，这些理论都是希特勒和斯大林所签条约的产物。希特勒—斯大林条约带有纯粹政治策略的特点，可以从很多角度来予以评价（我个人把它看作是在正确的策略的外交博弈活动）。联系到我们这里所谈的来说，这个条约最首要的意义在于斯大林把这个纯策略的举动添加了一个定义，即具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也就是说当时的冲突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跟 1914 年的战争属于同一性质。那些忠于斯大林的共产主义者（如在法国）接到的命令是，用最大的努力推翻自己的政府，而不是跟希特勒斗争。只是当希特勒撕毁条约，大举入侵苏联时，斯大林才改变了自己的解释，把二战定义为一场反法西斯斗争。

斯大林的全部实践都充满了这种在策略上实行操控的理论决定。斯大林实践的基础，是现有的策略需求由一般化的理论信仰来支撑，许多情况下，这种理论信仰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历史发展的一般路线。这种理论只是为了满足现有的策略需求。因此，在二十年代后期，斯大林感觉到在策略上需要将那些与他在理论上只有细微差异的对手，都当作社会主义革命的敌人来打击，这时，理论就产生了，连一些无关痛痒的不同意见都被夸大成具有极大危险的理论，这是欺骗敌人的阴险手段。随着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策略优先得到了最重要的理论体现。斯大林谴责社会民主党人是法西斯分子的孪生兄弟，社会民主党的左翼力量被认为是工人运动中最危险的意识形态暗流。（对斯大林方法论的批评极为重要，也是当务之急。因为这种方法现在几乎同在斯大林时期一样被频繁地使用。）

这些可以信手拈来的例子，清楚地表明了斯大林方法内在的连贯性：在策略的基础上对现有形势作出反应。理论所起的作用，仅仅是不断地把已经做出的策略决定装饰成马列主义方法论的必然结果而已。在体制内部，意识形态成了操控的目标。它失去了马克思认为的意识形态巨大的自由发挥作用的能力，失去了矛盾的多重性和非对称性。马克思还把意识形态看作是解决社会经济矛盾的工具。而在斯大林主义那里，一方面，意识形态表现为现有经济形势的机械产物；另一方面，意识形态表现为没有自身内容的工具，它由于没有自身内容可以根据人的意愿重新塑造。从斯大林有关语言的文章中可以看出，这一点跟他对意识形态的定义一致。文章特别强调了在这个定义产生的机械属性。[第 132 页] 斯大林写到：“上层建筑是某一经济基础存在和活动的时代的产物。因此，上层建筑的生命是不长久的，它是随着这个基础消灭而消灭，随着这个基础的消失

而消失。”<sup>①</sup>即使在风格层面上，斯大林跟马克思的不同也是惊人的。对马克思而言，意识形态的消亡也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但马克思不认为社会受决定法则的统治，他认为社会发展结合了决定论和主观因素，因此总的运动是相对的、非宿命论的过程。与马克思不同，斯大林认为意识形态被“消除”了，它们只是社会活动纯粹的客体，即斯大林的庸俗主义。

这种操控固有的趋势为人所知的原因，在于下面这个唯一的问题：斯大林毁掉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苏维埃结构。我们之前试着展示出，新的苏维埃体系的本质特点在于公民的社会超越性——相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理想主义而言。社会主义的历史目标是要终止日常生活中的人和作为政治代理人的人的分离。公民，作为一个政治人，既是民主的实践者又是实际政治生活的实践者，不应该再把人的理想本质从现实的人（民主制度下的人）中切断。在资产阶级社会环境下，现实的人学会了根据自我主义和功利主义目标来发挥作用。但在社会主义，一个新的社会理想产生了，人以日常生活社会性的物质的具体的实现为目标，以便当天的紧迫问题以及国家大事都在同阶级同志的集体合作中得到解决。我们已经指出过，资本主义的革命性崩溃是如何引发广泛而又深远的热情，并且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头几年，运用了人们对上演这场巨大的世界历史剧的热情，它所引发的激情超出了共产主义者的范围。这场革命打开了一片新的历史视野，新的人类开端的可能性。人们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许多人纷纷回应这场革命带来的可能性，将世界的、物质的生活同有内在意义的生活结合起来，他们相信自

---

<sup>①</sup> Stalin, *Der Marxismus and die Wirtschaftswunder (The End of the Economic Miracle)*, Berlin 1954, S. 10.

己也能过上这样的生活。为了证明这一点，只需引用布洛赫的诗歌《十二》就足够了。他们相信，这场革命将人的类存在的合作本性的千年梦想变得更接近实现了。

内战完成了两件矛盾的事情：赋予这场运动激动人心的英雄主义，带来了生活的官僚化。英雄主义时期结束时，官僚化问题就产生了。官僚化问题在列宁去世后浮现出来，[第 133 页] 表现出的症状及根源是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非经典起源。斯大林用来解决现有问题的策略，就是将每一种可能演变成社会主义民主的趋势都实行彻底地官僚式的毁灭。苏维埃体系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国家最高的民主决策机构只是个形式，取而代之的是一党制，这种形式接近于无能的资产阶级民主议会制度。苏维埃制度在下层被简化为通过选举仅能决定当地的行政机构。列宁晚年为准备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在意识形态方面所做的努力都白费了。这时，政治生活和一般社会生活的参与者——在最好的情况下——只能证明自己的行为符合资产阶级公民的理想主义。在国家公民的生活中，主流趋势是政治和行政实践普遍的官僚化。我再次申明，我们不可能对斯大林主义实践在所有理论前提和结果的整体范围内进行深入广泛的描述。然而对我来说，前面提到的足以说明，这种实践是如何推翻了列宁为完全建立社会主义民主而在创造主客观条件方面所做的努力。

必须强调一点，我们讲的是社会主义民主，而非总体上的社会主义。应该而且必须批评那些希望捍卫列宁遗产但却混淆了这些差异的人。必须承认，斯大林由于党内斗争的结果而领导俄国的数十年间，确实实现了一些很重要的目标。斯大林的确为社会主义奠定了工业基础，但却没有为社会主义民主建立政治基础。这些工业成就确实弥补了布尔什维克革命因其非经典起源而产生的不足之处。众所周知，这些关于俄国革命非经典性质的问题直到今天还没有彻

底解决，但苏联显然已经不再是 20 年代那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这是斯大林的成绩。今天，资产阶级评论家们倾向于忘记他们曾经在新经济政策施行之初说过的话：资本主义的强有力的、部分或整体的复辟。运用战略术语，列宁把新经济政策描述为“撤退”。但事实却与之相反，尽管在经济生活领域还存在不可否认的问题，资本主义却再也没有回到过俄国，今天苏联已经成了主要的经济大国和第二大工业强国。经济的发展让苏联无需在核心原则上做出丝毫的让步，即坚持生产资料社会化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这一点极为重要，但在当下的讨论中经常会被忽略掉。除掉许多个别因素之外，[第 134 页] 尤其是如果人们就像我们现在所写的这样，从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方面的政治失败的角度批评斯大林主义时期的话。同时，他们决不能忽视斯大林为社会主义奠定的经济基础及随后产生的世界历史后果。例如，人们应该能正确地认识斯大林在跟希特勒主义斗争时所犯下的过失，因为斯大林将德国共产党人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分离出来，阻碍了针对希特勒的左翼统一战线形成。但是，应该铭记世界必须感谢苏联，起码它没有让希特勒的帝国吞并整个欧洲，如果忘记这一点，人们就会形成完全歪曲的判断。慕尼黑及其影响，法国官方战略的风格，显示出西欧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既不打算也没有能力反对希特勒主宰世界的计划。只有在苏联，希特勒才找到了敌人，只有苏联做出了极大的牺牲，以不可动摇的决心最终完全消灭了希特勒。甚至除了对希特勒的胜利，苏联在我们的时代拯救、保护文明的例子也远不止这些。人们会想到原子弹以及它可能产生的军事政治结果。当它投向日本的时候，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知道并不是非这样做不可，但广岛只是美帝国主义主宰世界的前奏。原子弹爆炸过后不久，一些远离政治但却久经世故的人就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如托马斯·曼，虽然

并非社会主义者，却认为投下的原子弹针对的主要是苏联而非日本。苏联在极其短暂的时间内制造出了自己的原子弹，由此带来的核僵持局面不仅意味着防止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也阻止了美帝国主义对全世界的主宰。

斯大林和其他主要政治人物并非是如此巨大范围的世界事务的最终原因。他们个人的政治活动，促进了在一定的经济结构中必然生长出来的趋势的实现。苏联作为世界和平的保护者，作为帝国主义征服世界的阻碍，由于其社会主义的结构只能不断地发挥这种功能。因为苏联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因此在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任何经济组织都不会因战争的爆发而获利。消灭私有财产也就消除了战争的经济动机。生产资料社会化真正地和平政策创造了动机。尽管在一些个案中出现了许多策略上的失误，但苏俄还是成功扮演了世界和平维护者的角色。资本主义国家对战争，甚至对世界大战和随之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应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态度。[第 135 页] 推动这些国家征服他国发动战争的驱动力无疑是出于部分工业的考虑，尤其是重工业，在这种冒险中有直接的利益。纵观帝国主义时期的经济发展，任何人无需费力思考就可以发现，现代工业发展最重要的进步是武器工业和战争自身的直接结果。资本主义国家成功地操控舆论，从意识形态上动员广大人民参加爱国战争，即使这有悖于民众的切身利益，我们也无需担忧。大多数情况下，权力掌握在战争游说团体的手中，即使在面对多数的反对时，这种力量也强大到足以发动或者继续一场战争。

在生产资料从个人或特定群体的手中充公后，苏联就不存在任何社会组织能从战争中获得经济利益。在社会主义社会，由战争引发社会分裂的经济基础不复存在。任何战争只能产生纯粹的负面效应，例如降低劳动人民现有的或是潜在的生活水平。在所有的社会

主义国家里，这些生产资料社会化带来的自然而然的经济后果是其自发追求和平的物质条件。

社会主义社会能够限制军事主义的发生仅限于指战争本身。武器——技术方面的战争准备另当别论。我们必须很快研究生产资料社会化是如何影响总生产的正常功能的问题。在仔细探讨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之前，先要明白每种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也包括被斯大林的方法所操控——过去、现在都能够从质和量两方面跟资本主义生产并驾齐驱，但仅限于军备领域。原因很明显，通过商品交换机制，资本主义——的确有特定的局限性——能够持续地控制生产的质和量。不难理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要实现这些会更加困难，尤其是在斯大林过度官僚化的计划形式下，并且在具体实行时面临困难。虽然不能在这里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指出一点，在社会主义体制内，军备工业——仅限于此——有可能建立有效的机构来控制产品的质与量。军队通过让指挥官——仅仅是他——处于在生产过程中检验所需产品的位置来实现这一点。军队只允许实际生产那些通过了一定的功能和使用价值检测的产品。很显然，甚至在这种情况下也难免会产生判断错误，但现实的消费者所实施的控制，[第136页]在军事生产和民用生产的质与量之间导致了差异。这并不仅仅是单个的、孤立的案例，而是关乎社会主义生产本身的普遍客观的结构关系。只有放在社会主义生产的一般问题的背景中，我们才能讨论个别案例的成与败。

纯粹从经济上讲，社会主义实现了两个主要目标。它为普遍的和平政策建立了物质基础。同时，它发展了工业—军事基础，在帝国主义时期的权力斗争中成为有效的力量。但是，官僚化和意识形态对这些成就的操控极大削弱了这些政策将社会主义革命推向国际化的能力。特别是，纯策略式的决定和相应的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的操控将革命实践降低到了纯粹的国家权力政治层面上。在国际方面，列宁与斯大林的不同也清晰可见。当列宁支持凯末尔（Kemal Pascha）为解放土耳其，反抗获胜的帝国主义力量的独裁统治而领导的民族斗争时，支持背后的原则很明显：就每一场针对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抗争而言，工农国家是站在革命一边的，无论他们是以何种名义的社会制度来反抗帝国主义。这种支持是基于社会主义的原则，基于哲学上马克思和列宁对民族解放斗争的历史角色的正确理论。由于对所有重大的历史问题都采用了纯策略手段，斯大林无法在实施政策时摆出一副在精神和道德上无可争辩的脸孔。这一点在反抗希特勒时也是如此。例如，当斯大林的继任者成了反抗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的保护者时，这个决定就是照搬这位大人物的意识形态进行操控的。按照这种虚无的意识形态原则，他们不得不使用策略式的社会主义口号来做决定。因为接受了斯大林的方法论，即使他们最终有革命性的、反帝国主义的依据，他们的行为也表现为在意识形态上经过修饰的大国策略。这是一种革命原则和国家权力政治之间的区别。我们将回到这种对意识形态的误解所产生的国际影响这个问题上来，将说明从斯大林时代开始，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误解给社会主义的国际政策所带来的影响。

## 第七章 苏共二十大及其后果

[第 137 页] 迄今为止，我们设法从大体上弄清楚没收私有财产作为生产资料带来的一系列后果。这种没收成为生产的最终基础，但是，我们并没有关心在没收实施过程中采取了哪些具体手段。当然，要从深入广泛的层面上科学地讨论这件复杂的事情显然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大致指出苏联经济发展的一些基本特征。根据约内什（F. Jánossy）的杰出分析，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经济发展分为两个重要阶段——30 年代经济重建阶段和二战后阶段。这就意味着，在经济的辩证发展中存在着一种固有趋势，它不仅使生产水平再次达到了在经济危机影响下经济倒退之前的水平，而且还使生产水平达到了在不受经济危机影响下经济正常发展应该达到的水平。因此，这种辩证的经济跨越式发展下的积累毫无疑问要超过经济正常发展的水平。（在联邦德国，人们称这种经济发展为“经济奇迹”。）根据这种推理，在这种经济重建时期，因为个人投资获利的积累根本不存在，中央控制和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竞争体系相比，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计划经济能够仅仅根据对社会的最大贡献入手来开发这些投资。<sup>①</sup>

---

<sup>①</sup> Jánossy, Ferenc, *Das Ende der Wirtschaftswunder (The End of the Economic Miracle)*, Frankfurt/Main 1966.

斯大林主义并不能理解马克思关于经济发展的真正设想和推动力的真实观点。斯大林本身的操控作风阻碍了他真正掌握这些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也使他无法看清自己行为的后果。为了保证斯大林的独裁的经济政策，党内机构创造了一套辩护性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将比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更快。[第 138 页] 由于客观经济原因的影响，当苏联经济发展步伐慢下来的时候，斯大林主义的苏联思想也困惑了。这不能解释客观的经济发展状况和苏联官方意识形态的理想化之间的矛盾。斯大林操控下的社会主义快速发展理论同样也是为政治需求服务的。它用来为那些强制手段做辩护，因为那些被污蔑为阻碍苏联经济发展的人被定罪为苏共的敌人。尽管如此，必须做出这样的结论，对于被称为 20 世纪 20 年代“原始积累”的共产主义革命非经典开端的超越已经接近完成了。尽管受到斯大林方法论和意识形态的歪曲，但是苏联经济水平在二战前已经达到了工业化进程的顶峰，甚至超过了打败希特勒之后经济重建时期的水平。因而，为什么我们所描述的这个进程被称为“原始积累”，原因也就不言自明了，这是一个马克思在他所在的年代所描述的进程，是马克思揭露那个年代的决定性法则的进程。如果参照马克思主义的范畴，我们会特意这样做，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从封建社会过渡过来的根本区别。纵观资本主义的发展史，这是一段以血腥和暴力手段达到工业人口和农业人口再分配的历史时期。资本主义只有完成了这种人口革命才能使自己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马克思将此描述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永恒法则”。<sup>①</sup> 只有在这次经济飞跃之后，资本主义正常的生产和再生产秩序才能建立起来。从那时起，工人阶级就把“平常所有的东西都

---

<sup>①</sup> Marx, *Das Kapital (Capital)*, Bd. I. 787.

留给了自然的生产法则。”<sup>①</sup>

没有必要通过细节分析来说明所谓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从性质上有别于前文所说的资本主义增长方式。我们所面对的是资本主义在其经典形式下的正常发展。我们完全认同马克思对英国发展史及其必要性的分析。显而易见的是，在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本不应该选择苏联式的历史转变进程。俄国的发展模式就其自身来说是一种不充分的发展，它把经济水平提升到了发达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水平，使得经济水平足以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因此，尽管运用了暴力，它在历史中的重要地位也是不可否定的。在这种历史环境下，它被赋予本质上不同的功能：尽管它作为瓦解原始生产关系（集体生产）的一种手段，然而，它的主要目的仍然是促进更高级的发展，使客观经济上在生产力的一定的量和质的条件下有效地建设社会主义成为可能。[第 139 页] 与资本主义的起源相对照，尽管在这里运用了暴力，经济动机仍然占主导地位。但是，与资本主义的进程相对照：在经济基础建立之后，社会主义特有的性质应该自觉地穿插进来，以便保证整个社会结构呈现出社会主义特质。这些社会主义具体特性就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了。资本主义是由一个自我调节的生产过程组成的，而社会主义就意味着由一些新生的、复杂的社会任务和可能性作有意识的指导。

为了深入探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主义特有的性质，我们着重探讨了一些演变时期，这些时期里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差异被清晰地表现出来。注意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即便是在技术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通常所指的文化也不过是经济演变的副产品，因而它必定会长久地体现出与经济基础的不对称。这种对称的缺乏通过

---

<sup>①</sup> Marx, *Das Kapital (Capital)*, Bd. I. 765.

一些现象来显示自身，比如说，公共教育不够完善，即便是技术教育也远远滞后于客观的生产需求。最近几年，大多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多次提到这个话题。另外，在特定文化现象成为资本主义投资和投机的新领域的事实中，这种不对称越来越明显了。由于经济上受到大资本的控制，这些文化现象也就完全被操控了，这就使得文化作为纯粹的商品交换的对象的趋势达到了顶峰。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和《共产党宣言》已经分析了这一进程。这种发展在当前时期达到了其典型。与这种资本主义发展相矛盾的是，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即便是在其斯大林主义形式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附于社会主义文化组织的一些原则（这不仅仅是由经济决定的）。作为这种论断的证据，当经济和文化规模都很低下的社会群体能够更多地接触到高质量的科技和艺术作品时，就足以解释这种重要的现象了。然而，社会主义教育存在许多问题，例如，极端的专业化。但是利大于弊，而且其成功能够清楚地说明，资本主义形式与社会主义形式的“原始积累”在任何重要方面都无法相比较。

从历史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都显示他们各自社会形态革命性的根源。从封建主义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或者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都是社会的一大飞跃，并且是社会过程中非典型的演变方式。在这点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相同的。但是，当它们摆脱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而突然出现之后，他们各自进一步发展的道路是不一样的。我们在马克思的立场上指出过，〔第 140 页〕向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过渡最终会导致资本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霸权主义，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必然王国”。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缺乏自主意识和目的意识，完全由必然的经济规律支配着。伴随着一种内在的强大的自治主义，纯粹的经济规律主导着资本主义，决定它未来的情况甚至可能在其自身产生一

个新的社会历史形态（甚至被社会所接受的权威性的人格类型也是经济的内部辩证的产物）。从人类的目的设计来说，社会主义与它之前所有的社会形态都是截然不同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在社会主义向更高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演变的过程中再也不能起作用了。之前我们提到过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错觉，他们认为，所有的社会形态都注定具有同样的发展动力。我们还提到马克思对于这些问题的复杂性的为数不多却在理论上和方法论上具有决定性的评论。

现在我们必须深入到这些相互重叠的问题的核心部分。马克思认识到，经济（必然王国）是共产主义（自由王国）必要的基础。他反对任何形式的乌托邦主义并且同时指出自由王国是必然王国的“另一个世界”。“人类的发展就其自身来说自始自终都在进行着”，决不能认为是经济发展固有的机械的产物。甚至当马克思对一个社会形态做“经济决定论”的论述时，他从来也没有忽视人类的目的性行为。对马克思而言，社会形态的演变不能仅仅建立在经济的内在辩证发展的基础之上。在自由王国阶段，我们相信人类将遵循“各尽所能”的原则进行劳动。<sup>①</sup>

正确掌握了人类劳动过程的社会趋势，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深入到了历史核心的问题。但是，为了正确处理这个问题，人们不能被表面的相似所误导。由于人类劳动过程走向越来越高的层次，人类的自豪感也会因为自己的成就相应地提高，甚至在阶级社会里也是如此。人类自信心的提高并不允许社会忽视人类劳动的历史，从“会说话的工具”的奴隶时代到雇佣劳动力时代，在雇佣劳动时代，劳动者必须在自由市场中对自身的劳动力明确标价。人类劳动的胜

---

<sup>①</sup> Marx, *Das Kapital (Capital)*, Bd. III, S. 828.

利使人类劳动的历史受到更大的关注。当代资本主义开始起步改善工作条件，包括减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制定工作环境的卫生标准以及在工厂系统中实际运用工业心理学。[第 141 页]但这些都是假象。这些无一例外都是为了提高利润，旨在用最简易的方式提高生产效率，这些仅仅是出于经济动机，其真正目的并不是为了提高人们的力量。由于上述原因，经济利润总是资本主义的主要目标并且劳动者必须为资本主义的需要牺牲自己。在经济发展的较低阶段，劳动者的牺牲通常是被暴力所迫。而今，资本主义已经不用赤裸裸的暴力来使劳动者服从了，这就导致了对某些资本主义手段的错误评价。手段变了，但最终结果还是一成不变。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利益仍然是主要目的，而劳动者，依旧和先前一样，只能为了客观的社会生产条件而牺牲自身。马克思所设想的完全不同：并不是要从经济上控制人，而是要为了人性的价值和尊严而调整生产过程。人类的需求必须支配客观条件。这个目标以及其在实践中的实现要求把人类的需求放在经济规律之上，这改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要达到这个目标，高度发达的经济仍旧是前提（用马克思的话说，是基础）。

对此同一个问题的处理，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所采取的角度略有不同。当马克思在这里说起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时（“从各尽所能到各尽所需”），他说到共产主义所带来的革命性变革是“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劳动本身已经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sup>①</sup>这是一种对纯粹经济视野的超越。另一方面，要揭露所有的资本主义假象，并且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生产力的带来的表面

---

<sup>①</sup> Marx, *Randglossen zum programm der Deutschen Arbeiterpartei, Kritik des Gothaer Programms* (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 ), in MEW , Bd. 19, S. 21.

的“缓和”与“可接受性”也不能掩盖资本主义的本质。它们仍然让经济来控制人，而马克思刚好相反，他要推翻这种进程，要让人性去主宰经济。

这并不是一个乌托邦式空想的实例。傅立叶（Charles Fourier）用一种非常近似的方式表达了他对社会主义中人类状况的观念，他认为劳动本身将会演变成为一场游戏。对未来的这种梦想毫无疑问给马克思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但是通过对经济规律的精确地科学研究，他发现了自己的观点与傅立叶的不同之处，他现在把这称为“太过于幼稚了”。马克思从每一个可能的角度阐明他对人类劳动的本质的认识。另一方面，他在抽象意义上把劳动定义为人类的最高成就，而不仅仅将其局限于经济活动。“真正的自由劳动，比如说作曲，同时也是非常费力的差使，[第142页]需要花费很大的努力。”同时，他在与亚当·斯密的直言不讳地争论中联系整个劳动领域扩展了劳动的定义：“把劳动仅仅看做是一种奉献，由于劳动的价值定位，就相当于支付一件商品所需要的价格一样，因而根据花费劳动的多少来定价，这其实是一种负面的定义。”<sup>①</sup>在此书的另一个地方，他对劳动的定义作了更加充分的解释：“个体特性的发展，因而，并不是把缩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转移到剩余劳动中去，而是实际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减到最小，这样就有可能用节省下来的、对所有人都是自由的时间对每一个劳动者进行艺术和科技教育。”<sup>②</sup>由于这个原因，因而“剩余”这个词运用到劳动领域时，只有与纯粹经济范畴联系起来才有意义。既然从经济上说有剩余劳动这一说，

---

① Marx,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The Foundation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S. 505.

② Ebd., S. 593.



那么当提到社会物质的自我再生产及其组成成分时，就不能有剩余劳动这一说法了。当劳动运用于社会生产力和人类劳动能力提高之后，就永远不会有足够的劳动。劳动的经济过剩绝不会使从社会角度说的劳动真正过剩，相反，会使劳动的效用和不可或缺性得到证实。此外，马克思在早期就认识到，作为劳动者从“奴役性压迫”中被解放出来的后果，消除劳动分工是共产主义的社会条件。但是后期的马克思，通过对经济学的科学研究，又推翻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劳动分工“作为生存的首要条件”是劳动的重要前提。更加成熟的马克思最后认识到，劳动分工最终提升了人类力量，因为劳动分工提高了人类生产力，而这降低了必要劳动时间，增加了自由劳动时间。但是，劳动的束缚决不仅仅是完善的现代经济能够消除的原始条件的遗留。恰恰相反的是，这种束缚的延续正好是科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而资本主义以各种不同形式为了自身目的去奴役劳动者。渐渐地，这种对劳动者的奴役扩展到科学和艺术领域。当今越来越多的对异化的资本主义的批评涉及到了这种奴役关系，尽管没有看清楚这种奴役与私有财产之间的真正联系，并非偶然，他们把自己同这种奴役联系在一起。

在马克思主义那些具有建设性的评论里，我们可以察觉到两种彼此相关却相互冲突的趋势，这对我们解决问题非常重要。马克思并不满足于纯粹地从经济学来分析。相反，马克思思想说明，共产主义的社会先决条件（即便是作为经济形态的社会主义），只有劳动解放的社会结构能够在技术和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中建立起来，才能够实现。[第143页] 为了实现人类劳动的解放和实践的自由，有必要重新构建迄今为止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条件。这种重构必须以不危及生产总量的功能的方式进行，相反应该对其起促进作用。我们知道，马克思特别强调两点：把人的类存在的最尊贵和有价值

的方面作为衡量经济过程的标准。并且与之紧密相联的是，超越劳动分工的奴役性质。几乎不必指出，在这两件事情中用只言片语介绍这种变化是不可能的。这种重大的变化必将会导致缓慢的社会进程，在这种社会进程中，渐渐地会发起一些修正。经济基础为这种趋势的主观和客观发展提供了物质可能。

这些进程同时也改变了人类自身的性质。这些进程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掌握着人类的能动的社会存在。整个人类历史表明，理想化地追求一种能够包含人类的真正人性的生活模式，往往会有结果。完善人的类存在的梦想的产生，通过人类实践活动朝着这个目标前进，这同时也是社会进步的有力手段。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个体事例中的彻底终结和失败。在阶级社会里，客观经济规律支配着人类目的行为，因而阻碍了这种向上的发展。只有以客观的态度来对待日常生活（包括所有的劳动和经济实践活动），去促进社会存在的发展，人类的共同目标才可能实现。各种形式的阻碍都无法否定和剥夺改善人类条件这种趋势，在过去存在的一切社会形态下如此，现在也是如此。人通过自己的社会活动首次创造了条件使自己成为真正的人类，这一时期，即便是在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里，也会被认为是那一决定性时刻的先声，那就是马克思声称的人类史前阶段的结束。

和马克思一样，我们认为，劳动是人的类存在的核心问题。然而，很明显，我们之前讨论的问题是与人实践活动的总和，与人类的生活相关的。为了占据一个与经济王国联系紧密的位置，人们思考共产主义社会要实现的按需分配的经济原则。然而，既然在过去的社会里，需求的满足仅仅局限于统治阶级，而到了现代社会，却扩大到了广大劳动人民，因而共产主义的这一原则是很难实现的，如果仅仅考虑需求的满足，就只会成为消费主义。[第 144 页] 在当

今社会里，人们消费主要不是为了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而是作为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成功的手段，是为了更高的社会威望和爬上更高的社会阶层。消费品行业和服务业的巨大发展有了经济保障，正是因为消费者不断地斗争以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在不改变商业社会的基础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社会将会陷入越来越不景气的境地。除非把经济当作是人类有目的的设计的主要目标，要想把商业社会的能量直接引向改善人类生活的有组织的实践活动中去是不可能的。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要推翻具有奴役性的劳动分工，仅靠个人单独的努力是不可能实现的。

至此，我们持续讨论了关于人类日常生活的观点，但只是一些皮毛。这种讨论并不充分，因为我们根本无法详细列出所有与之有关的问题。然而，对这个观点的介绍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入地分析社会主义民主的意义。前面我们做过这样的陈述：与萌生于资产阶级革命高潮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下的公民理想主义相比，社会主义的主题是人类的日常物质生活。资本主义社会以双重标准将个体区分为人与公民，而社会主义所强调的日常，并不是推崇作为双重标准之一的物质人。社会主义民主把在自由王国里超越这种双重性作为自己的任务。

这个原则并不仅仅是思辨的构造，我们提到过，群众运动已经展示了这一点，而这些运动已经被引向并最终促成了社会主义革命。毫无疑问，我们指的是1871年、1905年和1917年对苏维埃的运用。我们勾勒了这个运动是如何将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作为自己的目标，这个新的社会秩序非常有效并且迎合了属于社会下层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涵盖的范围包括从诸如工厂和住房这类日常生活中的小问题到整个社会的重大政治问题。内战胜利以后，这些目标都被官僚制度所取代，斯大林实质性地毁坏了整个苏维埃体系，并且确定了这

种官僚控制的最终形式。（教科书和官方宣传文件是这样说的，这种转变的意识形态上的理由对我们这些关心现实社会性质的人而言是毫无益处的。）劳动人民失去了在社会演变过程中发挥主体作用的地位。他们又成为了更强大而包罗万象的，能够控制他们实际生活中所有问题的官僚制度的对象。

实际上，俄国的斯大林化完全扼杀了社会主义发展成为自由王国的可能性。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列宁认为社会主义民主的更高理想对20世纪20年代俄国的广泛斗争具有启发式的意义，[第145页]列宁对此从未动摇过。即便是在年轻而弱小的苏维埃共和国在内战中极力自保的时候，列宁依旧坚持社会主义生活更高形式的原则决不能脱离《怎么办？》中的实用的、日常的纲领。列宁确信，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留下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精确蓝图，但是这个蓝图的发现和正确实施是当今的一个新的重大任务。然而，他推测，面向未来的行动与当今时代的现实需求之间肯定有着有机联系。他知道，未来只有通过人类的实践才能实现。目的性行为与眼下需求之间的联系就是他的思想和行动的主要特征。而他的行动对于为了实现更高目标的运动，永远都是不可缺少的。这种行动方法学一直存在于他对那些专注于“链条上的下一个联结”的同事们的告诫里。然而，他的想法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他的思维过程也受到他生活的历史环境的限制。前面列宁对习惯的定义与即时性和目的性相互关系的问题所包含的复杂性毫不相干。他所讨论的习惯与“国家消亡”的必要前提息息相关。这与对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尤其是社会主义高级阶段革命性过渡起决定性作用的主观力量和客观力量之间的连接也不相干。因而，他对苏维埃民主的观点，他与托洛茨基关于工会的争论都没有超越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的限制，更重要的是没有超越布尔什维克党内盛行的观点。

列宁的行动方法论对我们当今仍然很有意义。关于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过程中涉及的问题的复杂性，他第一个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概念化并且为人类的日常实践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人们才能发现马克思对社会进行分析的普遍的理论基础。列宁的行为不能当作今天的无可挑剔的模式和无可懈可击的范式来使用，因为他所处的情形下面对的困难与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的。一方面，列宁的陈述必须放在 1917 年十月革命的大环境下去解释，在十月革命期间，自发的苏维埃运动占据了中心位置。另一方面，必须看到它们是在采用新经济政策的紧急过渡的背景下发生的。在此时期，他承诺挽救在资产阶级威胁下所取得的社会主义民主革命成果。他希望尽可能地转向一个即将来临的、苏维埃运动依旧存在的历史时期。

我们发现，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形与前面我们描述的那个时期完全不一样。[第 146 页] 在斯大林长达数十年的统治之后，产生权威性社会主义的各种因素实际上彻底消失了。产生斯大林主义的历史因素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今天，一系列完全不同的因素，主观的和客观的因素导致人们对斯大林时期有了更多了解并且开始批评斯大林时期的统治。从我们关于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是在斯大林统治下广大劳动者的自发活动实际上已经消失了。这不仅体现在重大政治问题上，而且还体现在控制他们自身的日常生活上。我们强调实际上这个词，因为即便是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在形式上来说，许多问题都根据形式化的民主程序得到了解决，比如通过秘密投票和普选。然而，斯大林的独裁控制是如此的广泛和强大，以至于通常来说，这种投票基本上没有给广大民众的现实意愿、厌恶和观点以发泄的途径。既然如此，那么 1917 年的实际情形必须被看作是在很久以前就已经被根除了。

斯大林强加的这种社会和政治上的畸形逐渐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正常情况。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阶级斗争应不断加强的观点，被斯大林用来作为其极权主义的历史借口。这种观点在斯大林时期经常——虽然并没有从根本上——受到批评。但是，它仍然为斯大林实行残酷的霸权实践提供了名义上的理论合法性。他创造了这样一种引发心理上的内战的氛围。疯狂地探究内部敌人成为行动的准则：尽管内战已经结束，但是每一个人都还可能会是潜在的叛徒。我们必须清楚，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第一次批判来源于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从政治上来说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反对派已经被驱除了，在政治上也毫无权力。反对派不是真正的危险，而内战也根本不存在。虽然是片面的，但是对斯大林体系的正确批判也并没有收到立竿见影的政治效果。即便是在赫鲁晓夫之后，内战教条也没有中断，而是在苏联政府的内部政策里得到复兴。苏共二十大后，苏联政府把这些批判视为公开或秘密的颠覆性声明，必须镇压下去，因为与官方核准的观点不相符。这个大有前途的对斯大林体系的客观评价始于苏共二十大，却被克里姆林宫的继任统治者终止了。尽管苏共二十大尽量克制对斯大林的批判，但是苏联政权的继任者仍然退回到了斯大林主义。

苏共二十大的积极成就，是它开创了批判斯大林主义体系的先河，[第147页]其弱点在于，它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是片面的。它的攻击集中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并没有触及到斯大林主义的核心部分。对个人崇拜的谴责表明了这种批判的不充分，也显示了为什么苏共二十大的影响如此有限。对个人崇拜的驳斥本身是不错的，只是不够彻底。斯大林的统治手段来源于他对法律原则的破坏，这个观点同样也是对的。对这两件事的评论都没有任何错误，只是从理论和实践上来说，忽视了这些关键问题的本质。在教条式主观

臆断的基础上对广大群众的残暴统治并不仅仅是他机敏、极端利己和暴虐性格的产物。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历史都不断给出新的例证来说明在集体的、持续压制的实践中，极权统治照样能够实施。另外，对法律原则的破坏，其本身并没有导致极权主义。每一个现代国家都拥有完善的司法技巧，足以保证它实行合法的统治。为了保证社会和政治的统一，这是很有必要的。正如苏联在公开的、极度的践踏法制基础上的个人崇拜，把与政治教条相符的个人行为标榜为社会正常现象，而与政治教条不符的个人行为就是不正常的社会现象，这样每个拥有合法统治手段的国家都能够对全体人民推行它的政治标准。斯大林主义并不能被还原为对个人的极权主义或者对法律原则的践踏。

斯大林主义体系的核心在于其他一些原因。斯大林主义体系根源于经济问题，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这同一个经济问题困扰了那些在列宁逝世后卷入权力斗争的人。核心问题是关于所谓的“原始积累”。之前，我们试图说明生产方式社会化的积极因素是如何为建立一个有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国家创造条件的。在“原始积累”和快速工业化的大背景下，斯大林的残酷霸权体系取得了许多成就。（斯大林不能认识到这些成功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基础上的。）事实上，斯大林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在两个“重建”时期还有了进一步的增长。然而，当生产发展到一定水平，社会主义国家所面对的问题也改变了。新的问题不再是“原始积累”，而是所生产的产品以及给人民提供的服务的质量问题。从经济上来说，斯大林主义对快速工业化时期还是适用的，然而，当苏联经济发展到更高水平时，它就失去了自己的历史作用。

斯大林主义体系并没有根据它自身所创造的社会经济新秩序做出成功的调整。斯大林主义试图用过时的政治模式去统治二战后新

的社会经济秩序。〔第 148 页〕苏联的政治和经济之间出现了分离，而斯大林主义依旧想用二十年代的政治结构统治二战后的社会秩序。这可以从技术专家事件中看出来。在“原始积累”阶段，新生的苏联继承了革命前资本主义以及沙皇手中的技术专家这一社会阶层。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对社会主义疏远，有的甚至是直接敌视。而今天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在长达数十年的社会主义基础建设期间，那些敌视社会主义的沙皇时期的技术专家有的已经逝世，有的已经退休，因而这一敌对阶层也就消失了。然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其他一些文章中提到，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培养了一个忠于苏联的技术知识分子阶层。就坚持某个特定的世界观来说，这个阶层的人并不是共产主义者，但是也不是苏联制度的敌人和不负责任的看客。在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下培养出来的这些知识分子，他们是苏联人，他们把在生产过程中所做的工作当作自己的正常职业，而他们毫无疑问想作为苏联制度忠实和高贵的贡献者而得到认可和优待。年轻一代背叛斯大林主义体系主要是基于客观的社会背景。到目前为止，斯大林主义的政治代理人控制技术专家的方法已经成型。然而，这个作为苏联进一步发展的力量的、新生的、对社会必不可少的专家阶层的政治和经济行为，需要一些和斯大林时期的管理方法相比有所改变的方法。

新的管理方法的问题最终与生产本身的控制和目标紧密联系。从经济和政治上来说，生产的发展仅仅靠重视重工业建设，而不顾消费需求，是越来越不可能了。在革命理想主义阶段，最好就是呼吁人民群众采取抑制消费的政策，这是唯一可行和有充分理由的方法。关键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为了建设相对先进的科技工业机构而成功发挥作用的官僚集权和中央计划控制的方法，在当今必须被判定为完全无效的。中央集权的官僚计划机制越严格，就越难从数



量上和质量上满足大众消费。这种缺陷在生产消费品的制造业中已经凸显出来。从这点来说，我们并不认同这种行之有效的战时经济模式的适用性，因为它不可能使得对战时生产的牢固控制成为公民日常生活的标准。

[第 149 页] 我们相信共产主义世界的社会经济压力已经带来一个重建的时期，同时，把社会主义民主引进生活的重新尝试的再思考的时机也随之来临。在本书开头部分我们提到的两种错误方案，在共产主义世界也开始走向前台：通过保存斯大林主义方法的实质而局部改善这场危机的尝试，或者采用在西方占支配地位的那些方法。一方面，集体计划的官僚机构不想放弃其绝对领导的角色，尽管每一个细致的调查都表明，它所采用的标准、执行的任务以及控制手段，并没有成功地满足人民的真正的实际需求。保守派建议给现有机构提供全自动控制的机器来确保他们的计算更加精确，似乎靠这种方法就能改善那些在根本上存在缺陷的机制。另一方面，从改革者角度来说，他们提倡的是西方工业组织的模式。改革者从这样一种错误假设入手，即资本主义下的市场竞争（考虑到其利弊），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才能实现其梦想，因为只有在没有相互竞争的资本家存在的情况下，社会才能完美地适应市场力量。改革者和斯大林主义者忙于初步的实验阶段。但是这些都是建立在密不可分而没有决定意义的妥协的基础之上，那就是保持仍然很强大的集中计划机制的完整性和不可触动性。

对这些经济问题进行详尽论述并不是我们的真正目的，更重要的是要看到政治和经济之间的相互联系。经济改革已经提上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日程，这一事实就意味着社会主义民主问题也成了当务之急。我们多次指出，苏维埃运动是历史上特殊的、仅有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形式。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如果我们不以一种抽象

的方式，而是用相对社会历史的方式解决民主化进程问题，我们将面临全新的局面。在推行新经济政策过程中与这些问题的复杂性进行理论斗争时，列宁就遇到过这种情况。基本问题在于：苏维埃仍然同当今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化问题相关吗？苏维埃运动、广大民众所施加的压力都是社会动力，立刻使人们的日常事务与高层政治的重大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群众自发的运动似乎已经完全终结了。我们已经指出过，当社会制度失去了合法性并且变得退化的时候，广大群众就会对其毫无兴趣。当社会政治结构不再合法，也不符合民主利益的时候，广大人民群众就会对其冷漠无情。〔第150页〕今天，人民参加各种会议、讨论和选举，是因为这能满足他们眼前的自身利益，而不是为了作为反对派出现在那些官方机构面前。然而，他们仍然过于被动或者他们的参与把自身限制在官方提议的程序化批准之中。参与者深刻地明白了，他们的参与对那些问题本身来说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时常还会给参与者个人带来危害。一般说来，尽管官方描绘的事实是另一幅蓝图，并且成为公务记录的一部分，但这些事实的实际情况还是广为人知的，政治参与被降低为纯粹的机械主义。

另一方面，充满活力而且自由的公众舆论依然存在，只是采取了地下和隐蔽的形式。这种隐蔽的“公众舆论”不会以公开和正式的方式表达出来。在东欧社会范围内而且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公众舆论其实就是一种私人密谈，即时地和自发地发生在两个人之间进行的讨论。这样的秘密世界所产生的真正影响是多种多样的。然而，把它看作毫无益处或者低估它都是大错特错的。我仅仅通过提及我几十年的经验，说明在文化领域取得的成功是由这种地下的公众舆论决定的。一件艺术品是肤浅的还是具有艺术价值，一部小说是否能够成功改编成电影，这些问题更多是由秘密世界决定

的，而不是由那些出版物里的批评所决定（首先是那些官方作者写的批评）。

很难衡量这个秘密世界对经济领域的影响有多大。我们决不能忘记，这种规章体系以及前面说到的对整个社会进程的操控，由于与现实太过于脱节以至于不能实现对自由思想和自由行动进行控制的最初目标。资本主义体系下的官僚控制要比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少得多。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有许多自发的铁路大罢工，工人们自发地不愿服从雇主，最终使得所有商业活动处于停滞状态。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这种工人反抗，促使资本和劳动力之间达成妥协。这些类型的产业调整，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妥协，通常是以管理层和工人阶级之间私下谈判的方式达成的。在很大程度上，这种使劳动力和资本都有所收获的调整，涉及到了工厂里的劳动条件和运输手段等诸多事宜。当今的社会主义，社会异化现象比资本主义更加严重。因为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抽象、机械和官僚化的，社会主义所发生的罢工现象和私有制世界所发生的一样频繁，在所谓的“劳动者的天堂”里，劳动力动荡的局面依然存在。

[第 151 页] 这种无声的地下公众舆论是现存的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的开口楔子。它是一种社会力量，它转移到系统的公众实践中，在我看来这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的第一步。用旧的方法推行民主化进程是行不通的。它也不可能通过自发的革命性巨变取得成功。试图通过复兴苏维埃运动来取得成功也是不可能的，在革命时代，苏维埃运动被看作是延伸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直接民主。回到过去所需要的主观和客观条件都不存在，任何梦想着过去那种自发的苏维埃运动得到复苏的人都是自找没趣，都是空想。这种幻想源自于对过去英雄主义的个人热情和高度承诺，但是期待着像 1871 年或

者 1905 年一样广度和深度的革命运动再次发生是毫无希望的。斯大林主义时期，独裁的方式中断了苏维埃运动的延续，同时，运动本身在内部也受到了反对倾向的支配。从理论上来说，立即地、完全地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质上实行正确复兴已经不可能了，因而直接复兴过去那种伟大传统也是不可能的。苏维埃运动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是十几年来社会发展的产物，它不可能单凭个人或者某个政党的意志再次出现。如果把苏维埃运动看作可以由于人的意志重新回到历史舞台，就等于仍旧囚禁在官僚式的策略优先的危险的封闭的圈子里。官僚式的策略会阻碍或者延缓历史进程，甚至会把历史进程引向错误的轨道。但是官僚策略却不能以它自身已有的形式来动员人民大众推行激进的广泛的改革进程。

这种地下运动的觉醒也不可能模仿先前苏维埃运动那热情激昂、自发的形式。经验告诉我们，这种无声无息、隐蔽的倾向，作为一种自觉的批判力量发展成一种与社会相关的模式也不可能重复先前的制度模式。但这并不意味着一种不同类型的革新也不可能。实际上，我们知道，如果不能有效地号召那些受到镇压而销声匿迹的地下力量，要推翻当前机械的、集中和超官僚化的计划体制实践是不可能的。对集中计划的批判流露出分权的必要性。宣传和欺骗，那些斯大林主义政党使用的老手段，并不能完成反官僚化的任务。广大民众必将会经历社会主义经济的重新定向，在日常生活的基础上与斯大林主义传统彻底决裂。广大民众必须接受再教育、恢复活力，才能再次感觉到他们自身的潜力。因为这个原因，仅仅去除阻碍民众自由表达个人观点的社会心理壁垒是远远不够的。〔第 152 页〕由于对派系组织的恐惧，斯大林时期不仅抑制了个人观点的表达，而且系统地迫害和根除了对斯大林体系的批评和改进以及对根除特定的功能障碍做出很大贡献的任何类型的工会组织。没有广大民众的

积极参与，没有那些自发而短暂、临时并且经常没有具体形式的社会团体，摧毁官僚政治也是不可能的。通过这些地下运动有意识地动员，广大民众再一次获得了一种权力意识，那就是他们能够改善自己的日常生活。

对斯大林体系的长期容忍，对广大民众的创造性产生了毁灭性的后果。他们失去了对自己的信仰，甚至不相信他们自身的个人—社会实践的可能性。在那时，即在1917年自发的爆炸性的十月革命所引发的苏维埃运动的情况下，广大民众习惯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那是很合理的。在斯大林时期，不是主动行为而是被动行为才是规则，因为在当时的独裁情况下，这更加合理。强调列宁思想中的习惯概念的重要性既是正确的也是有益的，它具有双重意义，它包含两种选择：它表示激进的变化，不管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或者，根据其固有的性质，它还表示一种社会妥协。在整个斯大林主义的策略优先时期，当整个社会全面而广泛地受到官僚制度的控制时，不管主动参与者还是持无所谓态度的被动参与者，都不得不使他们做出调整以使自身习惯于在这样一个体制中生活。

我们现在将要讨论的是人类实践活动类型的社会结构和人类性格模式的社会起源。法国和俄国大革命的英雄时代已经结束，我们拥有的不是伟大而是平凡。当今的世界是为小人物而造的，我们必须满足于对过去那些高贵典范的苍白回忆。社会主义存在着这样一种活跃的理想主义者的类型，东欧的批评家们把这些政治活跃分子看作是公民模型的当代讽刺画。政治活跃分子拥有理想主义（在马克思的意义上），但是存在着一个很重要的差别，那就是，当今的这种类型既不是由于其主导人格从事革命运动的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理想主义者，例如雅各宾派运动时期的理想主义者；也不是当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所代表的那些形式的、空洞的和肤浅的个人。社

会主义活跃分子把自己限于为了执行党的决议无私奉献并且坚信他们是在为无产阶级革命目标服务。（为了避免任何误解，我想澄清一下，这段话并不是指向一般而言的纪律，而是与某一种类型的人或者某种实践模式的社会结构的重要问题有关。[第 153 页] 对比中的决定性差异与批判和超越的问题相关联。有一种纪律不允许批判和改进，那是盲目服从；还有一种纪律是集参与、投入、自我修正和扬弃于一体，这是任何政治运动都必不可少的。）

除了我们提到过的人类实践形式以外，还出现了一种对比性很强的类型，他们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谋求个人更高的生活水平，他们通过一些可接受的或者鬼鬼祟祟的甚至是非法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他们的心理和道德观与资产阶级社会的个人异常接近，但是从性质上来说还是与资产阶级的行为有着明显的区别，因为没有任何人类剥削源于这种操控活动。当然，我们并不认为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属于非法行为。我们要质问的是那些凌驾于法律之上，钻法律漏洞，控制传统的和新兴的习惯模式以满足自私自利和自我膨胀的行为。从这点上来说，必须引进一个条件限制：社会主义生产和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没有可比性，尤其是就大规模、集中程度和官僚化形式的生产来说。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从一开始，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结构使任何依靠剥削别人劳动的积累都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社会创造的工作种类是没有剥削的，绝大多数的社会主义劳动者都包括在这个范畴之中，他们在工作中或多或少都带有个人的责任心。然而，劳动人民提高生活水平的强烈愿望与他们对政治的冷漠之间存在着不一致。他们关心的是经济的发展，但是在对现有政治结构进行修正批评的权利上做出了妥协。

这些论述并不是想要为社会主义人类行为类型的总体性以及其衍生的问题提供详细的标准。因此，仅仅有必要指出由斯大林开创

的生产秩序里演变出来的各种主体的社会趋势，我们的主要目标是要区分对斯大林体系的社会主义批评的各种形式和资产阶级批评的各种形式。自从新经济政策推行以来，资本主义的反共产主义者就主张，社会主义社会将以类似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样式发展，或者说一个单一的工业社会会演变成为全球规模的发展，在这种规模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差异就会消失。相反，我们已经多次提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状况显示，生产资料社会化产生的客观社会关系从性质上来说与阶级社会是不一样的。[第 154 页] 然而对现有社会主义社会的敏锐、深刻的分析表明，它的确客观上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关系并且使其变得不可能。但是在这样的政治和社会条件下发展，它的政治结构没有能力——不是还没有——建立起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在政治上还没有授权于社会主义的人。广大劳动人民并没有寻找到把他们自己变成能动主体的方法。他们不知道怎样把生产资料社会化转化成基础，在这个基础下，他们就可以在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下成为自由的人。现有的社会主义缺乏客观的社会主义特性，要归因于资产阶级高超的诽谤和煽动手段。相反，社会主义社会主观特性的建设与扩展仍然是那些坚持认为与资本主义的矛盾相比，社会主义是唯一值得信赖的选择的那些人当今和将来的主要任务。

从客观立场考虑，我们涉及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斯大林推行的经济和社会秩序能够克服俄国经济内在的不发达的影响，并且伴随着生产力出人意料的发展，的确为自由王国奠定了基础。这个陈述与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不相干也并不涉及社会主义无法摧毁富足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这一事实。自由王国为人类独特的自我创造奠定了充分的基础。吊诡的是，斯大林主义制度不仅为人类的自我创造奠定了基础，而且还给人类生成过程的实现带来了客观的难以克服

的障碍。我们在分析资产阶级民主时已经涉及到了这个矛盾。马克思试图解释，建立了人权原则的法国大革命，在它的基本章程里人们是怎样限制人的自由的。他说道：“但是，自由这项人权并不是建立在人与人结合起来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人与人分离的基础上。这项权利就是这种分离的权利，是狭隘的、封闭在自身的个人的权利。”资产阶级社会“使每个人不是把别人看作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作自己自由的限制。”<sup>①</sup>

马克思阐释的那些文本准确地描绘了社会现实，尽管它们的作者被注入了革命转变时期英雄主义的幻觉。如果想要正确理解这些文本，我们必须把他们看作是提供了资产阶级社会真实状况的缩影。他们的伟大先驱霍布斯这样描述到，在资本主义下，人类的生存状况是“一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法国小说家马奎斯·迪·萨德（Marquis de Sade）的作品也反映了资本主义下人类生存状况的本质。而当代资产阶级最新发现迪·萨德是一位严肃的思想家。性行为是资本主义人与人关系的一面镜子。[第155页]马奎斯·迪·萨德描述性行为时，他认为性行为并不是作为两个平等人之间的伙伴关系被两个人分享的正常活动，而是男性仅仅把女性当作性欲对象而进行剥夺的活动，女性是完全被支配的对象，她们的参与、感觉和反应，男性从来都是漠不关心的。通过说明占有的观点可以得到极端的执行，康德对婚姻的著名定义详细地说明了资本主义固有的社会现实。康德把迪·萨德的极端利己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商品交易的语言融合在一起，他说道：“婚姻就是两个不同性别的人为了一生独占彼此的生殖器官而签订的协议。”

正如今天频繁发生的那样，上面这段论述不应该把我们讨论的

---

<sup>①</sup> Marx, *Zur Judenfrage (On the Jewish Question)*, Bd. 1, S. 360.



客观的焦点从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特征的性行为转移到性行为本身上来。它仅仅应该指出，马克思说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基本结构的普遍特征必然是真实的，并且必然会准确地描述出资本主义下各种类型的人类实践。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已经表述了资本主义普遍的人类关系。下面这几句话就是从这本著作中关于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实践活动以及由资本主义经济必然引出的行为：“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sup>①</sup> 这个被列入历史议事日程的问题是关于人类的人性化进程的。社会主义革命关注的是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以及在这种更高级的社会形态里出现新的人类社会存在。通过新的社会环境的生产，这一新的人类和社会存在会以自发的社会主义人类的实践活动创造出人类新的相互依赖、相互合作关系。

明确由封建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重要区别是很有必要的：历史见证了社会的许多革命性转变，但是每一次都有自身独特的特征。封建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涉及到了激进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兴起。比较一下 18 和 19 世纪制造业时代的劳动分工和封建主义的行会，每个劳动者与其劳动过程的关系的激进变化立刻就很鲜明了。由于这种转变，工人的态度——他们被迫对这种新情况选择要么积极要么消极的态度——将会由社会劳动分工强加给工人。

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是截然不同的。[第 156 页] 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是由一个阶级剥削社会过渡到

---

<sup>①</sup> Marx and Engels, *Das Manifesto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the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S. 465.

另一个阶级剥削社会，尽管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剥削达到了相应的更高水平。相反，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其过程关注的是超越任何剥削。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给所有类型的社会物质生产带来了激烈的变化。（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这足以表明封建行会体制与资本主义大生产下的劳动分工的不同）。尽管生产方式的变化和剥削的消灭都是社会变化，但技术变化却非常不同。由于区别于社会变化，技术进步不能构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差别，而是有其自身独立的内在趋势。（为资本主义生产建设的工厂，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不加任何改变都可以拿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反之亦然。）但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或者生产资料社会化，彻底改变了社会。生产资料社会化完全可以重新塑造生产模式，因而能够改变人们的日常活动模式。当生产力总体上受社会支配时，这就给人本身、人和自身劳动的关系以及和同事的关系带来彻底的变化。这些都是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严格的社会前提。列宁在其关于战争的文章中明确说到，社会主义的确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但是经济基础决不可能形成社会主义的整体环境。<sup>①</sup>有人怀疑是否通过社会关系的变革人也会改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采用相反的观点，那就是人只能通过社会意识形态的变革才能转变。意识形态，作为社会发展的理论和实际的契机，作为解决物质生产过程引发的社会冲突的手段，确实是每个社会上层建筑重要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然而，它仍然只是一种反映，是人类用来帮助理解生产的客观变革的图像。意识形态必须得有经济基础才可以使它作为社会力量的实际影响不会被消除。行之有效的方法

---

<sup>①</sup> Lenin, *Die Ergebnisse der Diskussion über Selbstbestimmung* ( *The Results of the Discussion over Self - Determination* ), in LW Bd. 22, S. 326.

是，意识形态必须广泛、深入地扎根于客观的社会存在。

社会的变迁往往是主客观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历史变迁是由无意识的经济力量和有意识的意识形态力量共同推进。物质资料的生产——自然不是没有意识形态反应的介入——必然会推动人的变革，推动人向有意识的、能够有目的地计划未来的社会形态的变革。无处不在的、机械的经济作用，就自发的辩证法来说，不可能给人类带来这样的变革。[第 157 页] 经济，作为未来社会的基础，必须根据人类的设计来指导。目标必须根据人的智慧来制定，这样才能创造出能够唤起人与同伴合作关系的社会条件。目标必须对人起作用，这样他们才能意识到自身的真正的类存在。

通过对向资本主义过渡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对比可以看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革命性变革在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因为社会主义是如此独特，所以历史上没有可以相提并论的例子去衡量它。出于这个原因，如果有人试图预言未来社会主义秩序的性质的话，那就必须细心、谨慎地运用从以前的历史社会形态中学到的教训。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以充分的理由指出，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历史上最后一个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社会形态。在此过程中，他不仅指出了经济剥削，还指出了经济剥削对主体间关系的影响。拉萨尔和斯大林都对社会主义做出了荒谬的定义，因为他们都把社会主义局限在经济领域。对拉萨尔来说，社会主义是“对劳动的全额补偿”的权力的同义词。当斯大林给社会主义作出一个经济学家的定义，把社会主义等同于废除剩余劳动时，他回避了重要的一点，完全忘记了剩余劳动是社会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因素。他忽略了剩余劳动涉及的人类生活内在和外在的变革，忽略了剩余劳动是客观的经济和主体的人的相互作用。重复一下上面的论述：资产阶级喜欢提到人类劳动的人性化，他们声称这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正在发生。然而，

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主体的人在不断调整以适应客观经济。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所谓“劳动人性化”预示着那些能够使人类适应现有的和新兴的劳动模式的方法的诞生。劳动条件的改善是提高生产力的手段。而提高生产力同时也是为了增加对剩余劳动的剥削。劳动人性化在社会主义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在社会主义，客观经济必须屈服和适应作为主体的人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主观控制着客观。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类劳动的模式必须与人的类存在相符合，人的存在成为组织劳动条件的标准和指导原则。

很显然，随着经济支配地位的废除，生产过程的重构本身就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创造更高尚的人类这一目标的物质力量。很明显的是，只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才能拥有生产更高尚的人类这一目标。[第 158 页] 生产资料社会化是人类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而进行有目的计划的必要前提条件。然而，同样明显的是，人类有目的的活动自身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主观依赖于客观，人类实践的确能够成就很多，但是劳动的人性化和人类的彻底解放同样依赖一定的生产力发展的客观水平。

我们必须指出，主观和客观是相互作用的过程。人的类本质的实现必须与生产力的可能性相一致，以便于在实际世界中能得以实现。但是劳动人性化并不能单纯源于生产领域；正如列宁煞费苦心指出的，它必须要从外部，从个人从事的直接的生产过程之外的来源中被引入。它必须得到政治主体的支持。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的特殊功能。社会主义民主的特殊性是把人性化观点的外部理论带入到经济领域，这是社会主义的政治任务所决定的。这个任务同时也决定了社会主义民主与以往所有建立在私有制、剥削和异化基础上的民主形式，尤其是与资本主义模式民主的主要差别。产生于 1917 年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个政治社会任务，在我们不断提到的

伟大的、激情高昂的、自发的苏维埃运动中得到直接的广大的拥护。对于如何才能把社会主义民主变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还没有固定的指导方针。过去和现在的教训给我们勾勒出大致的蓝图。在社会主义民主问题被看作紧迫的社会可能性被提出之前，1871年和1905年革命就已经被镇压了。在列宁的晚年，苏维埃运动受到衰退和分裂的突然袭击。我们已经评论了列宁维护苏维埃体系作为社会主义政治内容的无效努力，他把苏维埃看作是对抗那曾经不可抗拒的，得到提高的官僚制度的活生生的民主力量。

我们知道，这些努力都化为乌有了。今天，社会主义世界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才能重建马克思主义？能够促使马克思主义复兴的社会力量是什么？现实地说，想要复兴苏维埃运动是不可能的，任何重建苏维埃的希望也缺乏理论基础。另外，促使1917年革命自发发展的革命条件也无法重新出现，并且没有人愿意回到那个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衰退时期。在斯大林时期长时间僵化后，马克思主义的复兴，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目前的任务，不能直接与任何社会运动联系在一起。对我们提到过的悄然无声的、地下的运动也是如此，因为马克思主义不能为这些运动的重生提供理论基础了。相反地，马克思主义复兴的尝试必须要从理论基础开始。[第159页]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分析当今社会主义的危机，因为只有理解危机的原因，我们才能重新定义马克思主义并且才能为有意识地复兴马克思主义建立指导原则。只有在重新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我们才能提出一个与目前的现实状况相符合的策略，一个恰当的个人实践策略。谁若是涉足理论重建，谁就开始了—一个受到意识启发的、有意识指导的、不断延伸和矛盾的过程。人们永远不能忽视重新定义社会主义涉及到的丰富的辩证法，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冲突，这些都应该被纳入到我们对这更高的社会秩序的理解中

来。一方面，直接与经济相对的人类实践活动不会限制经济的发展，相反会组织那些纯粹的经济活动更好地满足社会的需要。另一方面，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是一项长期的工程，只有当社会实践活动与纯粹的经济活动相一致时，促进它发展的前提才能建立起来。对社会主义民主内容的理论上的深刻洞察以一种不间断的方式在一天天增长，预示着决定性的客观事实与政治之间必定存在和谐。主观与客观的融合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新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的未来方向，而我们在这里的思考仅仅是一个寻求这项伟大事业最普遍原则的一个草图。因而要进入更详细的分析是不可能的。由于这个原因，更重要的是为这个理论基础创造透明度。在对自发性和意识（马克思主义意识，纯粹的阶级意识）的著名和正确的区分中，列宁说道：“意识只能传达给工人……，这就意味着，从经济斗争之外的领域……，一个创造所有这些知识的领域。”<sup>①</sup> 列宁提及了一个动力矩阵，是所有社会动力的相互联系，指出了在当时历史动力学下社会的总体性。列宁是在1903年的条件的影响下做出的这种论断，我们认为它不仅涉及当时历史环境下的社会现实时是正确的，而且在涉及到一些原则上更加普遍的东西时也是正确的。回到列宁的方法具有迫切性，它是马克思方法的延续。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只有回到马克思主义方法和理论上来才会出现。因为在当前情形下，正确的实践活动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正确分析当前形势的直接结果。

如今还可能简单地运用十年前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吗？我们已经指出了斯大林方法的理论核心：理论、方法和策略的层次关系的本末倒置。斯大林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的层次，使策略优先并且扭曲了整个马克思主义方法。[第160页]直到今天，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

---

<sup>①</sup> Lenin, *Was tun?* (*What Is To Be Done?*), S. 436.

伤害还没有被克服。如果想要修复对马克思主义的损害，那就将要求对每一个被斯大林的变形的一般方法所扭曲的事例进行专门的研究。由于这个原因，如果我们把自己限于最特定的类型，我们就可以用如下例子来说明这些主要问题：自列宁的《帝国主义》（1916）之后，就没有了对当今资本主义新特征的特殊性的科学研究，也没有对社会主义发展的明确方向的任何研究。我们对当今时代的认识还不够充分，因为我们的认识是一些过时的方法甚至是那些在刚产生时就是错误的方法的结果。在其他部分，我们已经极其简略地描述过斯大林的经济设想，并且讨论也表明了斯大林的策略的理论控制最终导致了对马克思方法的曲解，并且也影响了这个领域。另一个历史性曲解的例子是，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演进中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观点删除了。这种删除是为了证明实际上并不存在中国封建主义属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说法。为了使斯大林在20世纪20—30年代对中国关系上的策略性决策得到加强，这种曲解是必要的。“亚细亚生产模式”观点的消除，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推迟了十年，因为没有这种诠释范式，就不可能对真正的事实以及它们在这个世界上重要区域里的必然的相互关系实行马克思主义分析。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阶级斗争会加强，这一观点是历史曲解的另一个个案。实际上，这个例子可能是对策略优先的方法论如何导致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曲解的最震撼的说明。优先考虑阶级斗争加剧这一观点排除了对斯大林时期政治情形的真实性的实际的理论探讨。俄国被认为永久地处在内战状态下，政府的决议是出于纯粹的策略背景考虑，而那些不同意政府决议的人会被认为是整个国家公开的或者秘密的敌人。只从逻辑上驳斥这些敌人是远远不够的，他们还受到道义上的诽谤并被指责为社会的“害群之马”。保留斯大林主义体系很容易就会导致阶级斗争加剧这一主题

以及伴随它的秘密极权国家的复活。如果强大的官僚政治仍然存在并且感到自身受到了威胁，它可能就会以一种维持官僚政治权力的方式而复活，而不顾阶级斗争加剧这一命题的虚假性。苏共二十大反对阶级斗争加剧这一命题，但是如果政权的斯大林结构原封不动保存下来，那么它很有可能再次被利用。

这些扭曲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的事例可以无限地列举下去，但是本文不能从事这种进一步的列举。[第 161 页]因为它与社会主义民主问题有着极其深厚的联系，因为它站在一个与斯大林主义的策略控制相对立的立场上，从这点上来说我们可能会提及列宁的观点，那就是作为马克思关于民族主义问题的直接延续的国家自决的观点。1917 年，列宁要求每一个人都拥有无限的权利，去宣告自身的自由解放，并且极力反对任何使这种权利失效的企图。<sup>①</sup>甚至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他把否定国家自决权的行为称为对社会主义的背叛。没有任何官僚式的诡辩能够消除这一命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中的中心地位。列宁在晚年时期激烈地反对对它的破坏。<sup>②</sup>任何策略控制都无法忽视这样的事实，列宁和马克思一样，把国家自决权看作是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至关重要、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社会主义民主的实际发展预示着马克思主义方法的重建。这不仅仅是抽象的哲学陈述。相反，马克思主义重建是关系到共产主义运动生存的重大问题。澄清历史记录不是暂时的，也不是最终的，因为在目前情况下要具体把握所有的问题和事例是不可能的，因为当今很多问题还隐藏在未经核实的斯大林主义的过去。因为过去仍

---

① Lenin, *Die Aufgaben des Proletariats in unserer Revolution* (*The Tasks of the Proletar in Our Revolution*), in LW Bd. 24, S. 58.

② Lenin, *Zur Frage der Nationalitäten oder der "Autonomisierung"* (*The Nationalities Question or "Autonomization"*), in LW Bd. 36, S. 590 – 596.



然隐藏在黑暗之中，因而要正确把握当今的真实问题或者形成一种合理的当下的实践活动是不可能的。用一种单一的、包罗万象的装饰清理历史永远都是不可能的。几十年来的疏忽、困惑和扭曲，只有通过多年的研究工作以及对理论和历史主要事件的实际讨论才能被澄清。实际上，对历史的澄清也会给其自身带来扭曲。政党组织和自由评论家们都提出观点多元化的需求作为避免歪曲的一种方式，这是一个骗局。多元化也可以成为新实证主义思想控制的基础。必须保持马克思主义方法对多元化的优先权。当然，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结果不是能够武断地或随意地达到的。结果是通过实际调查、分析以及其他方式得来的，而且必须经受批判性讨论的检验。因为验证过程是如此漫长，一个真理被科学地验证之前总是要花很长时间。然而，如果共产主义运动想有一个坚实的基础，那就必须选择自我修正的方法。虽然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将会从自我修正和自我批评中萌发。这是一个必须选择和发起的过程，因为只有从过去的错误中解放出来，马克思主义才能重新获得切实可行的理论和政治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的复兴需要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第 162 页] 社会主义民主的苏醒会给这项运动提供精神推动力。但是，当我们涉及社会主义民主问题时，我们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完全新的、没有探索过的领域。列宁在提出新经济政策时所说的在这里也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没有引领我们走向未来的指导方针。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们都已经逝世，没有给我们留下社会主义民主性质的清晰大纲。尽管我们处于困惑之中，但是据我们对社会主义民主的了解，在当前形势下它的自发产生根本不可能。相反，需要无条件的艰苦的、有目的的努力去引起它的苏醒，把社会主义民主推向生成之路。每一个认真研究过我们关于列宁对政治意识定义的讨论的人，很容易就能

理解这一点。根据列宁的表述，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的运动只能从外部激发，因为它无法在人们意识中自发地产生。实际上，前面我们已经强调过，当今广大劳动人民极度的、普遍的冷漠，只有通过外在力量给其提供目标，才能把自己发展成为这种社会主义民主活动。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应该对这些极少的却是基本的事实非常清楚，建立这种目标取向的天生领袖和推动力必须是共产党。这里涉及到的问题是动员和接管私人的、主体间的、地下的运动，并且在实际生活中组织它们成为面向目标的和解放的行为。马克思主义的复苏需要自觉地致力于它所引发的重大的、一般的社会任务的正确性。《共产党宣言》已经明确了共产党人的特殊任务，就是他们“代表了全人类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始终代表着整个运动的利益”。<sup>①</sup> 半个世纪后，列宁继续执行和完善了马克思的思想。通过对阶级意识的准确定义，列宁认识到共产党具有对社会动态的总体性的敏锐的洞察力。共产党代表着争取无产阶级利益的伟大事业，如果需要的话，还代表着超越现实的斗争。列宁从来不怀疑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而今天共产党必须接触并且善于表达秘密文化的地下世界的种种欲望。

在斯大林时期的实践中，共产党也不得不屈服于策略上的官僚主义。对于共产党的问题，我们只能在这有限的空间里讨论我们所面临的任务和可能的一些要点。最根本的是，共产党那些成功的活动以及它们生命的延续都依赖于马克思主义的复兴。从使共产党重新恢复活力的角度来说，有一个因素异常重要：那就是党内民主。[第 163 页] 在东欧世界，存在着一些这样的观念，寻求资本主义的

---

① Marx and Engels, *Das 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the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S. 474.

多党制对现有的社会主义进行内部改革。在文章的开头部分我们对资本主义民主进行了批判。由于无法深入探讨这些复杂问题，我们只能说社会主义世界拥有有效的党内民主。我们完全明白，资本主义多党制民主制度下，没有一个政党真正实践了党内民主。

从共产党存在的问题的观点来说，目前紧迫的任务就是在国家和党之间实行真正的劳动分工。社会主义民主重大的新任务是把日常生活从那些来自于阶级社会的现有的和有效的残余当中净化出来。现有的社会主义仍然受到阶级社会残余的毒害，尤其是以信用消费的形式。经济的正常改善，而并不是针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将会促进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也凸显了信用消费的问题。不管是官僚控制还是靠新的宣传，都无法消除这种庸俗的消费主义。从这点上来说，社会主义民主必须与列宁对习惯的深刻定义联系起来。只有习惯了将那些低于人类尊严的行为方式诸如自我毁灭和反人类动机抛在一边，这种习惯的实践才会卓有成效。习惯必须创造出一个能够放弃对别人以及对自己的生命持有冒犯态度的社会存在（两者在本质上是不可分的）。一个在内容上具有社会性的社会存在的创造是习惯逐渐发展过程的最终结果。没有人类日常生活的外部世界的重建，这样一场人类的内部变革就不可能实现。不管物质生产有没有发展到一个高水平，除非人类的日常生活不但变成政治决策的场所而且成为社会存在的基础，否则都不可能出现共产主义社会。

过去的十多年已经谈论了很多关于资本主义幸存的问题。人们批判它、谴责它甚至宣告它会垮台。从社会学角度来说，这种对资本主义的谴责过于简单了。每一个社会都是个别的例外和未来的预测的合成物，是朝着积极的和消极的方向发展的许多相互矛盾和不对称的力量的混合。假定根据重要性等级的重大差异，每个人仅仅靠自己，通过自己的努力就能克服与人的类存在的异化。在大多数

情况下，这种进程是从对此一异化的某种特定形式进行批评或者自我批评开始的。然而，人类的真正解放是从人周围的客观社会条件的变化开始的。[第 164 页] 从此一起源于社会的社会存在的观点来说，当那些能够把过去的观念与现在的有意识的行为分开来的新的生活条件发展的时候，那么就可以认为人的典型态度被实际上超越了（同类相食和互相仇杀就是社会如何适应人类行为的例子）。在伟大的社会变革时期，个人试图变革意识形态和伦理背景，自然会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不考虑他们的动机，就上述意义而言，这些类型的个人行为永远不可能达到真正的社会普遍性。要改变人首先要改变社会。这里我们涉及到了整个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基本变革，不仅仅是在单一、特定的生活条件下对特定的、具体的个人的恶习的超越。作者并不想低估个人变革的价值。相反，他深信，在人类历史过去的纪元里的个人和社会的反抗创造了社会超越的可能性。如果在过去个人的和集体的反抗不存在，如果没有与当时时代的残暴以及否定人类尊严的行为作斗争，那么历史就毫无希望了。尽管这些斗争是在错误的意识下进行的，尽管这些斗争可能是纯粹乌托邦式的尝试，但是他们帮助创造了历史的可能性和未来。

作者也不认为单凭他们直接的、社会实践的结果来判断他们的这些尝试超越对人类的侮辱是可能的。人类发展的先前的历史——马克思根据深刻的逻辑称之为人类的史前史——仅仅为那些对社会变革做出很大贡献的主观态度的形成提供了一些分散的、相互矛盾的论断。必须审慎地估量这些尝试的价值，并且人们必须从这些考察中知道人性的生成是他们自身活动的结果，尤其是他们社会活动的结果。然而，超越不可能在虚无中发生，必须与既存的真实可能性相一致，社会再生产的客观过程往往会给这种变革提供条件和限制。社会主义民主被号召去超越这一最后的、高度发展的反人类的

形式（其他人是自我发展的实践的限制、单纯的对象，是潜在的对手和敌人）。社会主义民主被号召去完成这个任务，因为只有它才能为这个决定性的变革创造社会基础。

伟大而紧迫的苏维埃革命运动充满着把这些复杂问题列入历史日程的本能倾向。苏维埃运动开展的真实条件与俄国既存的具体的、普遍的问题是一致的。对苏维埃运动的记忆，以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保存在广大人民的脑海中。〔第 165 页〕由于受到唯心主义的乌托邦希望的错误限制，广大民众认为苏维埃运动的简单复兴能够为人类开启崭新的领域。他们认为苏维埃运动的内在趋势是朝向革新和复兴的。但是在后斯大林主义的世界里，苏维埃运动并不是社会主义革新的唯一动力。当前的紧迫任务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发起一场经济的根本性重建。在这种背景下，苏维埃看起来是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高度官僚化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证主义控制的唯一正确的替代者。在新纪元刚开始的时候，苏维埃就成就了巨大的历史潜力。从这些事实我们并不能下定论说苏维埃可以重新获得先前那样惊人的自发性和火山般的爆发。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民主化的新形式必将从社会历史中出现。尽管还没有发生，但是当今世界经济呈现出日益增长的危机即将来临的迹象，而对这场危机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不幸的是，仍然不充分——提出了民主化进程的复兴。几十年来，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呈现出了不间断的连续性的映像。但是他们充满了普遍性的矛盾、分歧和不可解决的冲突，并且这些正被推向表面。不过，通过妥协，通过常规的控制性协议的延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世界还将继续以这种形式存在下去。资产阶级政权正尝试选举策略，因为他们急切想要收买这些混乱的、自发的抗议运动，并且一举平息它。

一场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危机已经显而易见。这些粗略观察

的主要任务不可能是促成一个详细的政治经济革新计划。从危机走出来后，马克思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纪元。在复兴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新的根本任务就是发现与资本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以及着手社会主义内部革新的新方法。我们不能在这里讨论新与旧、过去的已经死亡的马克思主义和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未来的新时代之间的关系。他们可能是一脉相承的，也可能是中断的：过去的马克思主义的有生命力的遗产应该延续下去，而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应该中断。提到过去和将来的关系，我们能够而且必须指出，社会主义生产的重建并不单纯是一种经济上的努力，还应该把它看作是为人的变革奠定了基础，因为它适应了有着高贵尊严的人类日常生活以及人类尊严所渗透的生活的各个方面。把经济发展的这些原则实际运用到人类的变革中去，的确是一件异常复杂的事情。从目前阶段来说，这种变革仅仅是一场为了从数量上和质量上改进生产和分配机制的经济变革。[第 166 页] 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尽管它因为与消费增长的密切关系成为了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但这一问题仅仅靠引进资本主义“模式”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那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通过本质上自发的方式能够完成的经济任务必须在社会主义中得到拓展，在生产过程，从其计划阶段到其实际运用阶段，将更多维的、多样化的形式囊括到民主化当中来。首先，这必然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

然而，即便在这个阶段，比如说，工会问题立刻就显现出来。这就导致列宁主义观点的当代复兴，并且导致对曾存在于 1921 年关于工会问题讨论中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急切排斥。要是没有列宁主义立场的复兴，那么广大群众的真正活跃，以及对他们自身的冷漠的胜利都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个经济改革过程毫无疑问会持续很长时间，并且会酝酿新经济形式和新的经济组织模式的诞生。

我们已经指出，在这个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会出现对社会主义社会主体态度的觉醒和形成所必须的开拓性的尝试。如果不想放纵机械的劳动分工，毫无疑问地国家的民主机构和群众团体（工会）将会被要求在社会重建的第一阶段起主导作用。第二阶段，经过民主革新的共产党在党内执行了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在继续推进工会和国家民主化建设期间，共产党必须担任决定性的、至关重要的角色，作为重建时期政策的永久的批判家。显然，我们不能忽视广大群众自发的、直接的主动性自身给予改革过程的关键的、附加的动力。但是我们无法事先预料究竟这个重新出现和组织的苏维埃运动会有多重重要并且充当什么样的角色。事实上，我们的推测只能最大程度地对未来各种可能性提出思辨性的要点。

从表面的观点来看，世界是不变的，但这只是假象。当今所有历史趋势的总体表明，世界正以一种不可阻挡的动力向前推进。从特定的历史框架来看，现实被社会进程固有、连续地演变支配着。资本主义控制体系出现了危机，而非殖民地化进程在人类面前开启了新的前景。这都是当下正在进行的变革的重要征兆。然而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走向马克思主义复兴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内部趋势。[第 167 页] 在这种趋势下，它在社会革命性变革中充当的真实的、理论和实践的领导角色是与人类的愿望相吻合的。任何社会的新生过程都必然与动荡和不确定联系在一起，共产党会被这个挑战吓跑并且致力于用一种最近几十年的看似静态的、目光短浅的连续性来保护一切可能保留的东西，这再正常不过了。从目前历史性危机的角度来看，这种保留的努力，在最终的分析里，似乎是徒劳的。考虑到社会变革时期的大体的社会历史基础，马克思写道：“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

的时候才会产生。”任何保留斯大林主义秩序的观点都像引人入胜的幻想一样没有希望，用现在的行话来说就是，一个正在发生的、激进的革命性的颠覆。今天，相当一部分年轻人和左派知识分子已经感受到了一股朝向这种浪漫革命主义的强大牵引力。至于这场世界性的危机，人们在世界不同地方用不同的模式应付危机——我们正在用一种对具体观点和目标以及促进其内在发展的具体方法的长期的、实际上是一个内外都充满争执的自我理解过程来处理。

社会主义与过去决裂的时机已经成熟。对社会主义与其斯大林主义遗产的根本决裂的任何焦虑事实上都是不对的。列宁只有在巨大的胁迫之下才会很偶然地需要“喘息时间”。只有在苏俄面临灭亡的持续威胁时，他才那样做过。在不久以前，那些社会主义的重大政治行动（对希特勒的胜利、核均势的成功）到目前为止为“喘息时间”建立了坚实的平台，而“喘息时间”为国内重建做出了重大贡献。显然，帝国主义者将仍然是帝国主义者。另一方面，决不能忽视帝国主义世界已经发生的变化。帝国主义无休止地、无限制地追求权力的社会背景，与1914年或者二战后的1945年的情况是不一样的。现在正是适宜社会主义内部建设的时候，因为帝国主义世界对社会主义的威胁比列宁时期更小了。我们必须记住，我们生活在一个有利于从事长期的内部改革过程的时期。列宁时期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危险要比现在大得多。为了表达一个令人极其不愉快的事实，我们必须同时承认，广大群众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知识分子的自发的同情心在1917年的时候要比今天强大得多。很容易就能找到原因，1917年以及接下来的几年，帝国主义世界的许多人感到——从阿纳托尔·法朗士到一般的男女工人——苏联发生的一切都归因于他们自身的类解放，[第168页]俄国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与自己有关的事情，与他们自身的人类自我救赎有关的事情所作的斗争。



斯大林的在理论和实践的所有问题上都实行绝对策略控制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说，就是切断俄国发生的那些事件与西方良知的联系的一把利刃。当然，30年代莫斯科审判事件在俄国共产党与西方良知的疏远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然而，如果不是因为俄国共产党与西方意识形态中间存在着严格的分界线的话，个人可耻行为的影响完全可以克服。苏联发展模式与西方世界存在分歧，因为资本主义的思想把人们带入一个表面上不可抑制的欲望之中，追求当下的满足和个人享乐主义。在资本主义下，经济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尤其是技术领域的成就带来的重大影响，以及这些成功带来的自我放纵，都使得民众不可能回到在1917年初感觉到的共同体。然而，这种美好感觉重现的可能性包含在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人类生成的扣人心弦的戏剧才潜在地结束了。拥有一个麻木不仁的宣传机构的所有力量，在战争结束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试图发明一个和“美国生活方式”的成语具有同样广告魅力的形象或者口号。然而，真实的人类财富的匮乏也能导致一个最广泛的、组织良好的宣传机构的失败。对人的类本质的承诺和尊重不可能通过经济投资来获得，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参与到人类生成的这出好戏中去。资本主义信念反对这种精神追求。然而，如果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被召唤向这个目标的话，那么1917年的情形重现依然是有可能的。

自从苏共二十大以来，整个世界的大致情形就是这样。很明显，有必要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帝国主义就是帝国主义，既然革命没有把它推翻，它的基础也没有被完全摧毁，那么它该是什么样子就还是什么样子。很明显，只要还能喘息，资本主义肯定会努力寻求社会主义的瓦解。但是核均势的实现已经使第三次世界大战，或者说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直接攻击变得非常危险，并且是潜在的自我

毁灭。由于这个原因，当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现实机会逐渐减少时，国际意识形态的斗争就赢得了更大的重要性。因此，就在苏共二十大刚刚结束之后，本文作者把“共存”的特征描述如下：作为阶级斗争的一种新形式，是核均势的产物。在这种阶级斗争的新形式下，用列宁的话说，“谁？反对谁？”的原则得到证实。有那么一些人希望保留斯大林制度。[第 169 页] 有那么一些人追求暂时的、形式上的修补，延缓改革的进程，但是这些力量并不占优势。然而，这种希望仍然存在，而帝国主义控制体系中显露出来的危机迹象给它们提供了动力。它们期望能够等到资本主义的瓦解，觉得这种巨变将会维持他们的保守主义。另一方面，当今全世界范围内还存在着进步和希望的新动力。尽管这种力量很弱小，也很迷茫，但是他们追求与马克思主义的再接近。这是一种朝向复苏马克思主义的动力。客观来说，这种运动只会是社会主义的同盟。列宁主义的传统体现了联合起来对抗共同的敌人，以及通过准确的逻辑区分和在指导原则下的批评去避免对马克思主义曲解的可能性。斯大林主义是永久革命的意识，它把一切异议标榜为人民的敌人。任何不同意官方和党的策略决定的人都被认为是危险分子，是帝国主义代理人的直接工具。政府机构花很大力气有组织地摧毁他们。这就是大清洗运动使用的手段。而今天，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斗争——没有具体组织起来——官方意识形态斗争的基础在社会主义内部同时也在社会主义外部进行着。

保留斯大林主义是在社会主义领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最大障碍。同时也是国际合作和实现团结所有正在努力复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方法的人们的重大障碍。马克思主义对当今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都会有所启发，并且能够帮助每一个寻求赶上未来的人，正如它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时代卓有成效地做到的一样。此外，今天对

向社会主义民主化的转变，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和向共产主义的转变，以及对结束人类的史前史的理解，与马克思生活年代的理解也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蓝图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绘制出来了，并且指出了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革命各自不同的道路。不断向前发展的阶级斗争是这些革命的基础，而这些革命又是未来各种社会可能性的温床：“资产阶级革命，例如十八世纪的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的；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象是被五色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着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还未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于长期的酒醉状态。相反地，象 19 世纪的革命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则经常自己批评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们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地方；它们把敌人打倒在地上，[第 170 页] 好象是只是为了要敌人从土地里吸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们前面挺立起来一样；它们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sup>①</sup>

今天，罗陀斯（Rhodus）依旧存在于遥远的未来。然而，一切迹象都表明，只有马克思指出的这条道路才能把我们领向未来。至于未来能够达到的程度，则取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洞察力和勇气。

---

<sup>①</sup> Marx , *Der achtzehnte Brumaire des Louis Bonaparte (the 18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 S. 118.

## 索引 Index

- Abundance 丰富、富足、大量, 22, 27, 35
- Administrative-managerial paradigm 行政的一管理的模式, 11, 12, 32
- Alienation 疏远, 84, 132, 163
- Anarchism 无政府主义, 8, 15
- Anarchy 无政府状态, 7, 16, 17, 19, 24, 52, 53, 54
- Anthropology 人类学, 13, 14, 25, 41, 42, 44, 54
-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 67
-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亚细亚生产方式, 1, 60
- Atom bomb 原子弹, 134
- Authority 专制, 15; party authoritarianism 政党专制主义, 12; social authoritarianism 社会权威, 23
- Babeuf, Gracchus 格拉古·巴贝夫, 44
- Bahro, Rudolf, The Alternative in Eastern Europe 鲁道夫·巴罗, 《在东欧的选择》, 27
- Base-superstructure 基础—上层建筑, 35, 71—78, 81, 98, 117,

- 139, 141, 156—157; base 基础, 98, 156—157; superstructure 上层建筑, 81, 98, 124
- Behaviorism 行为主义, 34, 35, 53
- Bentham, Jeremy 杰里米·边沁, 34
- Bernstein, Edward 爱德华·伯恩斯坦, 109, 110
- Bolshevism 布尔什维主义, 24, 29, 108, 110
- Bolshevist historiography 布尔什维主义历史学, 29, 31, 32, 33, 34
- Bolshevist revolution (1917) 布尔什维主义革命 (1917), 29
- Bolshevist theory of politics 布尔什维克政治论, 24, 29, 32; classical Bolshevism 经典的布尔什维主义, 31, 32, 33, 34, 35; Leninist Bolshevism 列宁的布尔什维主义, 33, 34, 36, 44, 46; Stalinist Bolshevism 斯大林的布尔什维主义, 33, 34
- Bourgeois; bourgeois anthropology 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人类学, 42; bourgeois citizen-ideal 资产阶级公民理想, 45, 132, 133; bourgeois class 资产阶级, 15; bourgeois definition of freedom 资产阶级的自由的定义, 48; bourgeois democracy 资产阶级民主, 18, 19, 39, 45, 52, 53, 71—89, 93, 102, 133, 144, 163; bourgeois humanism 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26, 40; bourgeois representative, institutions 资产阶级代议制, 机构, 78; bourgeois materialism 资产阶级物质主义, 86; bourgeois revolution 资产阶级革命, 144; bourgeois society 资产阶级社会, 71—89, 102, 103, 133, 144, 153, 154, 155, 165, 168; bourgeois state 资产阶级国家, 15; smashing of bourgeois state 资产阶级国家的毁灭, 33; bourgeois theory of the state 资产阶级国家理论, 42; bourgeois world 资产阶级世界, 40
- Bukharin, Nicolai 尼古拉·布哈林, 108, 111, 114, 117, 118, 119
- Bureaucracy 官僚化, 23, 48, 100, 101, 103, 128, 132, 133,

144; bureaucratic totalitarianism 官僚极权主义, 6, 33, 117, 118, 128, 132, 148, 149, 151; party bureaucracy 政党官僚化, 23

Capitalism 资本主义, 9—13, 14, 40, 47, 48, 71—75, 81—89, 94—95, 138—144, 149, 151—157; capitalism and war 资本主义和战争, 134—135; capitalist anti-communism 资产阶级反共产主义, 153;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 转变到资本主义, 138, 139, 155—157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中情局, 87, 88, 89

Citizen 市民, 72, 74, 86, 132, 133, 144

Class 阶级, 8, 13, 14, 15, 16, 20, 21, 29, 32; bourgeois class 资产阶级, 15; classlessness 无阶级, 9, 19, 32, 52, 53, 54; class politics 阶级政治, 20; class power 阶级权利, 24, 52; class property 阶级财产, 17; class reductionism 阶级还原论, 8, 17; proletarian class 无产阶级, 15

Cold War 冷战, 85, 88—89, 104

Commodity-exchange 商品交换, 120, 121, 123

Communism 共产主义, 8—9, 10, 15, 16, 18, 19, 21, 31, 32, 33, 103, 104, 114; Communism (continued) 共产主义(持续), 140, 143; communism-as-heuristic 作为启发式的共产主义, 31; communism-as-immanent 作为内在式的共产主义, 31; communist society 共产主义社会, 103; communism revolution 共产主义革命, 16

Communist party 共产党, 19, 23, 34, 49, 50, 51, 52, 113, 162; and communist movement 共产主义运动, 161, 162; as conspiratorial party 党的阴谋, 51; and “democratic centralism” 民主集中制, 51; democratization of party 政党民主化, 166; internal democratiza-

- tion 内部民主化, 51, 163, 166; separation of state and party 党和国家的分离, 163; totalitarianism 极权主义, 133, 149, 151; twentieth Party Congress 党的二十大大, 29, 93, 114, 146—147, 160, 168; and world revolution 世界革命, 112—113, 136
- Consciousness 意识, 97, 99, 100, 103
- Consumerism 消费主义, 143, 144, 163
- Consumption 消费, 11, 12
- Cromwell, Oliver 奥利弗·克伦威尔, 78, 81
- Czechoslovakia Revolution 捷克革命, 4—5, 31
- Democracy 民主,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8, 29, 30, 32, 36, 37, 38, 39, 45, 46, 52, 53, 55, 56, 67—89, 93, 102, 104, 113, 114; bourgeois democracy 资产阶级民主, 40, 52; democracy-as-bourgeois 民主作为资产阶级, 52; democracy-as-plebeianism 民主作为无产阶级, 81; democratic populism 民主的民粹主义, 79; direct democracy 直接民主, 18, 19, 46; Greek democracy 希腊民主, 37; plebeian democracy 平民民主, 27, 28; proletarian democracy 无产阶级民主, 101, 124;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代议制民主, 18; socialist democracy 社会主义民主, 102, 125—127; Soviet democracy 苏维埃民主, 125—128
- Democratization 民主化, 26, 27, 32, 33, 34, 36, 46, 68, 81—89, 93, 104, 108, 124, 128, 129, 149, 150, 151, 162, 165, 166, 169
- Determinism 决定论, 67, 68, 97, 98, 99, 103, 117, 125, 132, 140—144
- Dialectics 辩证法, 129—131
-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辩证唯物主义, 38, 117—123, 127—132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无产阶级专政, 25, 33, 146

Disunity between Lenin and Stalin 列宁和斯大林之间的分歧, 169

Disunity between Marx and Stalin 马克思和斯大林之间的分歧, 169

Division of labor 劳动分工, 22, 142, 143, 144

Dubcek, Alexander 亚历山大·杜布切克, 4, 5, 31

Eastern Europe: contemporary 东欧: 现代, 149—152, 163

Economic formations 经济形态, 72, 73, 77, 122, 125, 152, 153, 154, 155

Economics 经济学, 44, 46, 98, 99, 113—114, 144, 147, 149, 156—157; economic reductionism Economism 经济还原论经济主义, 117, 127—132

Egalitarian paradigm 平等模式, 22, 35, 113

Egalitarianism 平等主义, 10, 11, 12, 23, 24, 44; administrative-managerial egalitarianism 行政—管理平均主义, 18; democratic egalitarianism 民主平均主义, 18; economic egalitarianism 经济平均主义, 10—11, 21, 22, 24; functional egalitarianism 功能平均主义, 12, 13; income egalitarianism 收入平均主义, 12; job egalitarianism 工作平均主义, 18; salary egalitarianism 薪水平均主义, 21, 22, 24; social egalitarianism 社会平均主义, 10, 11; talent egalitarianism 才能平均主义, 10, 12; time egalitarianism 时间平均主义, 25

Egoism 利己主义, 74—78, 86, 102

Emancipation 解放, 43; of human labor 人类劳动, 143; of human praxis 人类实践, 143

Engels,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73, 99, 110; *Origins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



- 7—8; Ludwig Feuerbach Philosophy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哲学, 40
- English Revolution 英国革命, 78
- Equality 平等, 73, 78—79, 86, 87
- Equalization; equalization of consumption 平等: 消费平等, 10—11; equalization of distribution 分配平等, 10—11; equalization of function 功能平等, 12, 20; equalization of jobs 工作平等, 12; equalization of talent 才能平等, 11
- European social democracy 欧洲社会民主, 109, 110, 117
- Everyday life 日常生活, 28, 45, 46, 100, 101, 124, 125—127, 132, 143, 144, 146, 148, 163, 165
- Fascism 法西斯主义, 40, 131
- Feher, Ferenc 费伦茨·费赫尔, 5; The Frozen Revolution 冰封革命, 44
- Feudalism 封建主义, 42—43, 48, 95, 138, 139, 155, 156
- Feuerbach, Ludwig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 41, 42, 83
- Freedom 自由, 48, 73, 78—79, 86, 87, 97
- French Revolution 法国革命, 73, 74, 78, 81, 87
- German Humanism 德国人道主义, 40, 45, 46, 47
- German Enlightenment 德国启蒙, 26—27, 45, 46
- Gorbachev, Mikhail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1, 5
- Greek ideal 希腊理想, 35, 39, 43, 46, 71—77; Athens 雅典, 46, 72
- Greek democracy 希腊民主, 37, 71—77
- Greek humanism 希腊人文主义, 39
- Habituation 习惯性, 23, 24, 26, 53, 102, 103, 104—105, 145, 163, 165

Hegel, G. W. F. 黑格尔, 26, 37, 40, 129, 130; *Phenomenology of Mind* 心理现象学, 47; *Logic* 逻辑, 129

Heller, Agnes 艾格尼丝·海勒, 5

Historical materialism 历史唯物主义, 33

Historicism 历史主义, 33, 36, 37, 47, 48, 53, 54

Hitler, Adolf 阿道夫·希特勒, 40, 85, 95, 134, 167

Homogenization 同化, 21, 22, 28; social homogenization 社会同化, 22, 28, 32, 44

Human activity 人类活动, 25, 36, 37, 42, 45

Hungarian Revolution 匈牙利革命, 4—6, 30, 31

Ideology 思想, 123, 131—132; de-ideologization 去思想化, 86—87; Stalinist ideology 斯大林思想, 137—138

Imperialism 帝国主义, 134, 136, 167—168

Individual liberty 个人自由, 39

Individualism 个人主义, 43, 73—78, 83, 86

Industrialization 工业化, 108

Interest 利益, 9; self-interest 自我利益, 10, 11, 34, 35, 73—78, 86

Jacobinism 雅各宾派, 27, 44, 152

Kautsky, Karl 卡尔·考茨基, 9, 16, 110

Khrushchev, Nikita 尼基塔·赫鲁晓夫, 114, 146

Kingdom of Freedom 自由王国, 43, 97, 98, 99, 104, 123, 124, 140, 154—158

Kingdom of Necessity 必然王国, 98, 99, 124, 140

Kingdom of Reason 理性王国, 73

Kolakowski, Lesek: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莱谢克·科拉科夫斯

- 基：《马克思主义的主流》，26
- Labor 劳动，25，38，39，42；Human labor 人类劳动，38，39，42，141，142
- Labor process 劳动过程，140
- Labor time 劳动时间，120，124；Mental labor 脑力劳动，22，23；Necessary labor 必要劳动，43，46，121—125，140；Physical labor 体力劳动，22，23；Social labor 社会劳动，26，45，140；Surplus labor 剩余劳动，43，123—125；Wage-labor 带薪劳动，140
- Liberalism 自由主义，79；Definition of socialism 社会主义的定义，100，145；Democracy 民主，133
- Leninist Bolshevism 列宁的布尔什维主义，5，33，34，36，49，50，52
- Leninist party 列宁主义政党，49，51；Methodology 方法论，140—105，106，108，123，129，145；New economic policy 新经济政策，25，27，36，49，50，100，111，123，127，133，145，149，162；State and Revolution 《国家与革命》，4，7，13，14，15—25，26，28，29，31，34，52，53，54；Strategy-tactics 战略—策略，108；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Russia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7；Theory of politics 政治理论，19
- Lenin, Nicolai 尼古拉·列宁，24，53；and theory of the state 国家理论，53；two tactics of social democracy in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社会民主策略，29；unity of Lenin and Marx 列宁和马克思的团结，128—130，136；What Is To Be Done? 《怎么办?》，128
- Lukács, Georg 乔治·卢卡奇，25—55，67—170；Anti-Stalinism 反斯大林主义，26，27，33，48，51；Blum Theses 布鲁姆提纲，27，

29, 30, 50; Hungarian Communist Party 匈牙利共产党, 30; Lenin 列宁, 25—26, 33, 50; Methodology 方法论, 104—105; New democracy 新型民主, 50; Record of a life 《一生札记》, 50; Redefinition of socialism 社会主义再定义, 47—48, 139; Renaissance of Marxism 马克思主义复兴, 28—29; The Destruction of Reason 《理性的毁灭》, 40; The Moral Miss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共产党的道德使命, 104;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民主化的进程》, 3—5, 15, 24, 25—55; Theory of politics 政治理论, 28—29, 32—33; Theory of the state 国家理论, 32—33

Market forces 市场动力, 149

Marx, Karl 卡尔·马克思, 6, 11, 13, 14, 17, 20; Communist Manifesto 《共产党宣言》, 103;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 《哥达纲领批判》, 122; Das Kapital 《资本论》, 43, 120; definition of socialism 社会主义的定义, 141—142; depoliticization of a theory of politics 政治理论的去政治化, 20, 21; division of labor 劳动分工, 142

Marxism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 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 7

Marxist critique 马克思主义批判, 104

Methodology 方法论, 104—105, 106, 113; proletarian revolution 无产阶级革命, 94—95; renaissance of Marxism 马克思主义复兴, 28, 36, 158—161, 165, 166, 169; depoliticization of a theory of politics 政治理论的去政治化, 41, 44, 54; role of the economic base 经济基础的作用, 117, 118; tactics of revolution 革命的策略, 20; theory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历史发展理论, 137—140, 143; theory of politics 政治理论, 6—7, 9, 13, 15, 20, 21, 24—25, 36, 39, 40, 41, 42, 44, 54; theory of the state 国家理论, 6—

- 7, 25, 28, 29, 36, 39, 40—42, 44, 54; Theses on Feuerbach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38, 41, 42, 83; unity of Marx and  
Lenin 马克思和列宁的团结, 128—130, 136
- Means of production 生产方式, 77, 123; nationalization of 国际化,  
122; socialization of 社会主义化, 133, 147, 154, 156, 157
- Mechanical materialism 机械唯物主义, 97, 117, 118, 127—132
- Methodology 方法论, 67, 68, 104, 105, 106, 127—132
- Militarism 军国主义, 134—136
- Multi-party system 多党制, 51, 52, 163
- Natural Rights 自然权利, 39, 42, 74, 154
- Need 需求, 9, 10, 11, 34—35, 41—42, 143, 144
- Objectivism 客观主义, 38, 117, 127—132, 157—158
- Opportunism 机会主义, 15
- Original accumulation 原始积累, 147—148
- Paris Commune 巴黎公社, 17—18, 20
- Parliamentarianism 议会制, 16—19, 27, 52, 77—78, 81, 133
- Peace 和平, 134
- Peasants 农民, 50, 95—96
- Philosophy 哲学, 36
- Philosophy of identity 哲学的身份, 26
- Plebeianism 平民主义, 78—79; plebeian-democracy 平民民主,  
79—81
- Polis 城邦, 34—35, 39—40, 45—46, 71—77, 102
- Politics 政治学, 7—8, 9, 13, 14, 17, 24, 28, 29, 41, 42, 44,  
46, 52, 53, 54, 125—127, 149, 152—153; “end of politics”  
“政治的终结”, 7—8, 24, 34, 35, 52—54; political authority 政

治权威, 14; political man 政治人, 132; politicslessness 无政治, 19, 24, 34, 35, 54; repoliticization politics 去政治化政治学, 41

Positivism 实证, 117—118, 127—132

Practice-critical activity 实践批判活动, 38—39, 46

Praxis 现实, 4, 25, 38, 39, 42, 43, 44, 45, 68, 72, 97, 98, 102, 108, 109, 110, 124, 125, 133, 143, 145, 146; mode of praxis 现实模式, 152, 153

Private life 私人生活, 72, 74, 77

Process 过程, 36, 68, 84

Productivity paradigm 生产力模式, 9—10, 11, 22, 27

Proletariat 无产阶级, 8; dictatorship of proletariat 无产阶级专政, 18—19; proletarian class 无产阶级, 15; proletarian democracy 无产阶级民主, 18, 20, 25; proletarian humanism 无产阶级人道主义, 26, 46 ; proletarian revolution 无产阶级革命, 8, 20, 31, 125; proletarian state 无产阶级国家, 15, 17, 18, 19, 20, 33

Property 财产, 8, 11, 15, 17; class property 阶级财产, 17; nationalization of 国际化, 37, 44, 50, 122, 133, 134; personal property 个人财产, 8 ; property reductionism 财产还原, 17; propertylessness 无财产, 9; reprivatization of 再私有化, 50; socialization of 公有化, 37, 44, 133

Public and private man 公众与私人, 39, 40, 41, 45—47, 86, 132, 152, 153; citizen 市民, 152; political activist 政治活动家, 152—153; private man 私人, 153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快速工业化, 147

Reproduction 再生产, 123—124; self-reproduction 自我复制, 124; social reproduction 社会再生产, 142

- Revolution 革命, 151, 157; bourgeois revolution 资产阶级革命, 144; communist revolution 共产主义革命, 125; economic revolution 经济革命, 139; proletarian revolution 无产阶级革命, 125; revolution and transcendence 革命和超越, 132; revolutionary consciousness 革命的意识, 126; revolutionary spontaneity 革命的自发性, 126—127
- Russian revolution 俄国革命, 94—95, 125; socialist revolution 社会主义革命, 144
- Robespierre, Maximilien 马克西米利·罗伯斯庇尔, 39, 81
- Rome 罗马, 72
- Rousseau, Jean-Jacques 让—雅克·卢梭, 39, 67, 81
- Russia 俄国, 95, 96, 147
- Russia Revolution 俄国革命, 94—95, 125; Brest Litovsk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 125; Civil War 内战, 96, 101, 126—127, 132, 144; Great Purges Trials 大肃反试验, 130, 146, 168; non-classical nature of 无阶级本性, 98—99, 106, 112—113, 117; October 1917 1917年十月革命, 96
- Scarcity 讽刺, 10, 27
- Second International 第二国际, 6—7, 9—14, 17, 21—22, 24—25, 27, 34, 35, 44
- Self-activity 自我活动, 100, 103, 124—125, 144—146, 154—158
- Separation of party and state 党和国家的分离, 34, 49—50
- Social: socialized life 社会: 社会生活, 84; socialized man 社会人, 84
- Social atomism 社会原子论, 84
- Social being 社会人, 143, 163
- Social formations 社会形态, 72—73, 77, 81, 97, 99, 104, 118,

125, 139, 140, 143, 152, 153, 154, 157

Social ontology 社会本体论, 26, 31, 36, 37, 38, 40, 41—44, 54, 77—78, 98—99, 102, 124, 125, 143, 154—155, 163

Social phenomenology 社会现象学, 36—37, 41—44, 54, 123, 124, 125, 143, 154, 155

Social science 社会科学, 36

Social totality 社会整体, 83, 97, 118

Socialism 社会主义, 26, 27, 32, 34, 35, 37, 39, 40, 43, 45, 46, 47, 48, 54, 100, 114, 125, 132, 139, 140, 141, 143, 144, 153, 154, 157, 158, 167, 168

Crisis of socialism 社会主义危机, 159—162

Economic preconditions for 经济前提条件, 128, 133, 138

Socialism and war 社会主义和战争, 134—135

Socialist culture 社会主义文化, 139

Socialist definition of freedom 社会主义自由的定义, 49

Socialist democracy 社会主义民主, 36, 54, 93

Socialist democratization 社会主义民主化, 169

Socialist economics 社会主义经济学, 166

Socialist humanity 人类社会, 155—158

Socialist man 社会人, 132, 153—154

Socialist revolution 社会主义革命, 100—101, 144

Socialist society 社会主义社会, 104, 132, 154, 158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社会主义转变, 99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在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 112—113

Society 社会, 13, 14, 41—42, 84; civil society 社会危机, 4, 13—14, 17, 28—29, 41—42, 49, 73; depoliticize society 非政治化社



- 会, 13; repoliticize society 再政治化社会, 14, 28
- Soviet Union 苏联, 133—134, 164
- Soviets 苏维埃, 6, 19—20, 25, 28, 33—34, 36, 45—46, 49, 52, 54, 96, 104, 113, 125—127, 132, 133, 144, 146, 149, 151, 152, 158, 164, 165, 166, 168
- Soviet democracy 苏维埃民主, 125—128
- Species being 物种, 4, 13, 14, 28, 41, 42, 73, 83—84, 103, 143; human species 人类物种, 141
- Stalin, Joseph 约瑟夫·斯大林, 23, 26, 93, 107, 109, 110—123, 128—136, 137—138, 146—152, 154, 157, 159, 167—169; Anti-Stalinism 反斯大林主义, 26—27, 33; deformation of Lenin 列宁的扭曲, 126, 129—133, 136; deformation of Marx 马克思的扭曲, 120—121, 128—132, 159—161, 169; deformation of socialism 社会主义的扭曲, 121; Hitler-Stalin pact 希特勒—斯大林合约, 131
- Stalinism 斯大林主义, 4—5, 26, 40, 48, 104—105, 128—132, 144
- State 国家, 7—9, 13—15, 19, 21, 24, 28, 34, 41, 42, 52—54, 73, 77; class view of state 阶级的国家观点, 7—8; Commune-state 公社状态, 18, 20, 33; depoliticize, state 去政治化, 国家, 13—14, 17
- Separation of state and party 党和国家的分离, 103
- Statelessness 无国家, 7—8, 19, 34, 35, 52, 53, 54; withering away of the state 国家的枯萎, 7—8, 19, 22, 25, 101, 104
- Strategy-tactics 策略—战术, 108—115, 117—118, 128—132, 152, 162
- Stratification; social stratification 分层: 社会分层, 12, 32; talent

- stratification 才能分层, 12, 23
- Subject-object unity 主客观的统一, 37—39, 41, 99, 117—118, 124 ;object 客观, 38—39; objective 客观的, 124—125; subject 主观, 38—39; subjective intervention 主观干预, 124—125, 132, 141—146, 154—158
- Sziklai, Laszlo 拉兹洛·西克洛伊, 4
- Talent, stratification of talent 才能, 才能的分成, 11—12
- Technological intelligentsia 科技知识分子, 148
- Teleological action 目的论行为, 4, 38—39, 42, 100, 102, 103, 124—125
- Teleology 目的论, 84, 94, 98—99, 141—146, 154—158
- Theory-practice 理论实践, 109
- Theory of value 价值论, 25, 47—48, 81, 119—125; surplus value 剩余价值, 121—123; under capitalism 资本主义背景下, 47; under socialism 社会主义背景下, 47
- Totalitarianism 极权主义, 67; left totalitarianism 左翼, 40, 44, 146, 148—151; right totalitarianism 右翼, 40
- Trade Unions 贸易联盟, 49—50, 101, 104, 166
- Transcendence of division of labor 超越劳动分工, 143; of subjugated labor 劳动的征服, 143; transcendence of bourgeois order 资产阶级秩序的超越, 168
- Transition 转变, 过渡, 145, 155—157; to capitalism 资本主义, 138—139; to socialism 社会主义, 138—139
- Trotsky, Leon 莱昂·托洛茨基, 101, 104, 108, 110—111, 113—114
- Underdevelopment 欠发展, 94, 98, 99, 104, 112, 133, 138,

147, 154

Uneven development 不平衡发展, 108, 112

United States 美国, 87—88, 134, 136

Unity of Lukács, Marx and Lenin 卢卡奇、马克思和列宁的团结, 169

Unity of Marx and Lenin 马克思和列宁的团结, 169

Utilitarianism 功利主义, 34—35

Valorization 限价, 25, 44, 54, 140, 143

Vulgar sociology 庸俗社会学, 35

Wants 需求, 11, 34—35

World Wars: Imperial wars 世界大战: 帝国主义战争, 126, 131

WW1 第一次世界大战, 126

WW2 第二次世界大战, 131, 134

World-wide crisis of capitalism 资本主义世界危机, 165—166, 168; of  
communism 共产主义世界危机, 165, 166, 168

Worker-peasant alliance 工农联盟, 29, 51, 111, 127

Worker self-management 工人自我管理, 6